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

李茂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简史

李　　茂　主编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徐东彬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

李　茂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兰考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7.62印张 42 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2105·28　定价：2.50元
（委托出版）

编 者 说 明

本书是由河南省哲学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组组织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中医学院、煤炭部郑州煤田地质学院、中共洛阳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一些哲学专业工作者，由李　茂同志任主编，集体编写而成的。

各章执笔人是：前言：李　茂；第一章：岳金西；第二章：吴永瑜；第三章：吕鸿儒；第四、五章：李　茂；第六章：黄魁五、吕鸿儒；第七章：韩锦生；第八章：刘志静；第九章：任启文；第十章：李德先、刘衷远；第十一、十二章：李若夫；第十三章：刘衷远。

本书初稿写出后，下列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统稿或修改工作：第一至五章：岳金西、吴永瑜；第六至九章：任启文、吕鸿儒、韩锦生；第十至十三章：刘衷远、李若夫。全书最后由李茂修改、补充、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近年来有关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哲学界不少专家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社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张树德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和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家马泽民同志写了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给予本书不少帮助，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记述了自184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到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一百三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完整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在，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开拓前进的热情很高。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完整、系统、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所裨益。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在于历史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过程。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作了论述，而且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传播和发展，叙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应当充分认识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以及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其他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无愧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为把哲学从书本

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它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作了巨大工作。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写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显然是必要的。本书的作者们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表现出理论探索的勇气和认真严肃的态度。这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其次，本书在史论结合上下了一定功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进行研究，但又与它们不同。本书行文力求以史为主，讲清理论发展的脉络，使人读后能从整体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有一种清晰之感。这就比以原著、原理介绍代替历史的理论分析要好些，它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的要求。

其三，本书比较好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和现状时，都能坚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注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这也是很可贵的。

此外，这本书的语言也比较精练，文字深入浅出，可以说是一部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著。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省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新收获。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部正规化理论教育，对高等学校哲学教学，对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同志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啻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

张树德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是1978年教育部决定在大学哲学系开设的一门新课程。这门课程的开设，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有力地帮助了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谛，对于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篡改和践踏，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起了重要作用。

几年来，由于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个学科已经引起了全国理论界上上下下的普遍重视，特别引起了大学生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着生产过程的基本面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某些环节和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促使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这一系列新变化给全世界革命志士提出了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大量的书刊论文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论点。然而他们当中相当一些人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却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没有摆好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批判了“左”的路线错误，全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导地

位，国民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在解决社会生活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的过程中，党中央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哲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然而，在理论界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讲坚持，不讲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成离经叛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实质上是固守着过去"左"的一套；另一种则只讲发展，不讲坚持，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西方某些观点，甚至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某些观点改头换面，贴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标签。这两种倾向的共同错误都在于不能正确地把坚持和发展辩证的统一起来。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能够帮助我们克服上述国际和国内的各种错误倾向，摆正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它是在同什么观点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和它所派生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丢掉了什么东西并不影响它仍然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丢掉了什么则不能称其为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到现在已经近一百四十个年头了。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停滞，而是在不断地发展着，而且其中八十年充满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范例。这些范例教导人们应当怎样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怎样才叫统一，怎样才能做到统一，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还可以学习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割裂坚持和发展辩证关系的种种错误哲学思潮的，从而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面对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一系新变化新问题的当代世界，这种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重要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课程的

学科建设是刻不容缓的，编写课本自然成了头等大事。

李　茂等十一位同志合作编写了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通史。他们不厌弃我，嘱我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读了书稿，深感它比已出的几个本子，具有自己突出的优点。正象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方面，独立地提出了一些见解。”这些独立的见解对“进一步斟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很可宝贵的。

首先，它不是经典著作泛泛介绍的连缀，而总是围绕一定阶段和时期社会生活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而展开马克思主义史的阐述。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原理的发展的论述，同着重刻划一定的历史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同分析一定的社会斗争的现实任务和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比较容易地捕捉住每一阶段和时期理论上的新贡献，每一步发展的本质特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写出真正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并且也便于使阐述集中突出、精练透彻、针对性和战斗性强。

其次，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分析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着眼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新发展，着重分析后来著作中添加的新东西，对于那些仅只重复已有思想而没有增加新内容的部分则或简或略，不多赘述，以期让人们明白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第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和章节的标题，本书力戒已有本子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了一些新的处理方法。这些新做法更好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和重点。

第四，本书着力于正确阐述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这种阐述散见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如何从哲学上分析社会经济的新条件、新发展和新变化之中，散见于他们如何从哲

学上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之中，散见于他们如何从哲学上总结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之中，尤其散见于他们如何从哲学上批驳“左”右倾机会主义割裂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歪曲马克思哲学的叙述之中。

第五，本书以巨大篇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尤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探讨了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合流的种种畸形儿之间的曲折斗争，介绍了党内哲学路线斗争，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如何在这些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研究并得到了伟大的发展的。这件工作，尤其是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撰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可以说是开创性的，没有人做过的，而且质量相当不错。即使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然而，“贵在第一枪”。应该说，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成就。可喜、可贺。

最后还应指出本书是由几位志同道合的穷秀才编写的，开编的时候，既没有获得什么经济资助，也没有被封为什么“国手”，只是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勤勤恳恳，不声不响，齐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致力于对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育。这种学风和他们写作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精神面貌是符合的，一致的，值得学习、发扬。他们写的这本书也和他们的为人一样默默地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默默地有益于广大青年的心灵。

马 泽 民

1984年9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我们满腔热情地把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献给迫切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大干部、大学生和青年朋友们。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由一系列范畴、原理组成的理论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哪里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偶然发现的吗？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一个演变的历史。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过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有的已被新概念所代替，有的增加、补充了新的内容，有的更加精确化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随着时代条件的变更，哲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要真正掌握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必须了解这些原理是怎样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而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理论的角度，阐明哲学概念与客观实际

（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阐明诸哲学概念、原理的内容、实质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说来就是，它研究哲学概念、原理是怎样提出来的，以及由这些概念、原理构成的哲学体系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它们的发展规律是什么，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除了研究哲学原理的内容之外，还要研究这些原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及其发展规律是什么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它从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不断地反映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同旧世界决裂而为人类的解放终生奋斗的，是怎样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运用于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科学、文化等领域，为无产阶级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的，是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学习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经验教训，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积极投入实践斗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更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研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概括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鉴古为观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从事现实的斗争。在当前哲学领域里的斗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围绕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的问题来进行的。这方面的斗争，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者把一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所阐述的某些哲学观点，看成是超历史的教条，普遍适用的公式，任意套用。与此相反，一些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口现代科学的发展，鼓吹相对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普遍指导意义；他们把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立起来，用不成熟的哲学思想来否定、代替成熟的哲学思想。他们说什么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成熟的哲学是以客体为中心的宿命论，扬言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来“拯救”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情况在我国理论界都有所表现。当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以后，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理论界出现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辩护，夸大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成熟性，或隐或现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这样，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不同解释，在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斗争。为了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变换手法，从内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口头上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实际上却对它进行攻击和歪曲，按他们的需要来伪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者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这些伎俩至今仍然为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所延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了解哲学战线进行斗争的情况和历史经验，就能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加深对现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手法及其反动实质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作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概念、原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之中有绝对，它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借口相对性而抹杀它是客观真理，借口绝对性而把它当成超历史的东西，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原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些概念、原则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所以，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列宁要求我们，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在他们的名下。”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党性是一致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要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利益，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发展的历史。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它。

其次，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是单纯的概念演绎史，而是对现实提出的问题的哲学回答。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联系历史实际，即在联系历史上当时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观点和原理，思索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在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基础上提出这些观点和原理的，又是怎样丰富和发展它的。二是要联系当前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从历史的经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验教训中，寻找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要特别注意联系当代哲学思潮的实际，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剖析它的历史渊源。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一些人同资产阶级哲学家相呼应，采用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所以，现在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内在规律。为了简要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编写了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简史》。在编写此书时，我们特别注意遵循下述一些原则和方法。

首先，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经济的依赖性往往是通过政治间接实现的，而对哲学的发展直接发生作用的则是政治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因素。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考察哲学与经济的关系、政治斗争和各门科学的相互作用。然而，列宁指出，哲学史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即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哲学认识的基本矛盾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不同方面而展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哲学认识矛盾发展史，就是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反对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如何对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各个方面作出不同的解答，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联系和转化的规律性。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介绍。经典著作介绍虽然也要说明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但它并不去揭示哲学思想内容的前后区别与逻辑联系，更不去研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是经典著作内容的介绍，而是着眼于揭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哲学概念、原理之间的逻辑联系与发展，对于反复出现而不具有新内容的思想观点，则只能略加提及。还应当指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不同于具体的科学；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科学，既不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而有自己发展的特殊的历史过程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在社会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在对日益深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不断作出哲学概括，形成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理论的过程中，是在批判继承以往的一切优秀哲学遗产的过程中，在批判剥削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反动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科学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尽量做到把它与具体的科学史、思想史区别开来。

其次，坚持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统一。哲学范畴、原理的历史发展，不是在纯粹思维领域中独立地进行的，而是依赖实践的发展，伴随历史的东西前进的。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的反映。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把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统一起来。所谓历史的东西即偶然与必然、个别与一般的结合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和活动，二是指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揭示哲学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处处追逐历史过程，就势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它必须摆脱历史现象中的外

在形式和偶然性因素，从中抽象出前后联贯的、本质的、必然性的东西。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点都会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影响，然而并非一切偶然的东西都是具有必然性的东西。为了把握它的一般规律，就只能抓住呈现本质特点的因素进行考察，而舍去那些非本质的偶然性、曲折性的因素。“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所谓逻辑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研究方法，它不过是摆脱了历史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因素而已。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也应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逻辑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形式上的前后一致的反映。运用逻辑方法时，对思想逻辑发展的论述，并不仅限于抽象论述，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地接触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作为历史科学，它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它的一些基本观点，从产生到不断完善，有一个过程。然而它的发展规律则寓于这些历史形式之中，任务是在于从中把它找出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统一起来，做到史论结合，有史有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再现出来。

最后，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具有鲜明的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它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它又遇到各种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反抗、伪造和篡改。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同一切剥削阶级哲学思想斗争的历史。哲学领域里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现实阶级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广泛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哲学上的斗争就在这些领域内表现出来。马

克思曾说，叙述哲学史时，批判的因素是绝对必要的。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要从这些领域的具体斗争中来说明哲学的派别斗争，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在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四

本书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到现今近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时，把它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又将每一阶段分为若干时期。

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马克思恩格斯逝世的半个世纪，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如下几个时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诞生的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实践检验和科学论证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871年到1895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完善化的时期，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似乎又重复着四十年代哲学创立时期的某些特征。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描述了这一发展阶段。

恩格斯以后到列宁斯大林逝世的半个世纪，为第二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出现曲折甚至暂时倒退。列宁在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螺旋式前进的圆圈。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了共产国际和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胜利进行。叙述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是第五章至第九章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斯大林在哲学上的错

误，以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不仅写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专著，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广大革命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用新的论断、新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在文化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得到彻底贯彻，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重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从列宁经过斯大林到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曲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本书第十章至第十三章说明了这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圆圈”。

本书着重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现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具有中国的特色，又具有普遍性，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原理和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是在介绍中国各种哲学思潮斗争的广阔视野中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似乎更能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

本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方面，独立地提出了一些见解。当然，这仅是探讨性、尝试性的，还有待进一步斟酌、研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编者说明

序……………………………………………………………张树德

序……………………………………………………………马泽民

前言…………………………………………………………（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的开始……………（3）

第二节　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逐步发现并阐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14）

第三节　批判改造费尔巴哈哲学，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30）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4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风暴和革命时期的发展……………………………………………………（55）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运用和发展……（56）

第二节　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发展………………（68）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和阐述……（78）

第四节　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8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后的全面发展……………………………………………（94）

第一节　在批判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国家和革命学说……………………（95）

第二节　在同杜林的论战中，连贯地叙述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 …………………………………（105）
第三节　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117）
第四章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29）
第一节　揭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31）
第二节　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史 …（140）
第三节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补充 ………（150）
第五章　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 ……………………………………（161）
第一节　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独立探讨 ………………………………………………（162）
第二节　考茨基、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169）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 ………………………………………………（182）
第四节　第二国际初期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192）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03）
第一节　在同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发展 ……………（205）
第二节　在同经济派的斗争中对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原理的具体论证 ……………………………………（214）
第三节　在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 ……………………………………………（220）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28）
第一节　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学说 ……………………………………（239）
第二节　阐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 ………（253）
第三节　科学考察帝国主义的特殊规律和国家与革命问题，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 ………（263）
第八章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274）
第一节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275）
第二节　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283）
第三节　贯彻战斗唯物主义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 …………………（294）
第九章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303）
第一节　对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捍卫和发展 ……（304）
第二节　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新概括 ……………………………………………（315）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的揭示 …（326）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传播和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33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33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的三次大论战 …………………………（345）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353）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传播和发展（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36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 ……………（36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深入传播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哲学思考 ……………………………………………（383）
第三节　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396）
第四节　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哲学概括——《实践论》、《矛盾论》 ………………………………………（404）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下）——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展开 ………………………………（415）
第一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 ……………………………………（415）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424）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434）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446）
第五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著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456）
第十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

发展 ……………………………………………（466）
第一节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467）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曲折发展 ……………………………………（482）
第三节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重大挫折 ………………………………（507）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51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1837——1848）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由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这一变革的这一实现，是一定历史时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它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中期，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占居统治地位。随着德国阶级斗争的发展，也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黑格尔学派便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大都是唯心主义者，而费尔巴哈则是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当然继承者。他们抛弃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批判地汲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批判地汲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够在批判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新的哲学体系，完成哲学史上的空前大革命，是由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条件所决定的。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英国早就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已经实现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法国也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德国社会的发展虽比英法落后得多，政治上还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经济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但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随着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举行的两次政治罢工，英国工人发动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爆发的武装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斗争，为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创立新哲学奠定了阶级基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充分证明整个自然界的辩证性和形而上学的荒谬性。这就为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创立新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人类认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为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创立新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肯于刻苦钻研，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大胆实践，积极投身于政治思想斗争，投身于工人运动。这是他们改造旧哲学、创立新理论的主观条件。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也是他们世界观转变的过程，新哲学体系创立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通过积极参加当时的思想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实践，

第一步便“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①]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1837——1843年春，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阶段；1843年春——1844年，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逐步发现并阐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阶段；1845—1846年，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费尔巴哈哲学，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阶段；1847——1848年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孕育、发展和逐步形成体系的过程。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西部的莱茵省。这里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在这里，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非常突出，资产阶级保守派同激进派的矛盾、自由主义同革命民主主义的矛盾也已经暴露。这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早期在哲学上都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基本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通过各自独立的道路，同时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城。父亲是一位思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

想开明的律师，政治倾向于进步，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宗教传统的束缚。他是一个把宗教信仰建立在道德观念基础上的宗教信徒。马克思在童少年时代，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进步与迷信两个方面的思想影响。中学读书期间，马克思耳闻目睹自由势力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看到父亲和几位老师因参加进步团体的活动而受到的政治迫害，使他懂得了爱憎，增长了知识。通过五年的学习，在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基础上，在校长和老师的无神论思想影响下，马克思的无神论观点开始萌芽了。他在中学毕业作文中指出，青年选择职业和生活道路，不要被所谓神的“启示”和“召唤”所左右，而应当从高尚的道德情操出发，为人类幸福而献身。马克思的这一至理名言，充分反映了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志向和抱负。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马克思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黑格尔学派分裂为左右两大派的时候。以辛利克斯为代表的老年黑格尔派，顽固坚持黑格尔哲学的反动体系，极力宣扬有神论和灵魂不死，拼命维护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较为重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结论，并用抽象形式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两派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哲学和宗教的斗争，而且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席卷了整个德国思想界，也吸引了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研究得最多的则是历史和哲学。先前，他曾读过黑格尔哲学著作的一些片断，但他并不喜欢这位哲学大师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当时他特别爱好文学，尤其是诗歌。然而，在柏林大学，无论上什么课，都能听到教授们引用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哲学被尊为最高权威，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马克思一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就接受著名的进步的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讲课。甘斯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运用于法学和历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法学家。他在

讲台上经常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极为同情工人阶级，启发学生关心社会问题，要求学生学习圣西门的学说。马克思十分尊敬甘斯教授，多次选修他开设的课程，甘斯也经常称赞马克思学习“异常勤奋”。甘斯的著作和讲课，给了马克思以极大的影响，使他开始转向黑格尔。这时，马克思也试图写一部贯串哲学体系的法学著作。他从写作这部著作的失败中，深深感到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1837年春，他因学习劳累而到柏林郊区斯特拉劳村养病期间，甘斯教授也在这里养病。在甘斯教授的影响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读了不少黑格尔弟子的著作，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从此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信徒。在柏林，马克思还结识了布·鲍威尔（1809—1882）、阿·鲁滕堡（1808—1869）、弗·科本（1808—1863）等青年黑格尔分子，并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博士俱乐部”。俱乐部里的成员大都是风华正茂、才思横溢的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大学生。他们经常聚会，争论哲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在争论中出现了很多互相对立的观点，使马克思深受启发，使他更加深入地去钻研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来。

在鲍威尔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马克思于1839年开始研究古代希腊哲学史，在笔记中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于1841年春大学毕业时，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只强调原子的直线下降运动，并把这种下降运动归结为必然性，这样就会把人引导到宿命论。似乎人们在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而伊壁鸠鲁强调的则是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这既肯定了直线下降的必然性，又肯定了偏离直线的偶然性，把两者统一起来，具有辩证法思想。原子偏斜运动的

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当时他是按照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原子概念是自我意识的映象，原子偏斜运动是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但是他同黑格尔哲学也有分歧，他批评了黑格尔哲学为当时的政治和宗教辩护，也不同意鲍威尔等人迴避政治斗争的所谓批判哲学。他主张哲学应当积极地干予生活，主张把对哲学、神学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当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高度评价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说伊壁鸠鲁的原子在虚空中运动而产生宇宙万物的学说，从根本上打破了宗教宣扬的神灵创造世界的谎言。在论文附录中，马克思还揭露了反动哲学家谢林为宗教辩护的可耻行径，指出黑格尔证明上帝存在的观点是荒谬的。

这篇论文还表明，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业已形成。他批判宗教的斗争矛头是间接地指向封建反动势力的。他引用希腊神话中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话，表示"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① 他强调伊壁鸠鲁的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学说，认为它可以论证人的个性自由的合理性，可以间接抨击毫无民主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后来他回顾说，当年专门研究伊壁鸠鲁哲学，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可见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哲学上论证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的。

1841年4月，马克思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本来打算到波恩大学同鲍威尔一起教书。但当时反动政府极力迫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0页

进步学者，把鲍威尔赶出波恩大学，剥夺了他的讲学权利。这就使马克思不得不放弃教学的想法，而投身于政治斗争。1842年初，他写了第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政治论文，开始了反对封建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同年4月，他开始为《莱茵报》写稿，10月担任该报主编。从此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革命民主的趋向越来越明确。为了把《莱茵报》办成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马克思进行了几条战线的实践斗争。

首先是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由于《莱茵报》经常发表反政府的革命言论，这就使专制政府感到非常害怕和恐慌。他们断然决定对该报实行双重检查制度，采取种种措施来刁难、迫害《莱茵报》。马克思面对反动措施，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对检查官巧加应付，以通过新闻检查。他还利用时机，主动向政府发动进攻。马克思接任主编后，《莱茵报》抢先公布了内阁政府根据国王旨意秘密制订的贯彻宗教观点的离婚法草案，立即在进步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王在震怒之下，责令追查泄露法案人的名字，编辑部坚决顶住了这股压力。当政府无理查封进步的《莱比锡总汇报》时，马克思立即撰写文章，猛烈抨击当局专横暴戾的丑恶行径。当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向政府打报告，诬陷《莱茵报》煽动不满，诽谤国家时，马克思毅然同这个反动官僚展开争论，逐条批驳了他的种种谬论。专制政府无可奈何，就决定查封《莱茵报》。

其次是同反动报纸进行斗争。《科伦日报》为了向政府告密，指责《莱茵报》攻击基督教，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这家报纸反动的政治立场，阐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关系，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 的著名论断。奥格斯堡《总汇报》为了向政府献媚，攻击《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义者。马克思指出，《总汇报》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莱茵报》并不承认和期望在德国实现“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德国急需的不是侈谈共产主义，而是要来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共产主义不是付诸实践的问题，而是对它要进行“理论论证”的问题。他提出共产主义是具有欧洲意义的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再次是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斗争。以柏林“自由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一群轻率浮夸而又狂妄自大的家伙。他们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任意摆布的机关报，他们的文章尽是一些写得极其草率、毫无意义的废料，只是点缀一些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词句。“自由人”这种自我吹嘘、飞扬拔扈的作法，早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厌恶和反对。他接任主编后，决定不让“自由人”再象以前那样在报上唱高调，发空论，拒绝登载他们的烂调文章。马克思向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是“新的世界观”，在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它是不适当、不道德的。如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外的方式，更加切实地加以讨论；要联系对政治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要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如要谈论哲学，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马克思同“自由人”都存在着严重分歧。正是这种分歧导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决裂。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一方面进行实践斗争，另方面进行理论斗争，并把政治和哲学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办报的需要，他在广泛深入接触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阐明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政治观点是在哲学外衣掩盖下间接表达的。而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第一次公开申明了自己反封建的政治立场。1841年，德皇政府发布了一道新的书报检查令。这一法令的反动实质，就是要迫害进步作家，禁止

进步书报的出版发行。马克思在评论检查令时，把书报检查制度同普鲁士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这些制度中隐藏着一种痼疾，治疗的根本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现存的一切制度。他首次发表在《莱茵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论文，从另一角度批判了书报检查法。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生本性。出版自由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书报检查则违背了人的自由本性。他对自由作了具体分析，谴责诸侯、贵族和城市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维护的是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赞扬农民等级拥护出版自由，捍卫的是人民的自由。他对农民等级"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为自由而战斗的革命口号，大加赞扬。这时他对自由的看法虽然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已开始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主张用"斧子"来争取自由。这是他的民主革命观点的重大发展。

在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莱茵省议会为了维护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把穷人到树林里拾枯枝当作偷盗林木犯罪而要求严加惩罚。马克思站在贫苦群众的立场上，坚定地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①，无情地揭露了地主贵族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阐明了林木占有者同贫苦群众双方物质利益对立的问题。他指出，在人类分裂的社会里，存在着一种人靠奴役和剥削另一种人为生的现象。当时，他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念出发，认为国家应该关怀贫苦群众的利益，但是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却极力袒护林木占有者的私利。国家变成了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和工具，为他们的私人利益辩护和效力。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还是从法学和逻辑的角度探讨物质利益对立问题的，他的论据带有明显的唯心思辨的性质。但是，正是理性国家观念同普鲁士国家现实之间的矛盾，使马克思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推动着他向唯物史观转变。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页。

1842年底，《莱茵报》报导了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破产的情况，因而遭到莱茵省总督沙培尔的责难。为了反击当局的指责，马克思挺身而出，为摩塞尔记者辩护。他根据在摩塞尔调查的大量材料，深刻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认定正是这一腐朽反动的制度是造成农民贫困破产的真正根源。如果国家的一个地区经常陷于贫困状况，说明国家的管理原则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还分析了国家的管理原则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① 这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但他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和它对人们行动的决定作用。这是他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出发点。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办报的工作实践，通过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开始动摇了。他从根本上怀疑唯心主义的理性原则，怀疑唯心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后期发表的文章来看，虽然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在不断加强，但他还不能用唯物主义来克服唯心主义，还解决不了他提出的"疑问"，因而还处于"苦恼"之中。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他头脑中唯心唯物两种思想斗争的矛盾，是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内在动力。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来说，《莱茵报》时期只能表明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从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主义转向共产主义。”①

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市。父亲是个工厂主。恩格斯中学毕业的前一年，父亲就强迫他退学经商。1837年秋，他到巴门市父亲开设的营业所去当见习生，次年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在这里，他坚持业余自学，阅读了大量书籍，增长了知识，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恩格斯从小就受到基督教虔诚主义的熏陶，在不来梅由于受到反封建斗争的思想影响，宗教信仰开始动摇。正在这时，青年黑格尔分子施特劳斯（1808—1874）发表了《耶稣传》一文，宣传耶稣不是神，而是人，圣经起源于神话传说。在施特劳斯的启发下，恩格斯终于把头脑中“上帝”的偶象推倒了。1839年春，恩格斯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中，对流行于乌培河谷地区的虔诚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对传教士和工厂主专横、贪婪、伪善和迷信的活动进行了揭露，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不来梅，随着他对宗教的批判和参加青年德意志运动，逐渐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说，他恨透了德皇威廉三世，欧洲各国的皇帝都应处以极刑。他坚信，只有革命才能改造旧制度，只有依靠人民，革命才能胜利。人民革命的思想，构成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

恩格斯借助施特劳斯走向了无神论，也走上了通往黑格尔哲学的大道。他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②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黑格尔哲学，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信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4页。

徒。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那里，他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他还利用公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谢林（1775—1854年）的讲课。后来，他写了《谢林论黑格尔》等三篇著作，从黑格尔哲学立场出发，既批判谢林宣传的宗教蒙昧主义，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又批判谢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高度赞扬人类自我意识的作用。这时恩格斯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后来，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恩格斯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哲学和政治上发生了分歧。当时不少青年黑格尔分子要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1762—1814），退回到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自我意识哲学；恩格斯则坚决反对把精神同现实割裂开来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在主体和客体、精神和实体、人和周围环境之间建立联系。当时不少青年黑格尔分子把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标榜“批判哲学”，空谈革命；恩格斯则坚决反对把政治斗争理解为抽象的哲学批判，认为仅仅进行哲学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恩格斯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他深刻分析了普鲁士反动国家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指出国王个人的品质行为不过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原则贯彻到极点时的产物；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使出版处于最不自由的境地。他在这篇文章末尾暗示：“普鲁士的现状非常象过去法国面临着……但是，我避免过早地做出任何结论来。”①不言而喻，这个省略了的“结论”，就是“革命”二字。这篇文章标志着恩格斯在政治上同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决裂了。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已是大名鼎鼎的著作家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3页。

了。1842 年 10 月，恩格斯服兵期满，从柏林回到巴门。同年11月，恩格斯在赴英途中路经科伦，顺便来到《莱茵报》编辑部，慕名拜会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见，是颇为冷淡的。因为当时马克思已同青年黑格尔派从思想上决裂了，他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等“自由人”一伙，而恩格斯当时却同鲍威尔兄弟有些书信往来。这样，马克思就误认为恩格斯是鲍威尔兄弟的盟友，而对恩格斯持怀疑、冷淡的态度。但是，这并没有防碍他们以后的合作和友谊。恩格斯抵达英国后，不到一个月就为《莱茵报》写出了五篇报导。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材料具体，对英国政治经济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评论。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这些文章未经任何修改就连续登载在《莱茵报》上。这就为他们以后的伟大合作和友谊奠定了初步基础。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去到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当职员。他一去到那里，便拒绝参加一切灯红酒绿的宴会，积极地投身于工人运动。他经常访问各种工厂和工人住宅区，了解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经常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了解英国工人斗争和宪章运动的情况；密切注视着各个阶层的动向，精心研究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那里，他阅读和研究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大量著作。在那里，他除了为《莱茵报》写作通讯报导外，还为瑞士和英国的进步报纸写了《伦敦来信》等许多重要论文。在留居英国期间，恩格斯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来到英国，正是1842年8月纺织工人大罢工遭到镇压、宪章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英国革命是否会再次发生。有些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恩格斯则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英国的社会矛盾和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工业化速度飞快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与消费的矛

盾以及争夺市场的竞争，大规模的商业危机，会使赤贫如洗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到那时，工人阶级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恩格斯在给《莱茵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工人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①

恩格斯在留居英国前期发表的文章，还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矛盾的考察，看到各个阶级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斗争的，并且形成了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恩格斯曾经回顾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②恩格斯在英国，很快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他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第二节　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逐步发现并阐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843年4月到1844年底，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亲身参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实践，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推动着他们去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不破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0—5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不立，破中有立。他们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并阐明了自己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843年3月底，《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于5月来到女友燕妮的住地克罗茨纳赫，6月同他热恋的燕妮结了婚。在克罗茨纳赫的半年时间里，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同阿·卢格（1802—1880）商谈，为创办《德法年鉴》做准备工作；一件是对《莱茵报》的实践斗争，进行哲学上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由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各个阶级为物质利益而展开的斗争，与他头脑中的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发生了矛盾，从而使他陷入"苦恼的疑问"之中。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英法和德国的历史著作和政治理论著作，并作了五本摘录笔记，最后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里，他还写成了《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底，马克思为了同卢格共同创办《德法年鉴》而偕同燕妮迁居巴黎。马克思一来到巴黎，便同法国各个秘密工人团体和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并经常深入工人之中，了解他们的苦难生活和起义斗争情况。这时他已开始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旧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在巴黎，马克思还研读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了大量的札记。马克思到巴黎不久，就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连同《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由于两位创办人的意见分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法年鉴》只出了一、二期合刊便停刊了。1844年4—8月，马克思写下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未完成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是同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密切相关的。1841年和1843年初，费尔巴哈先后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和《未来哲学原理》，进一步论证了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思维来自存在，但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只要将黑格尔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明显的真理。这给马克思从理论上和方法上批判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不过马克思在接受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人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在1843—1844年底这一时期，他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使用的论点、方法和术语，都明显地带有费尔巴哈的思想烙印。但是，马克思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他发现费尔巴哈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便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桥梁"，在政治历史领域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这种批判又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

把黑格尔"头脚倒立"的哲学颠倒过来

黑格尔（1770—1831）创立了人类认识史上最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思维先于存在，存在是由思维演变而来的，存在的本质就是思维。他断言，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所谓宇宙精神或绝对观念。绝对观念经过本身的发展，"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又通过人的出现而返回到自身。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相应地代表着绝对观念的三个发展阶段。法哲学属于精神哲学的范围。它不仅讲伦理道德等社会意识，而且着重讲社会、法律和国家等政治制度。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概念领域，而国家又是抽象理念的实现。市民社会依存于国家制度，国家是客观精神的最高体现。他把人类历史完全看成是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这就把存在与思维、现实事物与逻辑理念、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认为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首先要把头足倒置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他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首先是国家学说的批判。他指出，市民社会不是国家理念的产物；而是产生国家的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才是原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本原。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不是市民社会依存于国家制度，而是国家制度从属于市民社会。然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却把现实事物与逻辑理念、市民社会与国家制度的真实关系弄得"头足倒置"。在黑格尔看来，理念是事物的创造主，而事物不过是理念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头立地、脚朝天的哲学颠倒过来，不是从人类精神发展中，而是从"市民社会"即经济关系中寻找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因，这就为他走向唯物史观找到了一条道路。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表明他在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1842年以后，青年黑格尔派陷于分裂。鲍威尔等人越来越远离政治，走向反动。他当时鼓吹宗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犹太人要获得解放首先需要取消犹太教的谬论。马克思写了《论犹太人问题》，批判鲍威尔颠倒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与犹太教的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犹太人从事工商业活动，把赚钱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正是犹太人的现实生活构成了犹太教的基础。因此不应该到犹太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要到犹太人那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是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现在是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的反映。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只有消灭颠倒了的国家和社会，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才能消灭宗教。因而哲学的迫切任

务，就是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科学地揭露了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指出了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还阐明了物质和意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财产和物质利益是政治、法律和理论的基础，而后者对前者也起着反作用。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这段名言，一是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理论不能代替实践，批判不能代替行动，只有用物质力量才能摧毁现存制度；二是强调精神的反作用，理论是群众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三是强调精神变物质的条件性，理论必须是能够抓住事物本质，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只有彻底的正确的理论才能说服人而被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物质力量。这段著名论断，是马克思对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这一辩证原理最早的经典表述。

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是荒谬的，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合理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不象费尔巴哈那样，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把脏水连同小孩一起泼掉，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批判改造，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1873年初，马克思说过："将近三十年以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关于国家同社会、政府同人民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思想，认为这是他比较深刻的地方。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处处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对这种对立加以强调。但是，由于黑格尔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他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总是抛弃现实的对立而构思矛盾的调和。在法哲学中，黑格尔用等级代表制这个“中介”来调和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他断言，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对立，由于等级代表制的中介作用而取消了。针对矛盾调和的中介说，马克思提出对立面不可调和的矛盾说。他说，现代社会划分为等级和与之相适应的等级代表制，不仅没有消除国家与人民的矛盾，相反，它们倒是这些矛盾的必然表现。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极端是不能被中介所调和的。他把矛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两个极端相通的矛盾，这类矛盾表现为互相吸引，不是本质的差别；另一类是两个极端的矛盾，这类矛盾表现为互相排斥，是本质不同的对立。国家同人民的矛盾就属于第二类矛盾。尽管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联系起来，但他把矛盾区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种类型，则是贯穿着对矛盾性质进行具体分析的精神。

马克思认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批判，要从矛盾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矛盾。他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市民社会内部各等级之间的斗争，统统归结为经济利益问题，认为这些矛盾的产生都根源于私有财产制度。这就找到了现代国家和社会一切矛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盾产生的总根源和必然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背叛了他早年提出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论点，提出否定革命和突变的缓慢进化论，认为国家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也是"逐渐推移"的量变，而没有质变和飞跃。马克思指出，"逐渐推移"这种范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诚然，许多国家制度的改变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逐渐瓦解，"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①这就有力地反驳了黑格尔的改良主义和庸俗进化论，阐明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和历史辩证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一步作了批判改造，彻底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从纯粹的思辨思想开始，而以抽象的绝对精神结束。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通过绝对精神的异化和扬弃异化而构造起来的。这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精神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黑格尔把国家和宗教都看作是抽象思维的异化。对它们的扬弃，并不是要改变国家制度、消灭宗教，而是要恢复法哲学和宗教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他为现存政治制度和宗教作辩护的思想基础。唯心主义只用抽象思维去解释现实事物，这样，它就只承认精神的运动，不承认现实的变化，从而也就只承认精神的辩证法，不承认现实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不承认任何凝固不变的东西，只承认发展、运动是永恒的，现存事物都是要灭亡的。黑格尔的"纯思想的辩证法"同现实的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只在精神领域论述异化和扬弃异化，根本不触动现存事物的一根毫毛。这就必然窒息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性质。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问题。在那里，所谓主体，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脱离物质的自我意识；所谓客体，也不是现实的自然和社会，而是脱离自然和社会的意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是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关系。黑格尔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统一论，一方面又高度评价了主客体相统一的合理思想。黑格尔把主体与客体看作一对矛盾，力图用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去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个看法是合乎辩证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外部自然界是客体，人是能动的主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主体受制于客体；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因而主体对客体又具有能动作用；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使自身受到改造，因而人又是受动的客体。马克思用实践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从而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这既超出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超出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是第一个否定；异化的扬弃，是否定的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维的形式。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①]则是应该肯定的。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现实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这是黑格尔异化观中合理的辩证法因素。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劳动创造人的真正生活；而看不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灾难。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他并不懂得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力量，劳动是改造自然又改造人本身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还肯定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扬弃”是否定性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只有通过扬弃这个中介，发展的不同阶段才得以联系起来，并在否定中保持以往发展的积极成果。

对共产主义的最初的哲学论证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潮并没有妄加评判，只是提出对它要进行“理论论证”。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认为卡贝、魏特林等人宣传的共产主义，还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同这种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当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认为对社会的改造，就是对私有财产进行“公正的”“平均的”重新分配。但是，这并没有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批评空想共产主义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片面的教条、抽象的观念。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彻底消灭私有制，这是他后来探索、论证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针对鲍威尔混淆宗教与政治的谬论，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问题。他所说的“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的实现。他既肯定政治解放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又指明了它的历史局限性。政治解放既没有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没有使人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而人类解放的本质特征，就是使人从私有制中彻底解放出来。马克思这时认识到，私有财产制度是阻碍人类解放的主要力量，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类解放。他还认为，不论政治解放或人类解放，都必须通来暴力革命来实现。政治解放之后必将出现人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必将变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不停顿的”。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阐明了人类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提出了无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他看来，当时德国已经完成对宗教的批判，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批判。这种批判不只是理论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武器的批判。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把革命理论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变成现实，才能使自己得到彻底解放。德国经济政治非常落后，它不仅需要来一个政治革命，也需要来一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完成这个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坚决要求同私有制彻底决裂。它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无产阶级要用否定私有制的原则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点，并把它同政治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以此来论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什么是异化劳动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异化劳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即工人生产的产品与工人相对立，支配、奴役工人；二是劳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折磨工人的强迫性的劳动；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劳动仅仅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满足人的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即异化劳动生产出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说明生产劳动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指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作用而存在的，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恶果。因而要消灭资本主义，必须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私有财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律性。但是，异化劳动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看成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劳动异化，即人本质的异化；最后，私有制的消灭，异化劳动的消灭，人的本质得到复归，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①，并把共产生义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或"真正的人道主义"。这说明马克思当时对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论证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人本主义的思想痕迹和空想性质的色彩。但是，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度的思想则是十分正确和合理的。在他看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实现共产主义"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②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宝贵的。随着马克思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马克思就清除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从社会经济关系的立场出发，来论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了。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起义。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驳斥了卢格的谬论，对这次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这次起义比英法工人起义具有更高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起义一开始工人就坚决反对私有制度，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无产阶级具有非凡的社会主义天赋，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通过革命实践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马克思通过总结西里西亚工人的起义斗争，把他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40页。

它具有政治性。”①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② 这样，他就改变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的那种把社会革命同政治革命相对立的看法，从而把社会主义同推翻旧政权、破坏旧关系的革命联系起来，把革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结合起来，赋予无产阶级革命以政治性质，使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开始萌芽了。这样他就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同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两篇文章也登在《德法年鉴》上。前一篇文章批判了卡莱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后一篇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是恩格斯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最初尝试，是对科学共产主义一般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初步论证。这两篇文章是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他一样的结论，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很大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自以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就不断通信，交换意见。1844年8月末，恩格斯在回国途中路经巴黎，第二次拜会了马克思。这次会晤，他们发现彼此的理论观点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489页。

他们终生的密切合作和战斗友谊。

这次会晤，两位朋友决定合写一部著作，来揭露批判鲍威尔一伙的主观唯心主义。恩格斯在逗留巴黎的十天中，写完了他所分担的章节，于9月6日回国，全书则由马克思于11月间完成。书名最初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后来出版时把这个正题变为副题，书名改成《神圣家族》。"神圣家族"这个名称，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一幅名画的标题。画中人物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她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伊利莎白，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取《神圣家族》为书名，是借以讽喻以鲍威尔为首的一伙的。他们把鲍威尔比作耶稣，把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蔑视群众，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象耶稣在人间传道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决定共同写这部书来批判鲍威尔一伙，是由于随着德国封建势力对资产阶级反对派迫害的加强，这伙人完全堕落为思想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他们为了同马克思的《德法年鉴》相对抗，在德国创办了一份《文学总汇报》，以此为阵地，狂热鼓吹"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污蔑工人阶级，对抗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共产主义来说，真是"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①。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便决定合写这部著作。

《神圣家族》这部论战性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深刻地批判了鲍威尔一伙的反动哲学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②。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围绕着哲学基本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80页。

题，展开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鲍威尔一伙认为客观世界是自我意识的派生物，自我意识不断通过批判，就可以改变一切现存的事物。他们把批判看成是一种创世活动，而他们自己则是批判的主体。改造世界被说成是批判的批判的活动。马克思尖锐批判了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把它称之为“儿子生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的头足倒置的哲学。他指出，工人知道，单靠思想批判，而不见诸行动，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消除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根源于黑格尔哲学。对自我意识的批判，必然发展为对黑格尔思辨结构秘密的揭露。黑格尔哲学的最高概念是绝对观念。鲍威尔用“自我意识”代替“绝对观念”，就是由客观唯心主义回到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举出“果实”的著名例子，指出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从认识上颠倒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把一般夸大为脱离个别的客观实体。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但在思辨哲学看来，“果实”这个概念并不是苹果、梨子等具体水果的抽象概念，反而是这些具体水果的“真正的本质”。从“一般水果”这个抽象概念中创造出个别的苹果、梨子等现实的自然实物。可见，思辨哲学的秘密，就是观念创造世界的秘密。马克思把它讥讽为“创世哲学”。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一伙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阐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原理。他们认为，如果排除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不能认识历史。第一次明确提出“生产方式”这个范畴，强调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这个时期的生产方式。他们从分析人与物的关系进而触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列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认为，这个思想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针对鲍威尔一伙把思想意识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种纯碎思想，而是为了实际的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身不能改变旧世界，思想必须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改造世界思想本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鲍威尔一伙诽谤、污蔑群众，否定群众历史作用的英史雄观，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重要原理。他们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他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历史上任何革命运动没有群众的参加，都是不能成功的。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否定群众作用的反动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贫穷与富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对矛盾，研究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关系问题。鲍威尔一伙把思辨矛盾当作现实矛盾的创造者，硬是用自我意识来解决劳动和资本，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企图通过否定无产阶级来消除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一伙的谬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进行了辩证分析。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152，104页。

够的。”①在私有制这个统一体中，私有者是肯定方面、保守方面，无产者是否定方面、破坏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必将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就科学地论证了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这一论证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矛盾问题的论证有了重大发展。

《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出版后，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种具有不同倾向和立场的报刊，都进行了评论。鲍威尔本人也进行了最可怜、最拙劣的申辩和反批评，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由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②，此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就威信扫地了。

应当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位杰出代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在当时还很有市场，还强烈地影响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从《神圣家族》中可以看出来。尽管这部著作进一步发展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观点，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费尔巴哈对抽象人的崇拜，即代替他的新宗教的核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最终摆脱他的思想影响。在“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说：“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③他还把费巴尔哈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也承认，这本书“对费巴尔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了一种滑稽的印象”④。1845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同费巴尔哈思想的矛盾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日益尖锐起来。因此清算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便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新任务了。

第三节　批判改造费尔巴哈哲学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巴黎。2月，马克思全家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来到这里。恩格斯回顾说："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①1845—1846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全面制定唯物史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大陆的革命正处于酝酿阶段，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思潮和学说也非常活跃。这些学说和思潮大都是以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用它们来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清除这些学说和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论证新世界观的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工作。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他们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当他们将要制定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就成为他们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是势在必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清算了他们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精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1804—1872）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上帝—理性—人，也就是从神学出发，经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最后走向人本主义。他的整个哲学活动，始终坚持了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并且揭露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他责备黑格尔不是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是拿事物去符合自己的概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词，上帝是唯心主义的最初创始人。费尔巴哈在同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他的人本主义学说。他宣称，人和自然界是哲学的唯一对象，哲学的任务就是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那末，什么是人的本质呢？在他看来，人的生存是依赖于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即生物学的属性。他所说的人，只有自然性，没有社会性，因而只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把人本身和自然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著作，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提纲马克思写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恩格斯对提纲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于1888年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公诸于世。《提纲》总共十一条，全文不到一千五百字，但内容极为丰富，思想非常深刻。它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评价过高；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从根本上与费尔巴哈哲学划清了界限。恩格斯对《提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

的地位给予了科学评价，认为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当马克思信仰黑格尔哲学时，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和理性。当他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便抛弃了上述观点，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也主张，“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等等。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循此继进，强调研究人的社会特质。他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他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加深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认为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社会性。他通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化了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物质利益是联系人们的纽带。在物质利益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明确提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种由现实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划清了新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他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和历史观。首先，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虽然正确地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但它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虽然也谈到过实践这个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頁。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頁。

念，但他心目中的实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平常的交往，而不是指社会实践、革命实践。他根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由于费尔巴哈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把感性直观和众人意见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只承认人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否认人的革命实践能够改造客观环境。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科学地评价了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功绩，同时指出他没有揭示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存在，只能用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来说明，并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宗教受到革命的改造。

最后，马克思还揭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阶级根源。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旧唯物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实践不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了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也就无所谓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了。马克思阐明的实践观点，彻底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消极性和直观性，奠定了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基础。

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大约于1845年11月就写了《费尔巴哈》札记手稿。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

札记手稿首先指出，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可以归结为自然哲学，消极地崇拜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即生理学和心理学，这里除了旧唯物主义者已经说过的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以及把爱捧上了天的颂歌以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归结为道德要求，把人当作道德的存在物，人对胃的道德的态度，就是不把胃当作一种兽性看待，而是当作人性看待。恩格斯的概括，揭露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札记手稿中，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共同性。费尔巴哈认为，单个的人本身并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性中，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中。这表明，费尔巴哈试图从人们必须交往、互相需要的社会关系来说明人的本质。但是，他所谓的共同性，指的是性行为、种的延续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他知道的“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恩格斯指出，人们从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这种需要只能在社会内部得到满足，为此人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才能在人们之间发生交往。显然，恩格斯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只有人们交往的社会关系才决定人的本质。

按照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观点，“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不管这个“存在”怎样，都应安于这个“存在”，以保持“本质”与“存在”的和谐。任何例外，都被看成是不幸事件，是反常现象。恩格斯驳斥说，你乐意在七岁时成为矿井的守门人，每天单独一人在昏暗之中度过十四个小时，既然你的存在是这样，你的本质也就是这样。这是“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②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唯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1、362页。

心思辨性质。

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清算

184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移居布鲁塞尔之后，立即同一些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并密切注视着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他们的理论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识识分子中得到一些人的拥护 。因此他们认为有义务科学地论证自 己的观点，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这种理论。正当此时，鲍威尔和施蒂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费尔巴哈和赫斯。这时费尔巴哈也发表文章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莫·赫斯、卡·格律恩、海·克利盖等人也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宣扬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反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攻击，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潮，清除工人运动的障碍，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然，写作这部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清算自己以前哲学信仰的需要。马克思说过，“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① 这部著作的写作，从1845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846年下半年。这部著作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问世，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发表。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具有重大意义，它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具体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标志着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步完成。

如果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札记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做了初步批判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第84页。

斯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则作了彻底的清算。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这种自然观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则是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出发点，即抽象的人性论。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性是受感情制约的。他主张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基础，这比唯心思辨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只是有肉体、有感情、有意志、有欲望的人。他把现实的人归结为人的自然性，归结为人的两性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爱与友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费尔巴哈“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②费尔巴哈所谓“现实的人”，是既脱离现实生活，又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的人，是概念中的人，是概念的别名。他从“人”的概念出发去说明现实的社会历史，把人当作历史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终极目的，从而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发展过程，“人”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

其次，揭露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根源，即直观性。所谓“直观”，有消极、被动的静观之意。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它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是诉诸感性直观，以直观性代替实践性。他提出许多直观形式：认识“眼前”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东西的"普通直观"，认识"真正本质"的"哲学直观"，认识复杂社会的"二重性直观"等等。他认为自然界的秘密只有通过科学家的直观才能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驳斥说，自然科学不是依靠科学家的直观，而是依赖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的"感性活动"而获得的材料。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感性的对象"，即被动的直观对象；而不是看成"感性的活动"．即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不了解人的认识和认识对象都是实践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践活动不仅改变人的认识，而且改变人的认识对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不能认识社会，也不能改造社会。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当费尔巴哈看到大批积劳成疾的贫民时，只是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而不是诉诸实践和革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①] 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再次，抨击了费尔巴哈所谓"共产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曾经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他说："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是社会的人，是共产主义者。"[②] 在这里，所谓"社会的人"，不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而是指个人之间的彼此交往和互相需要。他认为，社会的人彼此不能孤立生活，只有你满足了他人的需要，你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因此，人们互相需要，互相友爱，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理论，纯粹是根据抽象的人逻辑推演出来的空洞范畴，而不是根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51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35页。

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这种理论完全可以为资产阶级所接受，它根本不包含共产主义的任何科学内容。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就是说，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随着对费尔巴哈批判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论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再把共产主义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而是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其他的任何哲学。

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大谈“人的解放”问题。这里所谓“人的解放”，就是扬弃宗教，使“人的本质”由异化到复归，即人性复归。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观察是完全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因而他对人的解放不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批判宗教的办法来解决的。但是，他批判宗教不是要废除宗教，而是要用爱的宗教代替神的宗教。这种用爱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来求得人的解放，丝毫不能使人的解放前进一步。在人的解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深受费尔巴哈异化观点的影响，但当他们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展开批判的时候，便消除了异化理论的影响，把人的解放问题完全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品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心史观批判的续续和深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讳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他们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是他们的最高原则。他们把英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德国的人本主义哲学混合起来，炮制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企图用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用人类之爱代替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他们宣扬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的反动观点，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集中到一点，不过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类之爱来代替共产主义。它是一种以宣扬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为中心，以调和阶级矛盾的泛爱说教为特征的反动理论。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制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彻底清算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过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概念，全面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形态》首先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把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里的“生活”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卷31页。

词，实际指的是后来提出的“社会存在”这个更加科学的概念。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谓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种实际生活过程表现在：（一）人们为了创造历史，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用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二）人们使用生产工具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活动，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一开始，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人口的增殖。这样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本身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相联系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分析了历史活动的诸要素及其关系，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口生产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就对社会存在作了科学的规定。在阐明社会存在的实质及其变化规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意识的起源来阐明意识对存在的依赖性。他们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在物质生产中，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才产生语言和意识。思想、观念、意识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正确的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的正确反映；错误的意识则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或颠倒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只能用社会阶级的分裂和对立来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力量，同时也是会上社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意识总是具有阶级性的。根据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必然要产生共产主义的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形态》还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一开始从事物质的生产活动，就必然发生双重的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自然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们征服自然的共同活动的能力。"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②。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都一定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部著作已经提出"生产关系"的概念，但使用最多的则是"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等等术语。这些术语都是"生产关系"这个科学概念不太准确的表述。生产力同交往关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他们根据生产工具、社会分工等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依次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的所有制关系，从而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指出：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的整个人类社会，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这就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动力。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的依次更替，说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③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般都是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还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1844年，他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把“市民社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仍旧沿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但却把它解释成社会经济基础这一科学概念。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81、82页。

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这里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经济基础”，它含有生产关系总和的意思。这里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内容。这里也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③国家和法是私有制的产物，又是为私有制而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二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分析论述，十分清晰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形态》还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的产生和对立并不是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同私有制同时出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便出现了社会分工。新的社会分工引起了阶级的划分。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1—4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37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分工同私有制是同时出现的。“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①]阶级的产生和对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情况，指出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在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阶级社会一直是在阶级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但是，阶级的存在和对立并不是永恒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私有制的被消灭，阶级就会被消灭。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条件，而且创造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过去的一切革命都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物质前提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按需要分配、人们可以在集体中自由劳动并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这种共产主义既不是空洞的理想，也不是出自道德的要求，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成就，是全面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可以概括如下：“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40页。

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① 到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唯物史观的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全面成熟。当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之后，他就着手在能够将革命理论变为革命实践的工人中间进行传播。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即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 所决定的。1847年前后，在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并不占支配地位，它只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各种空想共产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还不同程度地支配或影响着工人运动。这样，批判错误思潮，传播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创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革命来临前夕最迫切的任务。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把英、法、德、比、波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同时加紧进行对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改造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对各种影响工人运动的思潮和学说，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他们彻底批判了魏特林（1808—1871）的“手工业共产主义”、克利盖（1820—1850）的“爱的共产主义”、格律恩（1817—1887）的“真正的社会主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8页。

义”，以及蒲鲁东主义，清除了各种错误和反动的思潮和派别对工人运动的思想影响。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的继续和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写成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阐明了新的世界观。这两部伟大著作，列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批成熟的著作。

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科学表述

马克思在巴黎认识蒲鲁东，并同他有过交往。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0年，他因发表一本《什么是财产？》的书而著称于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指出过这本书的小资产阶级观点。1846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大肆宣扬保存资本主义来消灭贫困的社会改良方案。1846年底，当马克思浏览了蒲鲁东的这本书之后，立即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对蒲鲁东的新书作了评价，认为它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马克思在信中初步批判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错误观点，拟定了他写作《哲学的贫困》的详细提纲。1847年7月，《哲学的贫困》一书出版。它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哲学观点，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贩卖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观念和永恒理性的历史，胡说经济关系是人类理性中经济范畴的体现。这就把两者的真实关系完全搞颠倒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

系的理论表现。人类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而是生产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历史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因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形式，既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这里，马克思不再使用“交往关系”等术语，而是全部使用“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他重申社会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从而构成什么样的社会。

蒲鲁东根本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而也就根本不懂得阶级对抗和斗争，不懂得社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一直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都是以被压迫阶级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③就是说，阶级对抗的规律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于阶级对抗的发展，必不可免地会爆发社会革命。促进历史进步的社会革命，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指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存在。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①这里不仅论述了生产力的两个因素，而且阐明了革命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会成为全面革命。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表现。马克思在揭露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幻想中，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蒲鲁东根本不懂辩证法，但他却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加以歪曲和庸俗化，妄图用“矛盾”来建立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首先，蒲鲁东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炮制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不过是一些经济范畴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而且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主观排列次序。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这就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其次，蒲鲁东不懂得矛盾双方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他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富足”与“贫穷”的矛盾，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消除“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者的财富是由无产者的贫穷产生的，而产生资本主义形态的财富也必然产生贫穷。“富足”和“贫穷”作为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地共居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因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去消灭“贫穷”，是根本办不到的。再次，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里，把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分成肯定平等的好的方面和否定平等的坏的方面，好坏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方加在一起就拼凑组合而成每个范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就是消除坏的一方，保存好的一方。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诡辩论，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① 马克思在对蒲鲁东歪曲黑格尔辩证法的揭露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阐述。

1847年，马克思同蒲鲁东的论战，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后来曾经回顾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② 通过这次论战，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潮的批判，为改造“正义者同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扫清了道路。1847年初，他们加入了同盟，并开始对同盟进行全面的改组。1847年6月上旬，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经济困难未能出席，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决定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新口号代替“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这个旧口号；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了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从此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后来恩格斯还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对《草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与发挥。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这次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辩，马克思恩格斯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最后大会委托他们两人起草《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原理，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②

《宣言》精辟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就曾经作过论证；《共产党宣言》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对这一原理作了更加精辟的阐述。《宣言》明确指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阶级的事实。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宣言》进一步指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宣言》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阶级斗争从隐蔽到公开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而且揭露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从迷离混沌的社会状况中找出规律性来的一条基本线。

《宣言》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西欧的历史上，早在封建社会里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封建的或行会的手工业经营方式。但是，生产力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于是，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必然被打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而且果然被打破了。资产阶级逐步确立了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发展起来。当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大工业的时候，资产阶级经过革命，终于打败封建势力，夺得了国家政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宣言》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它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魔术般地把沉睡于地下的财富唤醒。社会财富成倍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而是加深了阶级对立和人民的贫困。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指出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危机期间，大量的产品和生产力被毁灭掉。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已经不再适应而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还锻造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阶级。《宣言》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科学结论。

《宣言》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无产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级革命的规律。资产阶级越发展，无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无产阶级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劳动力成为商品。现代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们不仅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受厂主的奴役。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起初是自发斗争，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后来是自觉斗争，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把斗争转变为起义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 ，组织成为政党，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发展成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资本主义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它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宣言》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是第二步，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宣言》还确定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任务。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资产阶级把自由、正义等等所谓“永恒的真理”，说成是社会发展一切阶段的共

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过去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千差万别，总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宣言》论证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瓦解的步调一致的。《宣言》在精辟论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任务，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最后，《宣言》庄严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

《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化为严整的科学体系，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最高理论成就，它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完整概括。《共产党宣言》的公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形成，是哲学发展史上空前的伟大革命。

①《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第　二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风暴和革命时期的发展

（1848—1871）

从1848年的欧州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列宁称之为“风暴和革命”的历史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刚刚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两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和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问世，完全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运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充分地显示了它在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重要的著作中全面总结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对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重要的论述，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科学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创立了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鲜明地表现了它所具有的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相结合的根本特点，使它成为内容完整而结构严密的无产阶级哲学思想体系。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民族压迫，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这次革命的风暴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法国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德国柏林发生了三月革命，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为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专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这次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在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①柏林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回到祖国参加革命斗争。4月，他们来到了科伦市，在这里主办《新莱茵报》，他们把自己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作为制定无产阶级策略的理论基础。不仅给无产阶级制定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为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创造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且随着革命发展进程，在每个革命发展阶段上提出了正确的政治斗争口号，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无情揭露和谴责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批判了民主派的半途而废和议会幻想，批判了工人运动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引导科伦、柏林和维也纳等地工人组织走上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查封后，6月马克思被驱逐出境。恩格斯则到巴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等登地，作为人民起义军的指挥官，亲自组织和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

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到英国伦敦。马克思主编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作并发表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光辉著作，全面地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三点新贡献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48年事变的进程光辉地证实了这一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欧洲革命的丰富经验中，成功地运用并发展了这一重要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地分析了法国和德国革命前的状况，指出这两个国家的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法国的“七月王朝”是一小撮金融贵族的代表，议会成了金融贵族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金融贵族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在发放公债和进行投机事业中发大横财。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越来越困苦。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三十六个邦和四个自由市各霸一方，各自为政，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封建土地所有制居于统治的地位，封建贵族几乎原封不动地享有中世纪的特权。广大农民和工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活悲惨，奄奄待毙。这些情况表明，革命前的法国和德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推翻金融贵族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已成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强

烈要求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1848年欧洲革命猛烈爆发的经济原因。1845年到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欠收，引起了物价的猛涨，加深了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满。1847年整个欧洲的工商业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使得广大人民对金融贵族和封建贵族的统治，更加不堪忍受。这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怨恨发展为起义。这就是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批判了把革命的发生看作是少数英雄人物偶然行动的唯心主义观点，说明1848年法国和德国之所以爆发革命，决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不可阻挡的必然表现，认为研究革命必然爆发的原因，不应从几个领袖人物的品质上去寻找，而应当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却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社会革命的经济根源，阐明了社会革命的爆发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思还从各个阶级的不同作用上来说明欧洲革命发展的全过程，从而正确地阐明了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他们指出，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虽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还不十分成熟；小资产阶级只满足于追求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剖析了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求革命，反对金融贵族和封建贵族，极力争夺革命果实，力图实现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因此，他们在革命

中畏首畏尾，动摇不定，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便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血腥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篡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掌握国家政权后，就立即向巴黎无产阶级进攻，用大炮和刺刀血腥屠杀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德国资产阶级在三月起义后得到了参加议会的权力，于是就极力保护德国封建贵族的统治制度，阻止革命向前发展，同封建贵族一道反对广大的革命群众。资产阶级的背叛，是1848年欧洲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部著作中，阶级斗争理论象一根红线贯串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欧洲革命的精辟分析，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阶级社会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史。

1852年3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精辟地概括了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新贡献。他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马克思坚持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来具体研究阶级斗争问题而获得的这三点新认识，完整地阐述了阶级从产生、发展一直到消灭的全过程，说明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揭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指出了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联系和消灭阶级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三点新贡献，划清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界限，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这三点贡献，把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把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联系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在实践上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任务的规定

革命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级状况不同，无产阶级面临的革命任务应当有所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任务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预言德国的资产阶阶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然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德国革命没有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倒是法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序幕的一次尝试。那么，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在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又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是1848年欧洲革命提出来的新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解决了这些新课题，并根据欧洲革命的经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的进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越彻底，资产阶级经济越发展，就越有利于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但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无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根本不同。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是要确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不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旧社会，彻底消灭剥削制

度，而是在追求它的狭隘私利，一旦这种狭隘私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它就要求赶快结束革命，以便使它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感到满意而舒服。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目的不在于改变一种私有制，而是要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改良现存的社会，而是要建立新的社会。它参加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它要求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然后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时，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阶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概括。在法国二月革命中，共和派资产阶级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临时政府。这时巴黎工人对新政府抱有幻想，相信共和国能够维护工人的利益，保障工人有劳动权、选举权。然而共和派资产阶级一掌握政权，就对工人采取敌对的行动。巴黎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而举行了六月武装起义。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参加起义的四万五千工人中，一万五千人被杀害，二万五千多人被判刑、流亡。血淋淋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原形，使工人阶级清醒地认识到，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改变无产阶级的处境完全是一种空想。在起义中他们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革命口号。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要范畴，使“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思想得到了重大发展，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区分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它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思想的核心，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内容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科学地分析波拿巴政变，阐明上层建筑诸因素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848年法国革命以二月巴黎革命为起点，以六月工人起义为转折，最后导致了帝制的复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从一个普通的下级军官一跃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许多人都发表过评论。著名作家雨果在《小拿破仑》一书中把波拿巴政变描绘成晴天的一次霹雳，认为政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把一个小人物看成了伟大的历史推动者。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看社会革命》中把波拿巴政变看作是以往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为路易·波拿巴进行了历史的辩护。马克思认为，这些评论都是片面的。他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但是人们不是在他们自己任意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社会的历史，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的历史。唯物史观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在这个前提下唯物史观承认个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天才的著作中，出色地运用唯物史观对波拿巴政变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

素，进行了精辟的解剖，说明了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如何使得一个平庸可笑之辈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生动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上层建筑诸因素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重要原理。

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是分析阶级斗争以及历史过程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极好范例。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①马克思认为，革命斗争的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是以现实的物质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但是，社会生活给人以假象，好象革命主要不是由物质的，而是以思想的动力和动机为基础。这种假象掩盖了对立的思想政治观念是对立的物质利益的反映这一基本事实。马克思揭露了这种错觉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由于物质利益为取得人们的理解而必须采取思想形式，而它却把这种相对独立的思想形式绝对化，抹煞了思想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通过历史事件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作用。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借用过旧约全书的先知形象，而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则借用罗马共和国的形式和思想作为它进行革命行动的思想动机。它们都是以颠倒的和虚幻的思想形式反映其真实的阶级利益，即为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这种虚幻的思想形式以及相应的政治纲领、政治口号，是为了不让参加民主革命的人民群众“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①

如果说，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虚幻的意识形态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级阶之间矛盾激化之后，它就变成掩盖阶级对立，迷惑和束缚无产级阶的革命主动性，为反革命力量效劳的东西了。马克思指出，在1848年革命时期，最初，资产阶级关于一切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及其他虚幻的革命观念，在一定条件下，暂时表达了各种革命力量的共同利益和目的，但后来就成了涣散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并为反革命作舆论准备的工具，成了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空话。马克思根据法国1848年革命进程指出，博爱这个口号在二月是指建立共和国，它还表达了人民力量的团结和表面上消除了阶级对立；而在六月，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起义的内战中，就已经暴露了它的真正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②

此外，马克思还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政治代表人物之间的特殊矛盾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危害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转向独裁专制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还在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统治形式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③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分裂。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表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具有阶级性，而只是表示意识形态独立性假象的加强，其实在这种假象后面存在着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联系。马克思谈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态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0、4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5页

时，揭露了他们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马克思在考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特点及其作用时，也分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作用。他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指无产阶级革命——引者注）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②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需要虚幻性和颠倒性，而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作用的论断，不仅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具体化了，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为他辩证地分析政治斗争，分析波拿巴政变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时，不仅分析了当时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第606页。

法国社会的客观情势，而且说明了传统意识形态，以及路易·波拿巴个人投机钻营活动的作用。他指出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建立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曾经是保障法国农民政治解放、生活富裕的重要条件，但从拿破仑一世到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虽然只有两代人的时间，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已日趋瓦解，农民负债累累，生活逐渐恶化。保守的农民十分怀念昔日的良辰美景，期待拿破仑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历史的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迷信心理，似乎一个叫做拿破仑的人将会恢复以往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把他们失去了的一切福利再送还给他们。他们是小生产者，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都希望寄托在能给他们以雨水和阳光的“主宰”身上。路易·波拿巴作为波拿巴一世的侄子，他正好利用法国农民的这种保守性和依赖性，骗取了占法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的信任。在总统选举中得到六百万张选票而被当选为法国总统。

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共和派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共和派资产阶级掌权后，就血腥镇压巴黎工人阶级的六月起义，从而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孤立起来；它掌权后所实行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又损害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促使小资产阶级对它大为不满而倒向路易·波拿巴；而在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等金融贵族则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路易·波拿巴身上。结果，共和派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反对君主派势力的力量而在选举中失败，于是路易·波拿巴当上了总统。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是国民政权转移到君主派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制覆灭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还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主观条件。路易·波拿巴是个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他善于看风转舵，招摇撞骗，惯于用流氓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在总统选举中，他四处游说，一方面用所谓“红色幽灵”来恫吓大资产阶级，把自己装扮

成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人；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许下种种诺言，把自己当成他们的救世主。他当上总统后，一方面强化国家机器，用巨款收买军官士兵，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一方面收罗大批流氓、骗子组成秘密组织"十二月十日会"，使这些人为他摇旗呐喊，出力卖命。路易·波拿巴不断播弄是非，故意挑起矛盾，使他的敌手们在斗争中相互削弱而被他打败。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一年后他自称为皇帝，用法兰西帝国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马克思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为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复辟帝制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及时地利用了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各个阶级之间暂时出现的均势。在法国，由于几年来的公开流血的武装斗争，各个阶级已疲备不堪，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害，已处于一种衰竭的状态。因此，他们厌恶武装冲突，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制止一切公开的流血斗争，使阶级斗争能够在和平和合法的形式下得到顺利进行，以便积蓄力量，等待将来决战。正是阶级斗争的这种暂时平衡的局势，使得路易·波拿巴能利用他所控制的权力，特别是军队，强行地把议会共和国改变为军事专制制度，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依靠军事和官僚的直接暴力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说明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把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从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他对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准确而生动的描绘，正如恩格思所说的那样，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的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它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从对路易·波拿巴这个人物的深刻剖析中具体地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重要原理，使唯物史观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

部著作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全面研究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

第二节　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五十到六十年代，欧洲从革命的震动转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国家得到飞快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产阶级社会基本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开始高涨。由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工人动动的蓬勃兴起，工人政党的产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第一国际的建立，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传播。

为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前途，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特别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要著作，注意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考察。在1850年到1851年间，马克思写成了十八本经济学札记。1856年他着手写作经济学著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记录。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后，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拟定了写作巨著《资本论》的计划。《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已把《资本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初步叙述，1865年《资本论》整部手稿完成。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已经最后完成。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同政治经济学以及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同其他学

科有直接的联系。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资本论》的创作，并为这部著作的传播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还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和论文，开始进行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重要发现，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为严整的科学体系。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论证，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唯心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初步的论述。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及其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式的表述。①

马克思的这个经典表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它说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指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说明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社会革命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冲突的必然结果；说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形态的更替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它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历史的发展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社会。

1859年发表的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序言，“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说明”①，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自从1844年，特别是1850年以来进行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从1846年以来马克思的著作如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以及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思想，甚至一些文字表述，也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只是到1859年的序言中才以完整的、经典的形式表述出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作为方法论提出来的。序言表述的基本原理构成了从哲学上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历史和经济学的指南。恩格思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书评中，曾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主要成果有两点：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经典论述，二是运用辩证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制定的唯物辩证方法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制定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成果。因为没有唯物辩证方法，就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为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钥匙。唯物史观正是以这些原理和方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列宁在同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方法论意义，证明了1859年的序言同《资本论》的内在联系。他说：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85页。

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①而这个分析的最终成果，就是《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系统研究，用极为丰富、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对生产方式的科学论证

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分析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对生产力这一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劳动同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人类的劳动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活动。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社会现象，是受自然条件制约的。马克思还考察了生产劳动，指出，生产力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

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③马克思在考察劳动过程时，把它的简单要素规定为三项，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劳动本身是劳动力的使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作为一种自然力而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使自然物质在形态上发生变化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819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页。

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劳动者运用他身上的体力和智力，使用劳动器官和生产工具，作用于自然物质。

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被加工的自然物质。有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如原始森林的树木，矿藏中的矿石等），还有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加工的劳动对象（如织布用的纱、制造机器用的钢铁等原料）。

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此外还包括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如厂房、仓库、运输工具等。生产工具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劳动者的活动传达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又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劳动的发起者和控制者；生产工具等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制造和使用的，而劳动对象的形态变化则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劳动者在劳动之前就具有的劳动目的的的体现。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运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生产力的内部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

生产劳动、生产力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下实现的，是同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生产关系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它们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这是侧重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过程来说明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分析商品的生产领域，又把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规定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不同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特点，而且

具体考察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从而具体阐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重要原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造成了两种商品所有者的分化，一是货币所有者，他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是自由劳动者，他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前者要购买劳动力，用它来增殖自己占有的价值总额，而后者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他人劳动。货币在开始时并不是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资本。而封建社会的解体，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得到了解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通过资本主义的竞争，使资本家发生了两极分化，这表现为资本的集中，使少数资本家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大多数资本家则被排挤而倒闭。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增长，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增长。

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趋势造成了资本的垄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将为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的考察，说明了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而一种生产方式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这是生产力发

---

①②马克思：《资论本》第1卷，第831—834页。

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代替过程是客观的、有规律的、人们即使探索到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但人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来取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根源，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论证。

对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阐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基础都是由它所特有的生产关系构成的。马克思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生产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②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决定了社会的其余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例如：阶级结构、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国家机构、家庭关系、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学 艺术、宗 教和哲 学观点等等。所有这一切因素与生产关系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个自身完整的有机体。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取得的特殊成就是，具体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内部结构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他在考察资本主义方式的过程中，随时随地探讨资本主义社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3页。

会的上层建筑，从而生动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到家庭关系等等和盘托出，使骨骼有血有肉。这样，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马克思指出，国家政权、法律制度对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揭露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时说，所谓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由从属地位和行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封建制度所给予他的一切生存的保障全部被剥夺，而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以英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这种剥夺的具体情况，指出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他又指出，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获得利润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处于正常的依赖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是原始积累的各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中一部分（如殖民制度）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顺利地促进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这句名言说明暴力本身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它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时对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马克思在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经济根源，批判资产阶级的自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由、平等、博爱观和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具体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他指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只有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劳动的社会关系即一个人的劳动对其他人劳动的依赖关系，才取得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形式，用物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后，一些人对商品就产生了一种神密观念，把商品特别是货币看作是支配人们命运的力量，而对之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表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商品交换领域里进行的，劳动力的卖者和买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出卖或购买劳动力。但是，这种承认双方都有权利进行商品交换的法权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十分明显，劳动力的购买者是资本家，他可以随意支配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出卖者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是忍受资本家的奴役、剥削，象牛马一样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它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重商主义所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产业资本不发达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加速本国货币积累的要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级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时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到了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在实践方面或理论方面阶级斗争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之后，它的丧钟就敲响了。这时，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看它对资产阶级有利还是有害，公正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攻击，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于是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生动分析，深刻地说明了思想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依赖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的阶级性。

《资本论》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不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结合起来考察，而且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说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指出，劳动者对其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存在着。这种生产方式只是同生产和社会的自然产生的狭隘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消灭自身的物质手段而被消灭，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就被形式上是以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进步，有其必然性，而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它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必将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后，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又开始了对私有者即剥削工人的中小资本家的剥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资本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这种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运动，不仅为它的自身灭亡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同时还造就了埋葬自己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马克思通过资本积累趋势的科学分析，具体地阐述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客观规律，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形态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过程，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剖，具体、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用丰富的材料和典型的事例全面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和阐述

1858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写信 给恩格斯，说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番，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 尔所 发现、但同 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完整而具体地体现在《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他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创立了辩证逻辑的科学体系，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逻辑这三者的统一，把辩证法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辩证逻辑科学体系的制定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逻辑的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完善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想。列宁指出，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要正确地运用辩证逻辑及其方法，首先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叙述的方法以研究的方法作为基础。所谓叙述的方法，就是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通过范畴的一系列的转化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辩证逻辑方法的成功运用，使得《资本论》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综合地运用了各种辩证逻辑的方法，形成了辩证逻辑方法的整体，制定了辩证逻辑的科学体系，这里主要说明从抽象到具体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两种辩证逻辑方法及其具体运用。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事物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所谓抽象，是思维所把握的对象的最简单的规定，而思维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由最简单的范畴开始，经过范畴一系列的转化，达到具体范畴，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在思维中出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出发，从揭示商品的内部矛盾过渡到分析货币，接着从分析货币过渡到资本，从资本过渡到剩余价值，从绝对剩余价值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再过渡到工资。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考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商品开始逐渐展开，形成越来越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范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一个侧面，它还有资本主义流通这一重要侧面。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主要考察资本主义的流通，先分析个别资本的流通，然后过渡到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前者是资本主义流通的简单、抽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24页。

象的形式，后者是它的比较丰富、具体的形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前两卷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这两个侧面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主要说明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的分配，逐渐地提出了利润、平均利润、生息资本和地租等具体范畴。总之，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商品这个简单、抽象的范畴开始经过范畴的一系列转化和联系，最后达到了阶级这个内容最丰富最具体的范畴，从而在思维中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个具体事物。

恩格斯在说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时说："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 "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②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个方法的实质是要按照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安排逻辑范畴的顺序，使逻辑思维的展开同历史过程的本质一致起来。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来安排范畴的顺序，使《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成为透彻和精辟地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最佳结构。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关系赖以旋转的轴心。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而是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这是因为要认识资本的本质需要考察货币蛹化为资本的过程，而要说明货币的本质又需要了解货币是如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4页。

何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产生出来。从商品——货币——资本这样来安排它们之间的顺序，把商品规定为逻辑的起点，不仅符合了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要求，而且是商品交换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缩影。

在从逻辑范畴的联系和转化中，从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过程中，整个逻辑思维的行程，又是以历史的东西作为它的基础。资本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马克思把资本这个中心范畴放在商品、货币之后来分析。同时，资本又是一种运动过程，因此，马克思在从本质上说明了资本的许多规定之后，才进一步分析资本的形态变化，提出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个范畴。最后，资本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马克思在对资本形态变化的分析之后，才提出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范畴。可见，整个逻辑思维的展开，决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它是资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理论总结。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资本论》通过商品这种物的关系来揭示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阶级关系。阶级是《资本论》逻辑的终点，它以扬弃的形式把在它之前各种范畴包含在自身之中，是全部范畴中最丰富最完满因而最具体的范畴。只有阶级这个范畴，才能完整而准确地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

《资本论》的逻辑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进行理论概括的巨大成果。

唯物论证法基本规律的运用和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从商品分析着手，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进而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积累

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部复杂内容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辩证发展的全过程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在运用矛盾分析法来揭示资本运动全过程的同时，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因此，马克思就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首先，把商品分解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并对每一方面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论述。其次，马克思对商品生产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这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以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成了商品。马克思对这种特殊的商品进行全面的研究，指出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受到文化水平、历史条件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它的使用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使用价物不同，它具有一种形成新价值的属性，这个新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其超过部分便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最后，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认为这个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无产级阶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分析了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后，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首先，在资本主义协作阶段，劳动过程从分散转为统一，一方面生产力有了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的财富被资本家独占。其次，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结果工人更加隶属于资本家，生产工具专门化，劳动强度加强，另一方面迅猛增长的社会

财富开始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在这一阶段，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已有暴露。最后，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一方面由于机器和科学技术的采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更加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他们成了社会富翁，过着骄侈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大批工人失业，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进入了衰败的时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资本运动进行矛盾分析的同时，还对资本运动的质和量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证了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分析它的交换价值（价值）的质和量及其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价值形态的发展过程，从而说明了货币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是怎样分化出来的。其次，马克思进一步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上说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指出货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货币最低额大大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所有者才能成为资本家。马克思指出，这是单纯的量变到了一定点后就转化为质变的典型事例。最后，马克思分析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社会结合的情况不同而引起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情况。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协作在开始时同行会手工业只有量的差别。但是，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发生生产上的质变，造成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方面的变革。这是因为许多力量融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62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资本运动进行矛盾分析的同时，还对资本运动的否定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阐明了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本的总公式，在货币——商品——货币中，从货币到商品，是第一次否定；从商品到货币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时的货币是增殖了的货币。资本的总公式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产业资本的总公式，指出在从货币到商品的第一个否定中，资本家用货币买到了两种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然后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但它不会增加价值，产品中新增加的价值完全是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即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资本家用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强迫工人劳动，为他创造出比劳动力的价值更多的价值。在从商品到货币的第二个否定中，资本家在流通领域里，把商品变为货币，他得到了一个货币的增殖额。这个货币的增殖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为了源源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使资本不停地运动。产业资本的重复循环，剩余价值的连续产生，形成了资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最后，马克思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而资本主义的积累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列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本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

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列宁的这段话，概括了《资本论》辩证法的特点：一、《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以实际的经济材料为基础，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二、《资本论》的辩证法从普遍存在的事物的元素形态开始，揭示事物的矛盾自始至终的运动。它通过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对立的运动来说明这一过程到另一过程的推移，从而揭示出资本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三、《资本论》的辩证法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结构，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有机地结合辩证法的其他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通过范畴的一系列转化和联系，在思维中再现资本这一事物的具体。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资本论》的辩证法虽然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具体运用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它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充分而具体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且还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来全面而生动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辩证性质和历史过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关系的本质和现象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作为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货币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工资形式则完全消除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一切痕迹，模糊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真实关系；商品价格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竞争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造成商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品的价格似乎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这种假象。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各种不同的甚至虚幻的现象揭示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本质，并从本质上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现象。

马克思还分析了经济关系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相互关系。他在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时是把它作为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形式区分开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凝结物，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作为价值是物化的人类劳动，而货币这种特殊商品是价值尺度的表现形式。在商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卖和买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一种社会形式，而它的真实内容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购买劳动力，使更多的工人为他创造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只有注意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区别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资产阶级学家的错误，是仅仅注意经济关系的物质内容，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形式，这样他们就看不清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看作是永恒的东西。

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时，使用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一对范畴。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产生买和卖的分离，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破坏支付的连锁关系，这就使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经济危机的爆发还未具备必要的条件，只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才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要相对狭小之间发生尖锐冲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爆发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从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运用中可以看到，马克思

严格遵守唯物主义原则，他把范畴看作是现实关系的抽象，并按照事物的辩证结构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来运用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从而具体地再现了事物的本来面貌。

《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结晶，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教材。《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深入研究《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问题，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节　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1870年7月19日，由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用外交上的多种阴谋挑衅的结果，法皇拿破伦第三向普鲁士宣战，法国和普鲁士两国统治阶级为争夺欧州霸权而进行战争。从8月4日到8月6日，在德法边境上两国军队进行了三次大会战，法军连连失败，9月2日，路易·波拿巴及其部下大约十万人在色当投降。消息传到了巴黎后，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路易·波拿巴统治十八年的反动帝国政府被铲除了。但是，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是由前立法院议员中一些保皇派与共和派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在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包围巴黎的严重情况下，暂时容忍“临时政府”的存在。同时，为了监督“临时政府”，保卫巴黎，巴黎无产阶级迅速建立了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三十万人的国民自卫军。“临时政府”顽固执行卖国投降、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广大工人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奋起战斗，保卫自己的武器和生存。内阁总理梯也尔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逃到了凡尔赛。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国民自卫军占领了“临时政府”的重要部门，由巴黎工人选举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政权，伟大的巴黎武装革命取得了胜利。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光荣诞

生。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工人在毫无借鉴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探索建设无产阶级国家的途径，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施了大量的革命措施，充分地显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极端仇视巴黎公社。梯也尔和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从4月2日起向巴黎反仆，5月21日反动军队闯入巴黎市区。为捍卫巴黎公社，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流血斗争。5月28日，震惊世界的巴黎战斗结束，无产阶级遭到了反动资产阶级的血腥屠杀。巴黎公社虽然仅仅存在72天，但它的光辉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早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半年，马克思就向巴黎工人提出警告："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①然而当巴黎工人出于对"临时政府"的强烈不满，毅然决然地举行革命起义后，马克思不仅不责备工人们的革命行动，而且无条件地支持公社战士。他一向坚决反对任何把革命当作儿戏的行为，他果敢地同那些随心所欲地干"革命"的领袖们展开斗争。但是当群众已经起来战斗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和他们站在一起。马克思知道，"建立"公社的，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1876），在公社委员会里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比起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来，只是极少数。但是他们是最勇敢最有见识的战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们的创举给予极大的关注，日日夜夜为公社的事业操劳。在公社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天，5月30日，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就发表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唯物史观作出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

重要贡献。

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早在《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应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凭借无产阶级专政来保护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是，究竟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这个新的国家应该是什么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什么样？当时是不可能作出科学回答的。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曾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① 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马克思对巴黎工人革命实践，他们实行的政治和社会措施作仔细分析，从而得出了新的认识。他写道，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革命，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统治阶级而进行的革命。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用更加简练的语言对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这个概括说明了无产阶级必需使用革命暴力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这是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深刻的考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指出国家政权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国家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过去曾经充当过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而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发展、日趋激烈，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它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的实质。在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性质就更加公开的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政府用刺刀、大炮来惨杀工人和劳动人民，把大批的革命者投入监狱。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它来为无产阶级服务。

马克思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曾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思想，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时，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用人民武装代替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这是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本保证的新论断。马克思指出，3月18日巴黎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国民自卫军打垮了反动军队，占领"临时政府"的重要部门而取得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胜利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特别是它的军队。国民自卫军没有立即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彻底消灭残余的反革命武装；公社没有逮捕流落在巴黎市内的"临时政府"高级官员，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国民自卫军虽然占领了法兰西银行，但没有接管银行财产，结果使凡尔赛逃亡政府从法兰西银行取走了两亿五千多万法朗的反革命经费。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巴黎革命的领导者面对资产阶级残酷屠杀和镇压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沉湎于用人道主义来感化剥削者的幻想，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是用革命暴力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结果使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使凡尔赛流亡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

来纠集反革命势力进行反扑，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为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公社是劳动者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丰富经验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发现了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他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该铲除全部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公社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防范他们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恩格斯说，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巴黎公社为防止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采取了许多措施：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务交给由人民普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担任，而且规定选民可以随时撤换丧失信誉的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负责向人民说明各种措施的理由；它规定了国家高级官员的薪俸要相当于工人的平均工资；它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由公社委员组织各种委员会，直接管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在马克思看来，这都是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性的标志。巴黎公社的这些经验至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社是工人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为了夺回失去的天堂，他们要作垂死的挣扎，进行疯狂的复辟活动；一些既得利益者也妄图败坏、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国际上的剥削阶级也相互勾结阴谋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激烈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国家机器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抗和阴谋活动，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

马克思还对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阶级斗争在形式上的变化，提出了一些设想，认为公社将提供合理的环境，无产阶级将严格按照法律和法令行事，反对任何破坏法制的行为。

公社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改革，使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有力工具。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经济上的解放，首先必须消灭使劳动者受剥削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即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这方面，公社提供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公社曾作出决定，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由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统一组织全国的生产，以克服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公社还对私营铁路进行监督，并对承包国家订货的商人和私人实行严格的监督。公社还举办了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在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方面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比如公社成立了失业工人职业介绍所，制定了延期交纳房租的法令，禁止产业主对工人罚款，规定十小时工作制，没收大房产主的房屋让工人居住，宣布义务免费教育，草拟了设立托儿所的法令，颁布了取消宗教经费预算和政教分离的法令，等等。而这些经济上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只有通过公社这个政治形式才能实现。巴黎公社当时处在资产阶级重重包围之中，面临着

严重的军事斗争，许多措施的实施还未能全面展开，但它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新变化，清楚地说明公社的确是无产阶级终于发现的使劳动者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宝贵经验的同时，对公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了一篇导言，指出公社的领导虽然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是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和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他们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而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比蒲鲁东好些。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都不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要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的道路上顺利前进，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宝贵经验教训，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一百多年前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创举至今仍在鼓舞着革命的人们去为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灿烂的一页，已载入史册。

第 三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巴黎公社革命后的全面发展

(1871——1833)

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在西欧北美诸先进国家，随着资本积累和集中的不断加强，出现了各种垄断组织，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走向了全面反动。在政治上，他们与封建势力结成反革命“神圣同盟”，利用国家机器，颁布种种反动法令，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在思想上，他们拚命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再从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来看，这正是欧州“风暴和革命”后的暂时低潮时期，也是为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作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队伍在迅速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无产阶级政党也在大批产生。为了对抗正在迅猛聚集和团结起来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利用一小撮工人贵族，大肆宣扬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千方百计地从无产阶级内部来瓦解工人运动。

时代和实践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用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迎接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时代和实践也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上

了新的特点，即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自然观；通过对杜林主义的批判，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简言之，通过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仅形成了更加完善的科学体系，而且也步步深入到了无产阶级和进步科学家的头脑中。

第一节 在批判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

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非常法”时期的“苏黎世三人团”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机会主义派别，其共同特点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克斯同这些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写成了诸如《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政治冷淡主义》、《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哥达纲领批判》、《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等光辉著作，彻底批判了上述种种机会主义思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阐述无产阶级的国家理论

巴枯宁（1814—1876）是第一国际后期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头子。他早年参加俄国的民粹派，后又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六十年代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巴枯宁为头子的无政府主义集团，是隐藏在第一国际内部，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国际主义运动的

机会主义派别。它以“异常激进”的面目，用“极端革命”的言辞，推行一条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无政府主义路线，配合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巴枯宁活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那时正是欧州各国的反动政府围剿拥护公社的第一国际的时候。法国政府颁部法令，规定加入国际的成员就足以构成刑事罪。德国俾斯麦政府把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定了叛国罪，判了徒刑。在西班牙，国际的支部被取缔。在伦敦，许多总委员会委员被特务跟踪。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也发生了争执。英国职工领袖们不同意马克思有关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而退出了国际。就是在这时，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也加紧了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攻击。他们企图排斥工人运动中的科学共产主义，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阴谋从内部搞垮国际。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击了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在同巴枯宁的斗争中。他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更加具体化了。

首先，巴枯宁故意歪曲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胡说什么国家是由宗教意识“创造”出来的，是产生一切人间罪恶和苦难的根源，就连资本也是由国家创造的。因此，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不是资本而是国家。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深刻揭露了巴枯宁的国家学说的唯心主义实质，而且还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指明了国家消亡的根本途径——废除资本，实行社会变革，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进行革命的改造。

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的罪恶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①针对这种恶意挑战，马克思尖锐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他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②在回击巴枯宁的挑战时，马克思不仅重申了他早在1851年底至1852年初（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提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一重要思想，而且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决不能一建立起来就立即取消，而是必须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彻底消灭为止。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极为重要的补充。

经济是整个社会形态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在论述国家的起源、实质、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等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一定经济条件出发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巴枯宁不承认经济条件的决定作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639页。

用，总是主观随意地用个人或资产阶级的意志去解释国家，因此，他的国家学说必然是唯心的，注定是要破产的。

其二，巴枯宁别有用心的反对一切权威，鼓吹绝对自由、自治和无政府主义。在他心目中，权威和国家都是“祸害”；只有不要一切权威、一切国家、一切法律、一切限制，才有所谓个人“最充分的自由”。因此，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炸毁一切国家，根除一切权威，以实现“美妙”的“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①。这一谬论一出笼，立即就遭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绝对自由，自由和权威总是相对的。自由是哲学范畴，也是政治概念。作为哲学范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它要受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作为政治概念，自由属于上层建筑，它要受经济基础的支配。不受任何“权威原则”约束的绝对自由，过去和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恩格斯深刻指出，权威并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确立起来的，而是依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的，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环节，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不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需要权威，就连一列火车、一艘轮船也都离不开权威，甚至在只有两个人组成的社会里，没有权威也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权威和国家又是有区别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权威则不然，即使在国家（这也是一种权威）消亡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诸如经济权威等，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巴枯宁一伙象仇视国家一样象仇视权威，他们硬要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恩格斯质问说：“这些先生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紧接着，恩格斯还深刻指出，巴枯宁一伙如此不遗余力地咀咒权威，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这只是无知地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处心积虑这样干的，那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①

其三，巴枯宁以“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的制度”为理由，硬要无产阶级“放弃一切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巴枯宁这种荒谬主张，精辟地论述了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马克思说：“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②恩格斯也说：“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③事实上，无产阶级要想在经济上获得彻底解放，首先就要参加政治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进行政治斗争，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就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

“放弃一切政治”，纯粹是自欺欺人之谈。谁都知道，在资本统治下，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然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明确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可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政治，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政治。事实上，竭力鼓吹“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之流，原来曾经热心支持意大利资产阶级议会，甚至还无耻投靠资产阶级警察局，充当资产阶级暗探，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可见，巴枯宁一伙要人们放弃的并不是一切政治，仅仅是无产阶级政治而已。对于资产阶级政治，他们不仅不放弃，恰恰是非常热衷的。所以，马克思说，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3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5页。

产阶级自由。恩格斯也说，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怀抱。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几年激烈斗争，1872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彻底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政治上、组织上的揭露同思想上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它的国家学说，得到了一系列新的补充和发展。

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围绕着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这个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他早年投机1848年德国革命，后又投机工人运动。六十年代初，他窃取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乘机结成拉萨尔派，疯狂推行改良主义路线。拉萨尔死后，其同伙照旧推行拉萨尔路线，继续危害德国工人运动。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在爱森纳赫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德国工人运动中就出现了爱森纳赫和拉萨尔两大派。为了共同对敌，两派合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马克思恩格斯原则上是赞成合并的，但也指出，合并是有条件、有原则的。条件是拉萨尔派不再搞机会主义和分裂活动；原则是必须坚持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可是，李卜克内西等却向拉萨尔派作了原则的妥协和让步，于1875年5月，在哥达城通过一个充斥着拉萨尔观点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这个纲领一出世，马

克思立即抱病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许多书信，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国家学说，提出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的理论。

拉萨尔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①。这是极端露骨的唯心史观。因为它把精神、道德、自由这些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视为国家的基础，否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这就造成了国家是超经济、超阶级的假象。实际上，拉萨尔主义就是把争取“自由国家”作为奋斗目标的。针对拉萨尔掩盖国家阶级实质的谬论，马克思尖锐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国家，这决不是工人的目的。恩格斯也深刻指出，所谓自由国家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和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决没有超阶级的国家，也没有抽象的自由。

正是在揭露“自由国家”的反动实质时，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也需要有自己的国家。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明确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科学概念，并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作为国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0、21页。

家制度与整个过渡时期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列宁曾这样说过："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从把国家当做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出发，拉萨尔企图用所谓"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尤其指望通过由现存国家出面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拉萨尔主义的"分配决定论"。它不仅颠倒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关系，而且也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事实上，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由属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或法权决定的。

在批判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时，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并着重论证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关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马克思指出，这"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阶段，消费资料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②这就是后来斯大林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

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提出并论证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又一新贡献。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批判“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捍卫阶级斗争理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通过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力量也大大增强了。这种形势吓坏了反动统治阶级。以俾斯麦为首的反动政府，借口1878年5、6月间发生的两次刺杀德皇事件，强行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非常法”施行后，反动政府查禁社会主义刊物，解散工人组织，大批逮捕、流放社会主义者，造成了全国性的白色恐怖。党的领导人没有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在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惊慌失措，犹豫动摇，采取右倾投降主义方针，甚至公开声明自行解散工人党，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损失。不少基层党组织瓦解，许多不坚定分子退党，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乘机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赫希伯格（1853——1885）、施拉姆（生卒不详）和伯恩施坦（1850——1932）（即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发表题为《德国社会主义回顾》一文，公开叫嚣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阶级斗争，要挟党放弃走暴力革命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9年9月，联名写了一封《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的通告信》（以下简称《通告信》），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改良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通告信》彻底清算了“三人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态度，他们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充分肯定了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把它强调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新发展。

《通告信》批判了“三人团”篡改党的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自己可以解放自己的观点。“三人团”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要想得到解放，就得服从“有教养”、“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这些人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想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改变党的阶级性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其他阶级中的人参加党，“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②] 让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党内，就会磨灭党的锐气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应当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乏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③]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37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但致命地打击了“三人团”之类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也教育了党的某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第二节　在同杜林的论战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

1875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也给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内，党的理论水平降低了，《哥达纲领》中所表现的理论的不成熟性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乘机活跃起来。“江湖骗子”杜林跳出来分裂德国工人运动，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杜林（1833——1921）是柏林大学的讲师，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家。早在六十年代，他就炮制攻击《资本论》的文章，开始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营生。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接连发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哲学教程》等著作，发起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杜林狂妄叫嚷他发现了“终极真理”，公然扬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改革”。霎时间，杜林主义就象瘟疫一样迅速在德国党内传染开来，甚至把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也迷惑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使党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坚决支持下，毅然搁下正在写作的《自然辩证法》，专门“去收拾无聊的杜林”，去制止“杜林热”的传播。从1876年5月起，恩格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连续刊登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后来，于1878年汇集成书，书名叫《欧根·杜林先

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译名叫《反杜林论》。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为了彻底清算杜林的大杂烩“体系”，“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变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的“连贯的阐述”。[1]因而，可以说《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科学共产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看做一个体系，但是直到《反杜林论》才有机会第一次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整个体系。

列宁谈到这本书时曾经强调说：“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2]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

批判杜林“世界模式论”，阐述辩证唯物论

杜林把自己的哲学标榜为“自然体系”、“现实哲学”、“除去宗教”的无神论哲学，他先提出一个“世界模式论”作为“创世”的模型，然后再从中引出他的“自然体系”和“现实哲学”来。由于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杜林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所以，恩格斯首先就从这里入手进行批驳。就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恩格斯精辟地论证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

针对杜林从“模式”、“原则”出发来构造世界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恩格斯尖锐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①这既深刻揭露了杜林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又无情戳穿了杜林暗中抄袭黑格尔哲学的老底，并科学地论证了从客观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只能是意识适合自然，思维适合存在，思维规律适合自然规律，而不能是相反的。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割裂开来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决不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因为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②。这又从思维和意识的起源问题上更进一步论证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原理。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论证了思维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他说：“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③然而，思维和意识的这种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思维和意识都来自外部世界，都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杜林根本不懂得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思维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从“世界模式论”出发，杜林还从思维中引出了世界的统一性，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对这个含糊不清的命题，杜林作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8页。

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说，思维的本质在于综合，而存在一旦被思维，就会“产生”出“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这就等于说，先有思维的统一性，而后才有存在的统一性。在批判杜林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时，恩格斯提出了一条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即“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 哲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客观存在着的现实世界是物质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思维和意识也是高度发展、高度完善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属性。因此，决不能离开世界的物质性去谈它的统一性。

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杜林还否认物质是一切发展变化的基础，割裂物质和运动以及物质运动和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时空概念决定现实的时空，时空概念的变化决定现实时空的变化。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时空观。在批判杜林这一谬论时，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和时空观，强调了物质运动和时空的客观性，阐明了时空概念只是现实时空的反映。他从物质和运动是有机统一的这一根本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说：物质存在的方式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实在基础，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② 他还指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才能运动，时间和空间以外的物质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恩格斯还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深刻论述了时空的无限性和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99页。

有限性的相互关系原理、他指出："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① 但是，无限又是离不开有限的，无限是由无数有限组成的。这就驳斥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谬论。恩格斯这些论断，已经被后来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以新的形式所证实。

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论证了唯物辩证法

杜林不仅在物质运动和时空问题上顽固坚持形而上学观点，而且还直接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一面极力混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界限，一面又别有用心地把唯物辩证法贬低为证明的工具，肆意否认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清算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恩格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首先是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这是恩格斯给唯物辩证法下的第一个科学定义。这个定义极其清楚地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关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区别在于，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③ 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它揭示的不是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因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181、52页。

此，它决不是什么证明的工具，而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其次是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针对杜林否认一切矛盾，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的无有生命的，那的确就不需要任何内在矛盾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完全够用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①。很明显，恩格斯是把矛盾当作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源泉来看待的，这就抓住了辩证发展观的实质，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同时，恩格斯还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认为从简单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到最复杂的运动形式（思维运动），从无机物到生命活动，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什么事物的运动不是由矛盾推动的。

针对杜林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诬蔑，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进到飞跃的过程。他说：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关节上就能引起质的飞跃。就是说，量变、渐进是质变、飞跃的必要准备，质变、飞跃则是量变、渐进的必然结果。质变和量变总是互相作用的。同时，恩格斯还用大量事实论证了“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样也改变事物的量”①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针对杜林把否定之否定规律诬蔑为“文字游戏”和“黑格尔的三段式”的谬论，恩格斯还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观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他强调说，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②。在论述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恩格斯还科学地规定了辩证的否定观，把它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鲜明对立起来。他指出，辩证的否定决不是外力强加的或主观随意的，也不是简单的、绝对的，而是事物本身内部矛盾推动下的自我否定，是发展和联系的环节，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使事物沿着螺旋式道路曲折上升的规律，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这样连贯地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用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现象论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无论对于具体科学或哲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恩格斯还论述了必然和自由等一系列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他在研究这些范畴时，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的。例如，在批判杜林关于必然和自由的谬论时，恩格斯就着重论述了必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关系。他在强调必然是自由的前提的同时，又肯定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他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③恩格斯论述范畴的方法，对我们是有重大教益的。

---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181、153页。

批判"终极真理"论，阐明认识的辩证法

在真理问题上，杜林是一个十足的形而上学独断论者。他离开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片面夸大人的思维的"至上的意义"，说什么真理全在他手里，他的体系就是永恒的、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在批判杜林的"终极真理论"时，恩格斯着重阐明了认识的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矛盾的，它"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这意思是说，就整个人类世代相传的认识本性、使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至上的；但人的认识活动又是通过一代代、一个个的思维着的个人来实现的，而任何个人的认识活动又总是要受种种条件限制的，因而其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不至上的。思维的无限性、至上性正是通过一系列有限的、不至上的思维着的个人来实现的。人类认识就是在这种有限与无限、不至上与至上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在论述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时，恩格斯还阐明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真理和谬误同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就是说，真理和谬误诚然是互相对立、不容混淆的；但二者的对立又是相对的。超越一定的范围，真理和谬误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以，恩格斯说："拥有无条件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①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真理也不例外，它也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真理是由相对向绝对不断接近的，或者说，绝对真理是通过一系列相对真理逐渐实现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同杜林的形而上学独断主义划清界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象杜林那样，把自己所获得的一些认识吹嘘为永恒真理、绝对真理、终极真理。恩格斯指出，的确有些认识的真理性是永恒的、绝对的、终极的，例如“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但这只是一些极简单的事实，就人类认识的整体或认识的不断深化来说，永远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发现了永恒的、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象杜林那样把自己吹嘘为终极真理的化身，绝不是伟大和高明的象征，恰恰是狂妄和愚昧的表现。

批判唯心史观，阐发唯物史观

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杜林从两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模式中推论出个人的自主、独立、平等。然后把这结论机械地引伸到整个社会，大谈抽象的、没有阶级属性的人。他鼓吹资产阶级暴力论，把社会不平等、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说成是暴力作用的结果。杜林的“个人主权论”和“暴力论”，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暴力的相互关系，模糊了人们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正确认识，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恩格斯无情批判了这种极端露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骨的唯心史观，并在批判中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杜林胡说什么“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是第二等的事实。”还胡说什么“剥削制度起源于暴力”。针对杜林的唯心主义的暴力决定论，恩格斯强调说：“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①一部社会发展史不容争辩地证明，剥削和私有制都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不是暴力的产物；恰恰相反，暴力倒是剥削和私有制的产物，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和剥削者的利益产生出来的。使用暴力尽管可以掠夺财富、奴役他人，加速并加深财产的不平等现象，但是，暴力并不能创造财富，它充其量只能把财产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而且这种转移只能发生在财产由劳动产生出来以后，而不能在这以前。所以，恩格斯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起决定作用的、基础性的东西不是暴力而是经济。

恩格斯还深刻指出，政治暴力决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即以武器和士兵为前提，而武器和士兵也是由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恩格斯曾用武器发展史和战争方法史中的大量材料，论证了政治暴力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法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因素，也就是取决于人的质量和他们的技术等。这里说的人的质量和数量，包括军队的素质、装备、给养、组织编制和战略战术等等，无一不同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无一不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恩格斯在强调经济决定暴力的同时，又肯定暴力对经济有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大的反作用，它或者推动经济的发展，或者阻碍、破坏经济的发展。暴力究竟起什么作用，也是由它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恩格斯非常重视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革命暴力的作用，他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杜林不分青红皂白，把暴力一概斥责为绝对的坏事，目的就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暴力，因而是极其反动的。

在道德问题上，杜林也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竭力宣扬抽象的、永恒的、凌驾于历史和民族之上的道德原则，抹煞道德的阶级性。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抽象的人性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论证了道德的产生、发展、实质和作用等问题。他指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道德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道德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就是说，象社会意识的其它形式一样，道德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道德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超阶级的道德同样是不存在的。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道德是"代表着现状的变革"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②。

此外，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的抽象的平等观，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观。他指出，杜林抽象的平等观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是经济上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反映。他深刻揭露了这种抽象平等的实质，运用平等观念的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133页。

发展史说明根本没有所谓抽象的、永恒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平等观念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时，恩格斯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消灭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是把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作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手段来使用的，其目的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实现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关于暴力产生了阶级的谬论，科学地论证了阶级的产生问题。他指出，阶级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其一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使私有和剥削成为可能，使社会公共职能日益独立起来，原先的社会公仆，如氏族族长、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和祭司等，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统治和奴役他人的第一个统治阶级；其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中的俘虏不再被杀掉或吃掉了，而是被"富有家族"当作奴隶来使用，还有一些贫困的氏族成员也沦为奴隶，这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被他人统治的阶级。由此可见，决"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相反地，倒是"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①。这就把阶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论断具体化了。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奇丽瑰宝，这部巨著不仅批臭了杜林的大杂烩体系，而且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它至今仍然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20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442页。

第三节 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注意不断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论证唯物主义哲学，又不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为了系统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彻底清算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计划写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从1873年到1876年，他收集了大量自然科学资料，并写了一个“导言”，一些论文和许多札记。1876年5月至1878年春，恩格斯忙于同杜林论战，暂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在写《反杜林论》的过程中，他也利用了前几年所积累的自然科学资料。1878年春，同杜林的论战一结束，恩格斯又立即继续研究自然辩证法，又写了许多论文和札记。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忙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遗稿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撰写《自然辩证法》了，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部巨著也没有完成。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辩证法》手稿全部落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手里，被他们压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25年，才在苏联第一次公开发表。

《自然辩证法》一书虽然没有完成，但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这部巨著中，恩格斯第一次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自然科学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从而既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反动哲学思潮，阐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恩格斯探讨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发现二者自古以来就是“携手并进”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代，只有天文学、数学和力学得到一定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相适应，产生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

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十五世纪后半期欧州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自然科学，除了数学、天文学和刚体力学等少数几门学科达到了初步成熟的阶段以外，其它大多数学科还处在分门别类的收集材料阶段。这种分门类别的研究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①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虽然在分析和论证上远远优越于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②。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近代自然科学已经由收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阶段。这时，那种孤立、静止、不变、不动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就变成了自然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自然科学要继续前进，就不得不冲破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束缚。十九世纪初叶，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上的新成就，越来越充分地显现了自然发展的辩证性质，越来越彻底地暴露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荒谬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便合乎规律地取代了形而上学自然观。这表明，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0—61、448页、

展，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重要条件。

恩格斯在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时，说："新的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总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看来，自然界就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

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发展雄辩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唯一适合于"理论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自然科学应当用这种新的自然观作为研究自然界的指导思想。恩格斯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家既然要研究科学，就得以一定的哲学作指导。不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如何，他们还是受哲学支配的。问题只在于受什么样的哲学支配。不是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支配，就是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正是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下，生物学家毕希纳、物理学家克劳胥斯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等人，分别提出了庸俗唯物论、宇宙热寂说和符号论等荒谬观点。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学家克鲁克斯和生物学家华莱士等人，则成了降神术的虔诚信徒。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都充当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俘虏，因而都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例如，恩格斯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指出，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搬到社会的历史，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

料进行。”所以“把社会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①此外，在批判“宇宙热寂论”片面强调排斥而否定吸引时，恩格斯论述了吸引与排斥的辩证关系。在批判华莱士等人的“降神术”时，恩格斯指出：“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②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恩格斯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希望自然科学家们也都注意这个问题。哲学家应当不断地用自然科学新成就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家也应当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的研究工作。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恩格斯的这一光辉思想，就是在当前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对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成牢固的联盟，对哲学和自然科学双方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

论证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揭示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普遍联系、交互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科学。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根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2—573、484页。

本相反，它是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恩格斯说："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①又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②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是一致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的发展史充分证明，辩证法同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建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才是彻底的辩证法，只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虽然分别阐述过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还没有把它们概括起来。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才第一次把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互相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③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论证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则着重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并运用它来解释自然社会现象，阐明辩证法的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同一和差别等一系列基本范畴。例如，关于因果范畴，恩格斯不仅坚持了它的客观性，而且还论证了它的辩证性。他指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总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的，原因产生结果，结果也作用于并改变着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原因和结果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此时此地是原因，彼时彼地是结果；反之亦然。这就既驳斥了因果范畴上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又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又如，在必然性与偶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534，484页。

然性问题上，恩格斯论证了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既强调偶然围绕必然而活动，又指明必然通过偶然而实现，偶然和必然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并批判了把必然和偶然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立统一规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在论证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同时，恩格斯还揭示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早在1873年初，他在为准备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等而写的第一批札记中，就初步提出了"运动形式"这一概念。同年5月，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的"运动形式"问题，并列举了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这四种自然界的运动形式。此后，他大约在写于1880或1881年的论文《运动的基本形式》中，又用大量篇幅阐述了物质运动形式的理论，根据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进一步把物质的运动形式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等五种基本形式。恩格斯指出，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决定着不同的物质形态。与五种基本运动形式相适应的物质形态是物体（包括原子和分子等）、有机物和人类社会。唯物辩证法认为，从机械运动，经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到社会运动，不仅是几种在质上不同的运动形式，而且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五种运动形式之间是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高级运动形式是在低级运动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然就包括着低级运动形式；但高级运动形式同低级运动形式是有本质差别的，不能把高级运动形式简单地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因此，那些妄图用自然科学理论（包括力学、生物学等等）解释人类社会问题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等学派，都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那些割裂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大搞唯心主义唯灵论的代表人物，也遭到了无情揭露和清算。

恩格斯还指出，区别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是进行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他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①。根据自然界的几种基本的运动形式，他把自然科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研究数量的科学——数学，共五大类。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根据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考察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预示了边缘科学的出现。他说："当我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并进而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他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②

科学分类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可以说，人们对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基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科学史的进程同人类对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进程是相一致的。恩格斯根据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无限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他指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都处在永恒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都是按照客观规律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从太阳系形成之日起，就开始了从低级运动形式向高级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经过漫长的岁月，从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到物理运动，又从物理运动到化学运动，并从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最后又从生物中分化出来能劳动、会思维的人类，产生了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同样是由低级向高级永恒发展的。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595页。

阐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专门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深刻揭示了由生物运动向社会运动的飞跃过程，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创造人类、创造历史的重要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哲学和科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神造人的说法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从十八世纪起，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类起源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到了十九世纪，达尔文吸收了前人和同代人的科学成果，搜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用进化论思想加以科学分析，写成了《物种起源》和《人类原始及类择》两部伟大著作，论证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这是达尔文对人类认识史的重要贡献之一。但是，他只解决了人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并未解决人是如何而来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解决了人是怎样由猿变来的这一关键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够从事生产劳动。从根本上说，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所以，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①。这就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把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谬论统统给打发到阴沟里去了。

在阐述从猿转变为人的具体过程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直立行走。因为直立行走使手得到了解放，为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创造了物质器官，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① 。同时，直立行走，手脚分工，也使身体的其他部分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还使发音器官得到了改造，从而为灵活的进行劳动，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条件。随后，在生产活动中，因为交流思想、协调动作的需要，语言也就产生了。

劳动和语言推动着人脑的形成和发展，随之，各种感觉器官和心理活动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脑、感官、意识活动和抽象思维能力，同劳动和语言之间，是互相推动、协调发展的，其中，劳动和语言是根本的动力。

恩格斯还指出，随着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一个新的因素——人类社会也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应当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②诚然，动物也能改变自然界，但人与动物毕竟是有原则区别的。"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③

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社会的伟大思想，强调了生产活动在人类起源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从而也强调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论述认识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

在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时，恩格斯十分重视认识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问题。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唯物主义的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513、517页。

反映论原则。他指出，唯物主义自然观要求我们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容掺杂任何虚构的东西。我们知道，《反杜林论》集中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着重阐述了认识的相对性，而《自然辩证法》则集中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着重阐述了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声称：我们只能认识有限，不能认识无限，只能认识个别，不能认识一般，只能认识暂时，不能认识永久，只能认识相对，不能认识绝对。这就在有限与无限、个别与一般、暂时与永久、相对与绝对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条不可愈越的鸿沟，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恩格斯在批判这一谬论时深刻指出，的确，我们所碰到的认识对象都是有限的、个别的、暂时的、相对的，但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却能借助于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思维方法，通过有限把握无限，通过个别把握一般，通过暂时把握永久，通过相对把握绝对。因为有限之中有无限，个别之中有一般，暂时之中有永久，相对之中有绝对。所以，恩格斯说，除了肯定我们能够认识有限的东西以外，还得补充一句：即"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紧接着，又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还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①然而，绝对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的，它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矛盾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明确指出："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①这是说，绝对的认识，即绝对真理，是在无限前进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种绝对认识只能代代接近，而不能最终完成。在认识问题上搞独断主义（绝对主义）是错误的，搞经验主义和不可知主义（相对主义）同样是错误的。

辩证逻辑问题，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阐述的一个重点问题。在阐述辩证逻辑问题时，恩格斯同样特别强调主客观的统一问题。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相互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②在这里，恩格斯把辩证逻辑牢靠地建筑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恩格斯阐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问题，强调逻辑以历史为转移的唯物主义原则，他指出。逻辑的东西大致地重复着历史的东西，但这种重复并不是简单把历史的全部特征统统再现出来，而只是重复历史中那些本质的、主流的、必然的东西。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把这些感性材料上升为理性思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的东西向逻辑东西转化的过程。

为了把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或者说为了把历史的东西上升为逻辑的东西，就得正确地使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等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不能片面对待。恩格斯在批判归纳万能论时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互相联系着的。"③同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互相联系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555、564、548页。

着的。

此外，恩格斯还阐述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前者不象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各种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毫无关系地并列起来，而是使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在论述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时，恩格斯还充分肯定了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① 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根据已知事实和规律推想出来的，都是经过实践的多次检验和纠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假说是科学理论的先行者，它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极其有益和必要的。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遗著，它包含着极为丰富、极为深刻的内容。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运用的某些自然科学材料的确是过时了。但是，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所作的哲学结论和提出的一系列科学预见，已经或正在被现代科学所证实。这部著作至今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第　四　章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883—1895）

1883年3月14日下午，65岁的马克思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寓所的工作室中躺在安乐椅上溘然长逝了。恩格斯立即把这个不幸的消息电告欧美各国的战友和同志。欧美各国人们用各种方式沉痛悼念马克思，缅怀他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所作的丰功伟绩，表达决心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念。恩格斯在安葬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指出，马克思生前是一位革命家参加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他毕生的事业。马克思又是一位科学巨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发现。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用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悼词："他的英明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中，为着完成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一方面独自担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指导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他毅然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首先集中精力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等遗著、遗稿和书信，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勤奋地工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由于战胜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指导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然而，俾斯麦反动政府却与澎湃高涨的工人运动为敌，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妄图以此阻止它的发展。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反而使它得到锻炼和壮大。他们学会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普选权，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工会和合作社，广泛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团结教育无产阶级，为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也都是如此。

由于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获得巨大胜利，由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极力散布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因而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滋生了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夸大合法斗争、议会选举的意义，追逐眼前利益。机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相呼应，这样那样地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用以武装广大工人群众，就成了恩格斯面临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所以，恩格斯先后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有关历史唯物义主的书信。

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不仅探讨了家庭问题，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原始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不仅填补了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全面论证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突出地阐明了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原理，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想发展的历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与联系。恩格斯以其一系列新论点、新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更加严整、完备的阶段。

第一节 揭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长期以来，剥削阶级思想家一直在利用人们对古代社会的无知，散布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古已有之、永恒不变的谬论，妄图以此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糢糊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为了批判这些谬论，马克思曾经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写下了摘要，打算写一部论述原始社会的专著，但是马克思未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就与世长辞了。八十年代，恩格斯研究了马克思的遗稿，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和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制约的原理，并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地揭示了原始社会形态及其家庭发展的历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怎样从社会分工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实质，有力地粉碎了剥削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谬论。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制约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

一面方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生产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交换的发展，而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在阶级社会里，家庭制度完全受私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人类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①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两种生产的著名理论。这一理论包含如下三层意思：一、首先申明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后进一步解释“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概念，提出它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种、人口自身的生产这两项内容；二、两种生产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制约着社会制度，不过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大小不相同：在生产力平水很低的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起决定作用，而在生产力有了发展的阶级社会里，生产方式就成为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三、两种生产是同一生产过程中的两方面，二者是互相制约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以人种的蕃衍为前提的，有了人才能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人种蕃衍又总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这两种生产的结合，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和他早在四十年代提出的观点的发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起着决定作用。②八十年代，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地论证两种生产的理论提供了可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同上，第1卷，第34页。

的根据。恩格斯阐明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不久，在致博尔吉尔斯的信中，还强调指出两种生产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两种生产的理论，补充和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家庭的起源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关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亘古不变的谬论，恩格斯根据大量历史资料，论证了家庭是一个历史现象。在人类蒙昧时代的初期，男女之间只是杂乱的性交关系，因而没有任何形式的家庭，到蒙昧时代中期，由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受到风俗的某种限制才产生出家庭。由于限制程度不同，于是便有不同形式的家庭。家庭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之后，才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

恩格斯在论述家庭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四种家庭形式。这就是：一、血缘家庭。在这种家庭中，祖辈与子孙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不许通婚，但同辈兄妹之间可以互为夫妻。这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内婚制的群婚的最初形式。二、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是夏威夷语言，汉语的意思是亲密的伴侣。在这种家庭中，同胞兄弟姐妹禁止通婚，但无血亲关系的男女之间可以配偶通婚。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外婚式的群婚形式。三、对偶家庭。在这种家庭中，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关系时，是排除第三者的。这种家庭形式是在限制男女之间通婚的习俗和规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是这种家庭配偶关系，由于生产力低下，没有家庭经济的存在，所以很不稳固，经常破裂，在这种家庭中，子女仍属于母亲。四、一夫一妻

制家庭。这是随着私有财产出现，男子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适应子女继承财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家庭形式。一夫一妻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由于有了家庭经济存在，这种家庭形式比起对偶家庭来就更加相对巩固。

恩格斯指出，家庭形式的演变，一方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非血亲婚配能创造出在体质和智力上更为强建的后代，其发展比血缘婚配要快，所以非血缘家庭就逐渐代替了血缘家庭。另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他在考察家庭形式的发展同生产发展的联系时，说明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都是建立在原始社会的、同生产力低下相适应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对偶家庭形式递进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则完全是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公的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①

恩格斯在分析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特点和发展时指出，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一夫一妻家庭，不是以个人性爱为基础、以夫妻间的平等、互爱为特征的，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男性奴役女性为标志的。这种一夫一妻制家庭内部夫妻间的矛盾对抗，是同社会阶级压迫同时发生的。男子拥有财产，居于统治地位；女子没有或很少有财产，处于被支配地位。例如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关系，就不是以性爱为基础而是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金钱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是一次卖身的奴隶，夫妻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上宣布婚姻自由平等，实际上却是强迫婚姻。这种婚姻又往往以卖淫和通奸作为补充。

这种建筑在私有财产上面的资产者的家庭形式是随着资本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页。

义私有制度、的消灭而将消灭的。恩格斯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实行一夫一妻制，那时男女婚姻结合，除了真正爱情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如经济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者的家庭，由于妇女被迫到社会上去做工，也成了家庭生活的供养者，由于没有财产可以继承，所以能成为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新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新的家庭关系不能得到发展。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以个人性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形式。

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于原始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曾经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作过论述。但是，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系统研究是在六十年代以后。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仔细研究了原始社会形态，证明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他在描绘原始社会中的以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团体的制度时，写道：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他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

照例也是没有的。”① 这种氏族制度是同产生它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这些条件就是人类差不多还是完全受着自然界的支配，生产力极其低下，地广人稀，分工只存在于男女之间，是纯粹的自然分工。男子在外捕鱼打猎，女子在家准备衣食，共同财产如房屋、土地、园圃等等共同制作共同使用和管理。这种氏族制度是伟大的，但又有历史的局限性，一旦生产力获得新的发展，它是注定要被完全破坏的。私有制、阶级的产生是氏族制度瓦解的原因。

恩格斯详细分析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在他看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由原始社会三次大分工引起的。在原始社会初期，谈不到社会分工，因为那时分工只限于两性之间的自然分工。到野蛮时代中期，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畜牧业和农业相分离。这一分工使畜产品和农产品的交换成为经常性的了，而在这之前交换只是偶然的现象。

起初，交换是由部落酋长在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的。后来，当牲畜变成个人的特殊财产，部落之间的交换就被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所代替。交换的发展虽然取决于生产的发展，但是他反过来又促进了畜牧业、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交换的扩大，产品增加，除了供劳动者本身生活需要外，还有剩余，这就有了吸收新劳动力的可能和条件，不再杀死战争俘虏而把他们变成奴隶。这样，“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②

到了野蛮时代的后期，由于铁金属工具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更发展了。农业可以大面积耕作，酿酒、纺织、炼铁以及金属加工工业也出现并发展起来了。生产范围更广，产品更加多样，“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②同上，第4卷、第157页。

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①由于有了铁制工具，个体生产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就有了可能和需求，于是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生产便被逐步代替了。开始时，氏族的土地是由个人或家庭部分地暂时地使用和占有；后来变为全部地永久地使用和占有，于是公有制就被私有制代替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现了商品货币。随着商品货币的交换的扩大，高利贷、土地卖买、抵押制也出现了，于是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加剧了新的阶级划分。这就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这次分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产品交换、自己不从事生产但又掌握着生产大权的特殊阶级，即商人组成的寄生虫阶级。

总之，社会生产的三次大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并逐渐完全代替公有制；私有制的最后确立使社会分裂为阶级对立；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

社会三次大分工的结果，使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氏族制度存在的前提不存在了。原来氏族所有成员以血缘为纽带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中，现在由于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杂居在一地区，并且由于商业发展，氏族成员定居状态也常遭到破坏，氏族成员不能再经常集会来处理共公事务了。由于社会分裂为利益对立的阶级，氏族制度原有的民主、舆论手段已不足以解决这些冲突，它需要一种强制的手段。“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②

恩格斯通过对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基本过程的详细研究，具体地阐明了私有制和阶级这一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只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历史产物。恩格斯指出，在生产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165页

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即到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他还把共产主义社会看成氏族制度在更高形态上的复活。①恩格斯的论述，生动具体地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把1852年马克思关于阶级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观点大大地丰富了。同样也把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阶级和统治关系产生的两种途径的见解全面阐明了。他用纯粹经济的原因描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和消灭的规律性，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

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

恩格斯的《起源》一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根据古代雅典国家、罗马国家以及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以关于国家起源的崭新论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恩格斯证明，在原始社会根本没有国家，因为那里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不需要任何压迫手段。国家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阶级产生以后，由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富人和穷人之间经济利益尖锐对立而发生阶级对抗，原有的氏族制度无法解决这些阶级矛盾，于是就要求第三种力量来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缓和冲突，使他们保持在一定的"秩序"的范围内，这个似乎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

从氏族制度过渡到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那么这个飞跃是怎样实现的呢？恩格斯在考察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的国家的产生过程时，认为雅典国家的产生最有典型性，因为雅典国家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恩格斯指出，国家的产生，一方面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是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氏族制度机关，最后完全地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们；另方面是靠建立反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来代替自己保卫自己的氏族和部落的人民武装。而这个反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是受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雅典、罗马、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的道路和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由氏族制度到国家的过渡，是经过很长的过程才完成的。

国家一旦产生，就具有根本不同于氏族制度的特点：第一，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和治理居民，而氏族制度是按血缘关系组织管理居民；第二，国家设置了"公共权力"机关。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军队和宪兵，而且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性机关。这不是代表全社会而只是某一个阶级所掌握并为其服务的机关，它不是氏族制度时代居民的自动武装而是剥夺居民的自动武装。总之，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第三，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有官吏来经管捐税、公债等等，而这一切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谈到国家的实质时，恩格斯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例照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① 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者的暴力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质上不过是资本家统治的一种更巧妙、更可靠的政治外壳，是欺骗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恩格斯不仅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及其特征，而且深刻地论述了它的发展规律。他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很长时期里社会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和权力的概念。后来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分裂为阶级，国家才成为必要的了。可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恩格斯这段话有力的批判了剥削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第二节　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史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用“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批判思想理论领域里的这股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教育工人群众，成为革命者的一项极待解决的任务。因此，恩格斯借评论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1856——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之机，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关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学的基本原理。因而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与区别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因此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程时，首先分析了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黑格尔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处于革命阶段的世界观。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特点，因而黑格尔哲学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封闭体系，它从"绝对精神"出发引出自然界、人类社会，用"绝对精神"的发展说明自然界、社会的变化，最后"绝对精神"返回自身；另方面在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反映着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但是却被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和1873年先后说过，黑格尔的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否定性"的辩证法，即把事物自身的否定性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①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专门论述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他抓住黑格尔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典型命题，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这个论题显然是为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会政治制度辩护的。因为它把封建专制制度、警察式的国家说成是合理的，因此引起了当时“近视的政府如此的感激”。然而，黑格尔并不是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说成是现实的、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必须认识现象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①

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这就是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应当灭亡的思想。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就在于它推翻了一切关于人的认识和行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绝对性的看法。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恩格斯说明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他指出，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历史都是变化和发展的，它们的变化和发展是无穷无尽的。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②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 213页。

接着，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批判了宗教，宣传了无神论思想。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是神而是人，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感性的存在物。他把自然界和人提到了哲学研究的首位。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在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它使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迷宫中解脱出来，恩格斯说："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

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中间环节。费尔巴哈把"人"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脱离革命斗争实践，不了解人的社会性、阶级性，由于他的眼界狭隘，不能概括总结自然科学新成果，不能克服旧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他不能拯救黑格尔辩证法，而是将它与唯心主义一起简单地抛弃了。他更不能运用辩证法观察历史，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物主义的，上半截（即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却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他们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创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②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他的唯心史观表现在抹杀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的事实，把人的情感、爱抽象地化为宗教，企图建立新的宗教，并夸大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人类历史看成宗教变迁的历史。此外，费尔巴哈在伦理问题上，从超阶级的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俱有的。为了满足这一欲望，应把"对己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当作道德的基本原则。这种伦理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它完全适合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人们到证券交易所去投机，只要能赚钱，能使自己感到愉快，也是合乎道德的。费尔巴哈虽然用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抽象的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这仍然是唯心主义观点。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去研究，才能揭示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以及具体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部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第一次唯物辩证地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一论断在哲学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提出过许多宝贵思想。在古代，人们就在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但直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才提出这个问题。黑格尔认为全部哲学都是以思维与存在为中心课题的，不过他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费尔巴哈把阐明思维对存在的依赖关系当作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但他并没有彻底唯物地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总结了人类认识的历史，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概念，科学地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并唯物辩证地说明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具体说来，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或者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凡是认为精神产生物质，世界本原是精神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就是唯心主义；反之，凡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则是唯物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离开这一标准，去谈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只能造成哲学上的混乱，抹煞哲学上两大阵营的对立，抹煞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①。恩格斯根据哲学史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哲学家是肯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不但一切唯物主义者承认，而且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也承认。不过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是在彼此不同的立场上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恩格斯还强调说，还有少数哲学家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例如当时企图复活康德哲学的新康德主义者和企图复活休谟哲学观点的英国不可知论者，就是如此。恩格斯注意到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们想要恢复早已被粉碎了的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②所以，他着重批判了否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不可知论。恩格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逻辑和理论上对休谟和康德不可知论批判的意见，指出他们的反驳虽然是正确的、机智的，具有决定性的，但都没能粉碎不可知论。在恩格斯看来，只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彻底粉碎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把它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

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①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由于恩格斯 把 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就彻底驳倒了哲学上的一切怪论，驳倒了不可知论。恩格斯阐述的这个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恩格斯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第一方面讲的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谁产生谁，谁是本原的问题；第二方面讲的是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只有在实践基础上才能说明这两方面的对立同一，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为我们识别各种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为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其晚年所写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曾回忆说，他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② 。当我们分析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所系统概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便会看到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论证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四十年代就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后来在《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科学地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新康德主义却竭力否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认为历史科学只能对个别事件作主观的评价。针对这种反动思潮，恩格斯首先从如何发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入手，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观，都是用个别人物的观念和活动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规律 。恩格 斯 认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479页。

为，要发现社会历史规律必须分析生活在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动机”，是由什么支配的。恩格斯指出，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自然界自身的发展，撇开人们的反作用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彼此发生作用，它的一般规律就表现在各种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反之，社会历史的发展全是通过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们的活动实现的。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进程是受一般规律支配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总的说来表面上是受偶然性支配着，实际上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因为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的目的，实际上人们期望的东西很少能如愿以偿，人们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是彼此冲突的，因而人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只有从属意义。历史就是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造成的。旧哲学不去探索“动机”背后的原因，不去分析偶然现象内部的必然性，于是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恩格斯指出，只有探索“动机”背后的原因、偶然现象内部的必然性，才能发现社会规律。

恩格斯指出，研究社会规律时，首先要探索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不仅是个人的动机，更重要的是整个阶级、整个民族、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动机。其次，在研究群众的动机时，要注意探索能起伟大历史变动的、长久的、反复出现的动机，因为这种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第三，要探讨支配着群众及其领袖行动的动机背后的原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发现整个历史或某一时期历史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恩格斯正是在分析个人的和群众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等等动力的相互作用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第二，论述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说，历史的动因，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因果联系已经表现得简单明朗化了，人们才有可能揭开这个谜。自从资本主义采用大工业以来，人们都知道，无论在英国、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动力。但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并不了解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起源于经济关系这一新发现，首先是由马克思作出的。恩格斯在本书中进一步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的联系，指出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完成了探索社会发展动力的任务。

恩格斯说，"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①因此，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导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但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罢了。这样，恩格斯就阐明了阶级斗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只有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第三，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以前，人们不了解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而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7页。

国家、政治制度看成决定性的因素。与此相反，恩格斯认为，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经济关系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从表面现象看，经济关系是由国家决定的，因为无论哪个统治阶级的经济要求，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法律的形式才能取得普遍的承认。但是，国家和法的意志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社会统治阶级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还说：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①；“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②总之，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经济要求的集中表现，而这种经济要求，又是被社会经济条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愈是成为某一个阶级的机关，愈加独立于社会。然而，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利益进行的。

同样，法律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济利益为了取得存在的权利，在每一场合都得采取合法形式。资产阶级由此得出结论说，不是经济决定法律，而是法律决定经济。然而，恰恰相反，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及其作用，都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法律具有继承性，它是通过自身的不断改进和系统化而向前发展的，而这种发展也是由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

接着，恩格斯考察了远离经济基础的哲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这些意识形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比较疏远，但是它们同经济条件的联系仍然是存在的。就拿哲学来说，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以高度抽象思维的形式反映一定经济的阶级的需要。他以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发展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248页。

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①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改革也同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具有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恩格斯作出结论说：宗教的发展变化，“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②

第三节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补充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议会斗争获得巨大的胜利，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对合法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探讨的兴趣，日益增长了。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巴尔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首领保·恩斯特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伪造成“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史观”，否认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胡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形成的，完全排除了人的创造活动，经济关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样玩弄人。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为了捍卫历史唯物主义，驳斥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和攻击，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全面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着重论证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及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原理，指出了这些原理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以新的思想、观点补充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253页。

深刻论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恩格斯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错误观点时，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特别着重论证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他写道："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 "经济唯物主义"者把这一命题歪曲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唯物史观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国家、法律以及哲学、宗教等等。历史进程是社会的一切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②

恩格斯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年1月25日）中，全面地揭示了经济关系（或"经济因素"、"经济状况"、"经济条件"）的客观内容。在他看来，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来说的，它里面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还包括经济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旧时经济成分的残余，以及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如国际市场条件等等。在阐述经济关系的内容时，恩格斯着重说明了生产和运输的技术装备的发展，标志着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③

恩格斯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加以具体化了。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不能只归结为某一个因素，它是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必要条件的。但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505页。

是，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才能划分社会制度的各个经济时代。所以，他把生产方式（生产力是它的一个方面）也包括在经济关系概念里。恩格斯还把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等等包括在“经济关系”概念里，因为生产过程本身只有在这些自然条件下才可能进行。

恩格斯的功绩不仅在于创造性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理论，更重要的是着重论证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理。他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就会比较快；它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受到破坏，但是国家权力经过一定时期就会遭到崩溃；或者它可以改变经济发展方向，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虽然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过这一论断，但是只是在九十年代的书信里，才对它作了具体论证。恩格斯把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并把它深化了。

恩格斯还对上层建筑反作用力量的大小和意义作了论证。在他看来，在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生产、交换、分配）的相互作用，是决定性的原因，是原始的起因，起第一性的作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作用。但是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力量不可忽视。它主要决定历史斗争进程的形式，会使具体的历史进程出现曲折、倒退或跳跃。恩格斯以贸易、金融市场对生产发展的巨大反作用论证了这个问题。“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同样，总的说来生产支配金融贸易，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限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范围内，金融贸易又支配一部分生产，“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①

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形而上学观点。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过程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辩证的相互作用过程，而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但历史过程不能只限于经济的必然性，其他社会力量在总的相互作用中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辩证法，资产阶级学者是没有能力理解的。“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②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法理论，特别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支配作用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科学阐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在九十年代的书信中，恩格斯杰出地提出并论证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上层建筑诸因素之所以具有反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认为，上层建筑诸因素或部门的相对独立性的观点，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1、486页。

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相对独立性”这个术语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提出的，而在九十年代的书信中把它运用于许多社会现象。他认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是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的分工，被指定去执行社会某些共同职能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部门。例如，以管理国家为职业，他们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国家由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就“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①法律也是如此。法律取决于并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法律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法律制度、规范之间必须保持“和谐一致”，而不能互相矛盾。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突破法律的相对独立的体系，使法律体系陷入新的矛盾，然后又得消除这个新的矛盾，建立新的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这就是法律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还以哲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为例，论证了意识形态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特点。哲学、宗教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具有先驱者传给它并且作为它的出发点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②历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把哲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片面地加以夸大，以为它可以脱离物质现实。恩格斯强调指出，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受前人保留下来的思想资料的影响，同时也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虽然都有自己内部独立发展的过程，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意识形态可以脱离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独立的存在和发展。相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恩格斯用十六世纪欧洲兴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501页。

起的宗教改革以及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从卢梭以共和制思想代替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制思想，以及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的过程，证明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特点，指出意识形式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变化和阶级斗争促成的。

同时，恩格斯还明确表示，忽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也是错误的。他说，他和马克思过去在批驳论敌时，重点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从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法权以及其他思想观念，"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这就给了敌人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由。所以，恩格斯在反对敌人的歪曲和攻击时，十分注意意识形态发展相对独立性的问题。

恩格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了二者发展不平衡的新见解。他说，哲学的发展可以落后于或先进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但在哲学上却有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英、法两国晚得多，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由于继承了以往哲学的成就，因而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峰。尽管经济条件变更，反映这经济条件的观念，由于它本身的相对独立性，还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从历史全过程看，哲学和经济发展是平行的，"不论在法国或是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①因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②如果我们对纯粹抽象思想领域的发展、研究的时间愈长，范围愈广，思想发展曲线的轴线，就愈是跟经济发展平行而进。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515页。

在恩格斯看来，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间接性、历史性，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重要内容。他说，经济对哲学的作用是通过政治等中间环节间接实现的，经济对哲学发生作用表现在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改造利用，决定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这里它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对于宗教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把哲学、宗教的任何一个观念都去找一个经济上的原因，例如灵魂不死等虚伪观念，早在人类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就产生了，要给这些观念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意识现象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并未得到揭示。恩格斯晚年揭示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恩格斯的伟大功绩。

进一步阐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把人的活动排除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外的谬论，强调指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那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创造活动的关系是什么呢？

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的基础是经济关系（其中包括生产、交换、分配），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恩格斯从人的生产活动阐明经济关系，强调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①当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取决于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时，并没有把人的活动排除在历史过程之外，恰恰相反，指出了他们的积极作用。因为生产者即劳动群众本身是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要靠劳动群众来发展。恩格斯认为社会是由人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然不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而在人们的活动之中。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活动的规律。那么人们是否能自由创造规律，或者说社会历史规律不具有客观性呢？决不是。这是因为：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就每个人的活动来说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都想按自己的意志来创造历史。但是就总的结果来说，因为每个人的意志不会完全相同，于是就形成了无数个互相冲突的力量，这就是“力的平行四边形”、“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往往和每个人预想的都不一样，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就这样通俗地说明了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说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堆积，而是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个人意志、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每个人的意志是由他的生理需要、个人的经济情况、整个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其他条件决定的。人民群众的、阶级的创造活动也是由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所制约的。社会规律归根到底是在经济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表现出来的。然而它却又是不以人民群众的、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但是，个人的意志对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不起作用。恩格斯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然而决不能说这些意志等于零。因为每个人的意志和活动都融合到“总的合力”中去了，因而“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个人意志融合成“合力”，推动历史发展，因而历史是由有目的的人民群众的行动创造的。他还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法，进一步说明了个人活动和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在斗争中，人民群众需要杰出领袖人物的组织和领导。所以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历史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但是，“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

一种偶然现象。”①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不管这个代替者或好或坏、或迟或早，他总是会出现的。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必然性透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例如，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同样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在马克思之前，英法两国的历史学家已力求做到这一点，创立唯物史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是历史的必然。这样，恩格斯就科学地解决了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

唯物史观是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论

恩格斯在书信中，反复阐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②但是在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生党内一些青年作家，不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把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庸俗化，把它变成教条主义定理，单纯用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恩格斯在致恩斯特的信中，批评了他的这种错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③恩格斯教导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一致的，决不能形而上学地把理论解释为关于社会历史知识的总和、永久不变的公式。如果把理论和唯物辩证法割裂开来，就会歪曲理论和它的方法，把它变成先验的结构，变成唯心主义的公式。

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其主要原则是：从实际生产出发考察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全部技术装备等等）的发展水平；把与一定生产力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理解为一定时期整个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揭示竖在这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从社会经济和治政状况出发去解释各阶级的理论和思想，去研究各种意识形式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保·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在研究意识形态、分析文学作品时，只是重复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即阶级关系这一方法论原则。他们在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时，只用阶级观点去评论文学作品，对挪威小市民不作具体分析，而是把德国小市民的阶级特性硬套到挪威小市民身上。恩格斯在批判他们时，指出德国和挪威两国的小市民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彼此形成的阶级特点具有“天渊之别”。在恩格斯看来，要认识一个阶级的特点，必须对这个阶级的社会条件、阶级地位和传统观念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恩格斯针对青年中一部分人把唯物史观一般原理当成公式、套语，不去研究具体历史，只想迅速构造体系的学风，反复说明，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同时还强调指出，没有具体历史知识，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而要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了解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等观点。只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科学领域做出“超群出众”的成绩，才不致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教条。

恩格斯在阐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时，特别注意唯物辩证法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

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在书信中，恩格斯反复阐明社会生活的辩证法，指出只有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去观察社会历史，才能领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就是要我们在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时，把它当作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科学的考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在九十年代书信中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想、新论点，更加完满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这些思想、观点后来得到他的学生们的热烈支持和详细阐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7—378页。

第　五　章

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

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即第一国际以后和第二国际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广泛而深入传播的阶段。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活动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在欧洲各国成长起来。例如，在德国有约·狄慈根、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弗·梅林、罗莎·卢森堡等，此外还有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在法国有保尔·拉法格；在意大利有拉布里奥拉；在俄国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他们依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论述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仍不失其应有地位。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等人公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篡改、攻击马克思主义，堕落成修正主义的理论代表。考茨基这个号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其前期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作过贡献，但也滚到机会主义的中派主义立场上去了。在第二国际存在的二十五年中（1889—1914），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缺乏坚定性、纯洁性，更由于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对修正主义批判不彻底，未能战胜修正主义，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破产。唯有列宁才粉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整个时代。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发展的，要了解列宁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要了解当代欧洲所谓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理论渊源，不能不考察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

第一节　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独立探讨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是一位只受到过中等教育的制革工人，他是坚持自学而成为出色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1869年9月他把自己写成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书稿寄给马克思，要求指教。马克思看后又给恩格斯看。他们高度评价了狄慈根这一著作，认为这是他独立研究的成果，“不依靠我们，甚至也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即唯物辩证法。①狄慈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论逻辑书简》（1880—1883）、《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哲学成果》（1887）等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狄慈根这些著作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出版前，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因此，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更加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独立地提出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约·狄慈根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具有鲜明哲学党性的工人阶级的哲学战士。他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以及机械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物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研究哲学世界观，目的是要发现一种认识对象的真理的科学方法，从而使我们能靠这一般原则和方法预知对象，使我们能自由地和绝对可靠地支配事物，获得确实的成果。他认为掌握这一世界观方法论的过程，同区别真理和谬误的问题是同一过程。因此，他在阐述自己哲学观点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猛烈抨击一切哲学怪论。他指出，在哲学史上，思辨哲学不是从可感觉的现实对象出发，而是只从纯粹的精神出发去寻找哲学真理，去建立完全封闭的体系，并从这逻辑系统推演一切，这只是"幻想"。而经验科学则认为，由经验得来的事实是第一性的，而思维是第二性的，这是生活常识。科学决不容许自己离开常识的道路，离开感觉世界的真理。他认为，哲学并不研究具体事物，而是靠理性阐明普遍的真理。哲学的对象是人们由既存的个别认识或真理来认识一般的真理。黑格尔思辨哲学已经被世界的进步历史抛弃了。

狄慈根指出，康德哲学在研究理性时，是把它放在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中、经验中进行考察的，但是康德从人类理性受经验的局限出发，认为理性只能认识自然界的现象，不可能知道本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狄慈根认为现象与本质是同一的。他说，如果认为自然现象在显现本质，除自然本身以外，在自然现象背后不存在不可知的东西，这种说法难道不能令人满意吗？①他还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他说，新康德主义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宣扬我们不能纯粹地、真实地感知事物，而只能感知事物对主观的显现，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②

狄慈根明确提出了"精神和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

①②《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76、289页。

二性的”问题，他指出，一切唯心主义都陷入了这种偏见，以为思维过程是真实过程，真理之源不是自然而是知识，而真实的自然或物质的宇宙却是第二性的现象。他认为，现象的世界性联系，普遍的有生命的世界才是 第一性的东西 。他指出 ，唯心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僧侣主义 ，唯心主义者 是资产阶级的“ 有学位的奴仆”，他们的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狄慈根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成就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论证。他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而多样性的事物就共同的本质来说是同一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有机物和无机物是物质，人类的思维、意识、精神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也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即人脑这种物质的属性、机能。他说：“思维是脑的机能，正如写字是手的机能”。“思维是脑的活动”，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反映自然事物的镜子一样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可以引起思想的对象才能产生认识。上述见解，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之中，表明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但是在物质和精神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又有一些不正确的见解。最突出的是，他认为唯物主义只看见物质，唯心主义只看见精神，二者各有“片面性”，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他说，新唯物主义的任务在于把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是同一属的两个种的对立。他认为在物质和精神之上找一个共同的类概念，来说明二者的统一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就自然消除了。[1]他企图用“精神是物的，物是精神的。要神和物只有联系起来才是现实的”、“任何现象都是主体和客体的产物”之类的观点，来消除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这是十分错误的，这种混乱。很容易被马赫

①《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61页。

主义者所利用。

狄慈根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运动变化的本质特点。他说，“可感觉的现象是一种无限的物质变化。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空间上的同时并立的、时间上前后继起的物质变化构成的。”“世界在我们面前生而复逝、逝而复生。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化的而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其变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的永恒与不死，同时又承认其形态是可灭的。①狄慈根指出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同一性，认为永恒不灭的物质，存在于变化之中。他说这种同一性应当到“感觉的现实”中去寻找，永恒不灭的物质，实际上不过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但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会在理性中得到完全的解决。人类思维本身具有概括综合能力，能把形形色色的现象概括为精神的统一体，把特殊看成普遍，把一切看成一个更大整体的个别部分。与现象不同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思想上的事物。他用思维的同一性论证世界形形色色事物的统一性，这是不正确的。

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探讨

约·狄慈根在《逻辑书简》等哲学著作中，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问题。首先他阐明了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他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一个事物依另一事物为转移，地球、树木、云和太阳只在相互联系之中，在整个宇宙联系之中才成为它们各自的状态。他明确指出，世界运动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切结果的唯一而真实的原因是宇宙或一切事物的整体联系。”由此他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原理。

---

①《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页。

狄慈根并没有提出辩证法的完整体系。但是他十分注意论述思维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并且从二者同一出发，提出了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他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哲学家在世界的物质发展的推动下才发展了逻辑学。他认为，从培根以来，许多哲学家对于亚里斯多德把思维当作孤立的事物来研究，把真实的经验世界的必然联系排除在逻辑之外，是不满意的，他们努力在这种逻辑之外建立新的逻辑学。黑格尔建立了这种逻辑学，但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思辨的。狄慈根说他要建立的"无产阶级逻辑"才是逻辑学发展的最高的产物。这种"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然而是真实的思维，所以它势必面向真理"，①"以世界真理为对象，按事物的真实联系，发展变化性质去进行思考。因而，我们的逻辑就是真理论，是认识论，它教导人们不要通过沉思的方法，而是从事物与经验的联系的角度，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探索认识。"②

狄慈根在其著作中，到处都贯彻着对事物矛盾和意识矛盾的分析。他认为矛盾是统治思维和存在的普遍的东西。全部自然界都生活在矛盾中，一切事物只有在彼此相互作用时才能显露其本性。"意识概括矛盾"。"意识的本性就是矛盾"。③他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既论述了客观事物和过程的辩证法，又说明了他的逻辑学。在他的著作中，对真理与谬误、本质与现象、普遍与特殊、有限和无限、必然与自由、原因与结果、始与终、生与死等等事物和范畴的辩证分析，是相当自觉的。例如，他说，某一事物的终止就是另一事物的开始。每一个开端同时是一个终点，二者互相包含。但在概念上又有始与终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终究不过是形式上的区别，对于活的世界发展的永恒过程来说，只是

---

①②③《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9、138、28页。

相对的。他批评旧逻辑把上帝与世界、灵魂与肉体，真理与谬误、生命与死亡等等看成是不能调和的对立面，只是相互排斥，在概念上不能统一的观点，认为这种关于矛盾命题的学说是完全狭隘的不顾全局的理论，会使人陷入混乱。他指出，完全对立的事物也可以是同一的。一切区别具有一个本质，可以归入更高的一类或一种。可以把一个特殊的概念归入更广泛的概念。例如，甘蓝的概念包括白的、红的和许多别的甘蓝。蔬菜的概念更为广泛。植物的概念还要更广泛一些，而有机体概念则更加广阔，直至最后，有世界概念，包括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找不到它的终了，因而它是无限。蔬菜和植物的概念等等既是个别的概念，同时又是一般概念，它们都是相对的。一切概念都是如此，它们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①

由此可见，狄慈根把逻辑学原来的含义扩大为世界观即哲学了。他说，为了便于理解这一逻辑，我们用“认识论”这个专门名称来称呼这个新领域，“认识论”亦即众所周知的“辩证法”。②

对认识辩证过程的分析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和《人脑活动的本质》等著作中专门讨论了认识论问题。

首先，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全部表象、思想和概念都是由物质世界得来的观点。他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它们既是思维的对象，也是思维的内容。他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他说，“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差别。”③二者之间没有不

①②③《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84—187、341、284页。

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没有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狄慈根斥责新康德主义时说，现在从各个方面响起“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是反动的。这是颠覆科学，企图重新树立宗教迷信的支配权，它有意无意反对人民群众的自由。

其次，他论述由感性经验到理性思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能力的基础，理性认识是关于本质或自在之物的认识，是从特殊中得出普遍的能力，而感性认识是关于现象的认识。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人类思维能力可以从现象达到本质的认识，能够把可感觉的形形色色的对象概括为一种本质，把特殊看成普遍。他还认为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靠思维的抽象活动实现的。他说，人类认识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人类思维从有限的认识上升到无限的、普遍性的认识，这种能力一方面来自感性经验，另方面是先天固有的。尽管狄慈根指出先天的思维能力也是获得的，不要误认为这是传统偏见。但由于他用语混乱，这就很难同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划清界限。

第三，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上，他指出，整个大自然是绝对真理，人们只能借助于认识现象来认识它，因为人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及其部分，只能“近似”的认识。所以，他说绝对真理本身不能直接认识，甚至说“不可认识”。他认为，图画同它的模特儿“近似”的说法是可以的，但二者怎么能“一致”呢？他坚决反对认识与其对象相一致的说法。狄慈根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上，看到了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看到了每个事物、细小颗粒都是不可穷尽的，都是不可彻底认识的东西，但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不了解相对之中有绝对，有限之中有无限，而是

机械地将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当作部分与整体关系看待，其结果便得出绝对真理本身不可认识、是超经验的东西等错误说法，未能同康德的不可知论彻底划清界限。

虽然狄慈根在哲学理论上前后有矛盾和混乱的地方，但是就其主导方面来说，他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他的哲学九成是唯物主义，一成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他的辩证法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全面、彻底，对辩证法许多问题没有掌握，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却有独到的见解。所有这一切，使得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独特人物。

约·狄慈根死后，有些人例如他的不肖之子欧·狄慈根企图利用约·狄慈根关于精神与物质隶属于一个更高的统一体的错误，伪造出“狄慈根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企图受到了列宁的痛斥。列宁说，“狄慈根主义”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的一步。②

第二节　考茨基、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不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们，象恩格斯晚年一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通俗地宣传、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各自不同程度地阐明了历史辩证法，以深刻而新颖的见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53页。

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考茨基早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

考茨基（1850—1938）原来思想上受拉萨尔、杜林、朗格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点的影响较深，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初，他通过学习《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教导和帮助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哲学观点上并未得到彻底改造，仍是折中主义的；政治观点上也未抛弃改良主义。不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二十世纪初，他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等等。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学说，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社会历史现象，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虽然其中包含有某些错误观点，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然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这本书的手稿恩格斯曾经审阅过。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正确，但是还不坏。”在书中，考茨基对《资本论》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精辟概括，他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创立的第一个“新的经济学和历史学体系”，他说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该书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考茨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的著作，如《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789年的阶级矛盾》，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基本肯定的评价。

考茨基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基督教起源的问题以及伦理学问题。他在《伦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考察了伦理学的发展史，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思想。他指出，社会道德原则、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既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本身又发生反作用。他在论述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时说，“只有在道德依从于社会生活，适应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这种反作用才是好的。”“道德一旦开始一种独立于社会的生活，一旦脱离社会的控制，反作用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了。”他在解释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时说：“废除私有制，废除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对抗，结束战争，实现各民族之间的永久和平……这些都是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理想是“来自对经济的清醒的考察，而不是来自对自由、平等、友谊、正义等道德理想的陶醉！”他认为“道德理想无非是由不满现状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动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是战胜现状的有力杠杆。但是代替旧社会而出现的新社会的状况，不取决于道德理想的表现形式，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水平、自然环境、邻国性质和现有的阶级的活动等等。”这样比较全面、正确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观点，不但在当时对于教育人民，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应当看到，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真正领会。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观。他胡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他试图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去解释社会现象，如他把动物的某些本能特点和人的道德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道德规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具有与遗传本能相同的性质”。因此，他不可能在哲学问题上摆脱资产阶级的观

点。正是由于他在哲学上存在着严重的折中主义错误，终于使他在政治上蜕变为中派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考茨基188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83年担任《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之后，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担负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工作，在党内获得了愈来愈高的声誉，因而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尽管考茨基早期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突出的错误和动摇，后来，正是由于他在哲学上的严重错误，终于使他堕落成为一个机会主义的中派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

弗·梅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论证

弗兰茨·梅林（1846——1919）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1891年正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之一。他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经常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各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很快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之一。

梅林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在长期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的基础上，于1891——1898年出版了四卷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同时还写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的论文，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工作。他在1902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工作。还于1918年出版《马克思传》等著作。他联系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

的伟大贡献作了概述。尽管这些著作本身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起来要少得多，这些著作所提供的丰富内容、新颖见解，对复杂事件的概括，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

在理论上，梅林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他不仅注意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运用于历史、文学艺术、伦理各学科的研究，而且专门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书，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尤其是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捍卫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

梅林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首先指出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其他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梅林写道，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是极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因而不仅存在着自然科学，而且存在着社会科学）。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则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有意识地进行活动的自然产物，但没有去研究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内部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这样，它一涉及历史领域，就转变为自己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即极端的唯心主义。”①这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有力批判。

梅林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诬蔑为“任意的历史编造”和“空洞的公式”的谬论时，强调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认识的方法，不是“刻板公式的教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以绝对真理结束的封闭的体系；它只是一个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任意的历史结构和死板公式。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每一历史时期都不带有任

①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1982年版，第19页。

何预先的假定，它只是对社会历史进行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研究。梅林还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因为人首先得吃、喝、穿、住，然后他才能思想和创作，人必须与别人交往才能获得意识，因此，他的意识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而不是相反。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去理解，才能抛弃任何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

梅林还以大量的篇幅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否认观念的力量，问题在于究竟观念是从哪里获得力量的。“因为观念不会从无中生出来，它其实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越是能够精确地反映这个过程，它就越有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绝对没有肯定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具，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观念的积极作用（它并不会因此就再不是唯物主义了），因为社会思想固然是由社会物质存在所制约的，但它们对产生它们的经济基础又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写道：“有人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宣传愚蠢的宿命论，把一切思想动力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取消掉。再没有比这更无根据的说法了。从他们的辩证法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社会对国家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意识形态的观念毕竟也能影响它们，如果意识形态不能起独立的作用，那么由此绝对不应得出结论，说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① 梅林通过大量的社会历史发展事实材料，论证了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宗教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界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具体阐明和捍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317—318页。
（参看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38页。）

基本原理。

梅林还对巴黎公社以后出现的其它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如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叔本华、哈特曼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庸俗唯物主义“根本不懂唯心主义，所以它们也不会打中宗教最脆弱的一点。他们碰到思维而停止，正象唯心主义碰到存在而停止一样。福格特可以对思想与脑的关系大发议论，但由于他对物质和力保持狭隘观点，所以就倒退而投入教会最初的一些教义的怀抱中去了。”①叔本华、哈特曼的悲观主义哲学是普鲁士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尼采宣扬“权力意志”，实际上是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制，要无产阶级在精神生活方面服从“精神贵族”的意志，是为资本家唱赞歌。②

应当看到，梅林在他的理论活动中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如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观点混同起来，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同起来，有时对观念的积极作用阐述不够，把辩证法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在思想方面对拉萨尔主义让步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不断克服缺点、不断进步的杰出理想家。

保尔·拉法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见解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宣传活动家，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拉法格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曾受到蒲鲁东主义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后来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实现了世界观的深刻转变，抛弃孔德实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成

---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译本、1966年版第2卷、第209页

②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1982年版，第38、249页。

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八十年代以后，拉法格写了一系列论战性的文章和专著，在批判论敌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探讨了唯物史观、宗教、语言及经济等问题，他机智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各个不同领域，以独特的见解，给人以新的启示，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懒惰权》、《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革命次日》、《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财产的起源和发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等。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拉法格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他指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上帝"支配人们的历史，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代替了上帝、认为它创造世界和历史。他们的共同错误在于不去研究上帝，绝对精神等观念的起源，不知道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只限于肯定说思想是"存在"的、"发展"的，能改变人类和社会的现象。他们满足于从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规律。他们希望靠进步、正义、自由、文明、道德、祖国等等思想去拯救人们的命运，改变现实，然而这是不能成功的。

拉法格在批评唯心主义观念时，运用马克思解释历史的方法，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的基本观点，研究了抽象思想、正义、善、灵魂、上帝等思想观念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指出：思想观念、概念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的；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我们祖先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在论述人脑的作用和观念的形成时，拉法格阐述了自然环境和人相互之间的辩证影响，说明了人的能动活动的重要意义。他写道："人以自己的活动不仅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在各方面创造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后者虽然不能使他的肌体脱离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大大缓和这种影响，不过这个人为的环境本身对于它从自然环境中接受过来的人要施加影响"。他特别强调人为环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出"人为环境缩小了人们的各种差别，发展了人们的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害，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精神活动"。①人脑是在这两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观念是从这两种环境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积极地改造世界的力量。这就从根本上论证了自然与人的活动和观念之间的关系。拉法格正是从社会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出发对灵魂、天堂、地狱、上帝之类的观念、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

拉法格认为，剥削阶级不可能创立哲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需要利用自然力来为自己生产财富，需要自然科学技术，因而容忍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决定论观念的存在。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却限制这种自由，不许把决定论带进来。因为社会科学涉及到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资产阶级不仅禁止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公正无私地去研究社会问题，并且要他们寻找理由为自己的发财致富作辩护。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可知论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有产者虽然看到财富的流进流出，但其原因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知的"；交易所里冒险赌博也是"不可预测的"。总之"不可知的"社会秩序包围着有产者，正象"不可知的"自然秩序包围着野蛮人一样。他们把一切归之

①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29页。

于偶然性，因而信仰上帝和灵魂不朽，相信没有物质基础的一切神秘力量，深信金钱的魔力，认为金钱能使他们获得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宽慰，连上帝也不如它。

拉法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对经济、政治、语言、文学等社会现象作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他阐述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和经济的民主管理的问题，至今都引人发思。但是，拉法格在理论上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他对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问题不予重视，单纯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来断定必然信不信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决定论”等等，造成了不良影响。不过，这无损于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

安·拉布里奥拉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阐述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是罗马大学教授，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原是个左派黑格尔主义思想家，在接近工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在同恩格斯通信中，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他把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撰写理论著作，力求独立地深刻地解释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来解答意大利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他积极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投入第二国际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不仅促进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为社会主义理论同意大利工人运动相结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赢得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声誉。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拉布里奥拉的主要著作是《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一部分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著。《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后来出版的《唯物史观论丛》，包括四篇论文：《纪

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对话》（1898——1899年致法国哲学家若·索列尔的十封信）、《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00—1901年讲课内容，1925年发表）这一著作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他批判了唯心史观，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问题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动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详细地分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指出绝不能把人类的创造活动归结为单纯的生存竞争。“因为人可以制造和改进自己的劳动工具，并借助这些工具创造人为环境，然后这个环境通过复杂的途径对人本身发生影响，并且……成为人的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是要研究人类生存完全不同于动物生存的一定条件。“问题不在于根据一定的生物学作出归纳性和演绎性的结论，而在于首先解释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特征，在于寻找构成意志和行为的基质的种种需求的协调关系和隶属关系，……在于设法提出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他说，马克思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了唯物史观，只有根据这些准则去剖析社会历史现象，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和动力。

其次，他批判了折中主义的“因素论”，阐述了社会有机体或社会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的理论。他指出，折中主义的“因素论”看到了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因素，并把其中某一因素了解为历史发展的关键或把历史看成许多因素孤立地起作用的结果，这只能使历史研究在死胡同里转圈子。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因素的看法与折中主义的因素论是根本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孤立地、抽象地从

经济因素中引伸出其他各种因素。而应当对经济因素作历史的了解，并通过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说明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经济本身融合在这个过程的巨流中，出现在多种多样形态的阶段上，表现为其他一切因素的基础。

当他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时指出："社会经济结构首先直接决定彼此结合着的人们的其他一切实际活动，决定这些活动在历史中的变化，那就是说，决定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渗透，决定相应的统治和道德的规范，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形式，决定相应的统治和权威，从而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构成。其次，社会经济结构还决定艺术、宗教和科学中的想象和思想的倾向，并间接地决定它们的大部分对象。"① 拉布里奥拉指出，那种以为借助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生活的所有奥秘，那是思想懒汉的作法。把伦理学、美学、语言学、历史批判和哲学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唯一问题就会把整个历史从科学降低为单纯的数学。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具有不同的层次，并不是经济结构直接地、自动地产生出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不把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不把上层建筑归结为基础，但它从基础出发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为了从历史的不同形式中去认识历史过程，就需要弄清楚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中介即"社会心理学的种种概念和知识的综合体"。拉布里奥拉的上述观点，是同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分不开的。他虽然没有专门分析唯物辩证法问题，但他认为要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掌握辩证法。他不仅把历史看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且看成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他强调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是历史辩证法的直接结果。

①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克尔英译本，1980年版，第201页。

第三，拉布里奥拉还阐述了阶级、国家和法律、道德等的起源和属性，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他证明社会阶级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不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从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中产生的。他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看成某个统治阶级的组织，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他在研究意识形态时着重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他说："观念的历史的确是有的；但它并不是观念自己解释自己的坏的循环。观念的历史存在于从物上升到观念的过程之中。"①他还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认为意识形态能够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他在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不是由上帝或经济范畴推动的傀儡。经济是由于人类的一定活动而形成的。历史不存在于人类活动之外，它"不断发展，并且只体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活动"。历史并不是一副经济关系的"骨架子"，而是由人类活动所联系的各种现象的综合。

事实表明，拉布里奥拉关于社会整体的不同层次、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联系各种现象的综合等等问题的论述，补充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理论活动对于清除意大利当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提高工人群众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他在理论和政治活动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如支持本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遥远将来的事，对不可知论让步等等。然而就其主要方面说来，他是正确的，在阐述和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有不小的功绩。他是第二国际时期一位难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①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克尔英译本，1980年版，第214页。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拉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9）是第二国际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2年）。还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批判了民粹派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和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1883年他还同查里苏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并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通过发表自己的论著和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因而，普列汉诺夫就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顺利发展，清除民粹派的历史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在九十年代先后写作了《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主义史论丛》等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先进思想的最高成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时，普列汉诺夫敏锐地识别了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并积极地投入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政治思想上，特别是从哲学上批判了修正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还有很大一部分理论活动是研究艺术和美学问题，这些领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少有人涉及的。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俄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列宁特别指出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在反对唯心主义斗争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

与第二国际多数理论家不同，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哲学问题的研究。他在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斗争中，写了一系列哲学论著，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普列汉诺夫针对当时流行的折中主义、二元论观点，反复说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派别。他指出，如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而唯心主义则相反，它企图用精神、观念的东西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二元论从来都不能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对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任何综合都必然导致折中主义。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理解"物质"概念的呢？他说，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是指的在对我们的感官起作用时，引起我们的这些或那些感觉的东西……物质不是别的，而是一些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是我们的感觉的源泉。"[①]普列汉诺夫把物质定义为"自在之物"的总和，而不是指具体的实物，并且承认物质是能引起感觉又不依赖感觉的东西，这是正确的。这就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批驳了唯心主义所谓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等等谬论。

普列汉诺夫驳斥了休谟和康德等人的不可知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把马克思关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的论断，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外部世界的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形成印象，所以，印象符合于并且不能不符合于我们之外的事物的相互关系。他

---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2页

说，我们是通过印象而获得对事物的认识，感觉、知觉是认识的的基础。他还坚持恩格斯关于实践和工业是对不可知论的最好的驳斥的观点，阐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写道："人的一切经验和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积极的关系"。科科证明，有许多现象都可以预见到并可以有意识地使之发生。既然我们能够预见"自在之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某些作用，那就等于说我们至少知道"它们的某些特性"。因而外部世界的事物和现象、"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对它认识的概念具有客观的内容。①

普列汉诺夫在许多著作例如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中，把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同承认客观真理联系起来，解释了马克思关于客观真理的学说，批判了主观主义真理观。他说，真理是现实的正确反映，是客观的。只有正确反映现实的各方面和这些关系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而歪曲它们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借口生活中有矛盾而否认客观真理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认识的道路不是直线，生活中的矛盾迫使人们更深刻、更全面地去观察现实，结果会使认识更正确。因此，他认为人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科学的新发现必将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理论，正象天文学上的新发现补充和证实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伯恩斯坦和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歪曲。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同的。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倒立"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辩证法用脚站立起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它具有如下特点：（1）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34页。

一切有限物是要扬弃自身的，是要过渡到它的反面的，这个过渡的过程，是靠每一个现象特有的本性而完成的，每一个现象都包含着将要产生它的反面的力量。（2）一个一定内容的渐进的量的变化，最后要突然激起质的变化。这个突变的环节就是飞跃的环节，渐进性中断的环节。如果相信自然或历史不作飞跃，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正是根据这些观点，批判了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唯一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坚持“是——否和否——是”的辩证思维方法，反对“是——是和否——否”的形而上学公式，指出“真理总是具体的”，辩证法总是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泛泛空论。他经常引用赫尔岑关于“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学’”的话，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他看来，把辩证法应用到社会现象上，就会得出把人类历史过程当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看法。从而解释了“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论断。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论敌对唯物辩证法的诬蔑时，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米海洛夫斯基胡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是靠黑格尔“三段式”推导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三段式”是黑格尔建立体系的准则，而马克思则从来不是靠“三段式”推导出什么实际结论。他是根据对现实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否定的结论的。

普列汉诺夫还对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如内容和形式，偶然性和必然性，自由和必然等等，作了精彩的解释。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创造性的解释

普列汉诺夫理论活动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上面。他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针对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社会学”、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等唯心史观，写了许多论著，捍卫和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因素论”，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观。

他针对主观主义社会学，反复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将引起现存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物质生活的的生产方式，一般来说，决定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全部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以及各种意识形式的变革，归根到底要由经济的发展来说明，而不应到人们头脑中去寻找。同时，他反对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他以大量事实批判伯恩斯坦把恩格斯晚年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观点同马克思1859年“序言”的观点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从自己活动的最初时期起对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所表明的观点，和恩格斯九十年代书信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的观点同马克思“序言”中的精神也是完全一样的。伯恩斯坦及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枉费心机的。“因素论”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因素”，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结果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构成社会的发展。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些“因素”是抽象作用产生的，通过抽象把“社会复合体”分解成单独的范畴，否认这些“因素”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而它是形

而上学的。要弄清社会发展过程，走出使人头痛的迷宫，必须找出一条线索，找出决定性的因素。究竟哪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呢？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普列汉诺夫反对黑格尔把“精神”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的作法，赞成马克思从经济发展的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动力的观点 。同“因素论”相反 ，普列汉诺夫阐述了辩证的社会观。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包括各种因素的社会整体。由于抽象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成为单独的范畴形式，如道德、法律、经济形式等等，表面看来似乎这些范畴单独成为特殊力量决定了社会的人的活动，其实“马克思虽然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是在最后才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明，这就是说，他要用许多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间作用来作前提。”①

第二，探讨了自然界、地理环境和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人类 原始社会时代 ，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人类完全服从于自然。随着人制造工具作用于自然以来 ，生产力的 发展程度 决定着人对自然的统治程度。虽然他有时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是错误的，但是他并没有离开生产力，去说明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社会的发展，而是强调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的依赖，并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地理环境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他认为各种因素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都有作用，人为的环境是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影响，使自然对社会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间接。但自然的影响不会消失。至于人口问题也是这样，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要具体分析。普列汉诺夫上述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88页。

第三，论述了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在某一时代的思想体系对其前辈思想的继承上。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普列汉诺夫运用哲学史上的大量材料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这一论断。他认为，要理解某一时代的“智慧状况”，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就应该预先知道前一时代的智慧状况；应该知道，哪些学说和学派曾在当时统治过。如果没有这一点，“不管我们怎样好地通晓它的经济，也完全不能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的”②。

他论证了意识形态相互继承关系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反对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降为自发的经济的附属物，从特定的经济状况中直接引伸出理论的庸俗化错误。他告诫人们不要庸俗地对待哲学与经济状况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从理论思维复杂性的特点来说，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毫无例外地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不是在空地上开始自己的活动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思想家之间的继承关系，不仅限于思想材料，而且前人提出的种种问题也为下一代科学工作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研究了哲学史、政治思想史、艺术史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普列汉诺夫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平面上进行的。……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自然地取得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5页。

同上，第2卷，第237页。

胜利，关于它永远不可能说：faradase〔自然而然地活动〕……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①这是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异常清晰的说明。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先进思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改革自然和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的运动。

第四，科学地论述了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1898年写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著作。在这里，他批驳了各种各样唯心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的创造作用的论点，并把它具体化了。普列汉诺夫是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着眼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指出，个人的自由活动就是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只有认识了必然性、历史规律性，才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作用。但是不管个人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他只能改变历史的个别面貌和局部结果而不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状况来决定的。“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实具有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②否认个人作用的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不把杰出人物放到一定社会关系中去认识，盲目崇拜杰出人物，无限夸大伟人的作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在分析个人在历史上作用时，普列汉诺夫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针对历史唯心主义，举出大量历史事实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一个伟大的进步，要是没有大多数人的参加，那是根本不可

①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3、190页。

能完成的。他说，任何诡辩都不能从历史上抹杀这一事实：在西欧各国争取本国政治解放的斗争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人民，也只有人民。

第五，十分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和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他们创立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方法就是新的观点体系的灵魂。"普列汉诺夫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十分重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等等著作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认为方法论实际上是人们实践着的行动中的世界观。他多次指出，唯物史观使社会科学第一次有了唯一可靠的基础，唯物史观"首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①]这就启迪人们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把握唯物史观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作用，是由于他认为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核心。他说："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要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前提。"[②]他指出，费尔巴哈集中全力去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要素，以致很少重视和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要素。辩证观点，要以相信现象的规律性即必然性为前提，费尔巴哈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辩证观点。辩证法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获得应有的地位，才把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决定的意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结论。

普列汉诺夫认为，只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去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对各种问题给以科学的回答。因此，他在认识社会

---

①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57页。

现象时总是自觉地运用辩证法。

第六、系统深入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人类认识史引起的伟大变革。

普列汉诺夫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是把它当作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进行考察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前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过程的序列中达到了什么高度。他在研究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时，既肯定了旧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又指出了它的缺陷。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时，既指出了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就在于阐明了发展思想和矛盾的逻辑，又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的神密性质。他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曲解事实，决不是因为他坚持那种对事物的认识的辩证方法，而是由于贯串于他的哲学体系中的那种唯心主义的缘故。因此，决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改造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时，不仅说明了马克思继承了前人哪些合理思想，而且说明了马克思怎样解决了前人在思索社会发展过程时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他指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陷入“环境决定意见”、“意见决定环境”的矛盾中，为十九世纪哲学提出了任务。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从分析社会环境入手，认识到政治法律等社会现象是由社会关系决定进而由财产关系决定的，但财产关系又是什么决定的？他们用自己解释不了的人的本性来解释；德国唯心主义者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精神”，因而它从“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规律来解释历史

发展过程；费尔巴哈则用饮食男女解释人类本性，解释社会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启发下，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立场出发，在人性之外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终于发现了唯物史观。人类要生存，需要摄取食物，因而需要人对自然界的利用改造，“在人作用于外界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与生产力状况相矛盾，就立刻开始与人类本性要求相抵触”①。普列汉诺夫这样描述唯物史观在人类认识史创立的过程，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新颖独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普列汉诺夫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为在俄国和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作了很多贡献，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但由于他在政治理论上存在一些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他在1903年以后陷入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泥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可悲的教训。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时始终是把他的机会主义策略同他的哲学著作区别开的。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列宁还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哲学论文应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②

第四节　第二国际初期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改变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8页。

②《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页。

策略。在经济上，采取一些福利政策去培植工人贵族，使他们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竭力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瓦解他们的革命斗志。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选举制，这种民主制虽然可以被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来进行合法斗争，并取得议会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另方面，又导致一些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社会民主党人产生"议会万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念。机会主义就是从上述思潮中乳化出来的。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修正主义。

恩格斯在世时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了《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出版了《法德农民问题》，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及有关书信，同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迫使机会主义暂时退却了。然而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便公开泛滥起来，形成一种国际现象。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斯坦派的关系、法国盖德派和饶勒斯派（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比利时勃鲁克尔和王德威尔、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彼此有极不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1]后来，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最强大的一个党，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对第二国际各党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介绍第二国际初期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斗争时，重点说明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反对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伯恩斯坦哲学修正主义的出现

伯恩斯坦（1850—1932）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德国社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8页。

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统治阶级，阐明党的理论和策略，教育和团结党员和群众，向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促进工人运动发展方面作了一定贡献。因此，获得了恩格斯的好评。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文章，接着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下简称《前提》），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详尽地提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成为当时修正主义的最大的代表。由于伯恩斯坦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修正主义一出笼，顿时引起了德国党内外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伯恩斯坦为了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必然性，他在《前提》中首先用新康德主义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叫喊"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声言要用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对"传统的教义即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用诡辩术把唯物主义同机械决定论混为一谈，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庸俗的"经济史观"或历史宿命论。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意识的作用，否认人的作用，"把人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犯着自已意志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在作了这种歪曲和伪造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所谓"批判"。

他把恩格斯晚年书信的观点加以歪曲，作为鼓吹思想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的论据。他用折中主义的因素论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有"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经济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小，而"非经济因素"愈来愈独立、愈来愈不依赖于经济发展。这样，人们的精神关系或力量被当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经济关系则成为从属的力量。他鼓吹折中主义是清醒的理智，是对于任何把思想禁锢起来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反叛，是替自由的科学冲锋陷阵的武器。

同时，伯恩斯坦还疯狂攻击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说它是什么“神密的”“死板的公式”等等，是马克思恩格斯犯错误的根源。因此他要“清除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清除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他说，辩证法是从康德主义关于“矛盾纯粹是理性的产物”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自然界中的矛盾，其实是对自然界看法的矛盾。”他企图用形而上学进化论代替辩证法。他说黑格尔的矛盾学说的危险在于“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辩证法妙语，始终妨碍对所认识的变动的意义作充分的估计。”还说，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较之黑格尔的规律更少地引起误会和引出错误的结论。”

伯恩斯坦宣扬新康德主义、折中主义和进化论，诽谤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直接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按照康德主义的观点，“自在之物”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为的主观设定的不可认识之物，因而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过是“自在之物”的政治代名词。既然“自在之物”被一笔勾销，那社会主义就被推到遥远的将来，进而被化为乌有。既然伯恩斯坦否定唯物辩证法关于客观事物存在矛盾、革命飞跃，而宣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只有渐进和改良，只有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慢慢的转化，而必然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调和论，得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

伯恩斯坦的《前提》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前提》1899年出版后，引起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一片欢呼。各国修正主义者都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旗帜下麇集起来，成了一家兄弟，彼此称赞，

彼此学习，一起攻起"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就在第二国际泛滥起来。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斯坦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随着各国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出现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出现革命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这一斗争首先在德国党内表现出来。

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坚决回击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如罗莎·卢森堡、梅 林、蔡 特金 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开始他们没有组织联系，只是到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之后，才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被人看作左派集团。

罗莎·卢森堡是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最积极的战士。当伯恩斯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 志上以 讨论"社会 主义问题"的名义公开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在自己主编的《萨克逊工人报》上开始对伯恩斯坦进行了尖锐批判。在1898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者掩盖党内原则分歧，制止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时，卢森堡挺身而出，指出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危险。声明："我要站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左翼，而不站在企图同敌人妥协的右翼。"她批驳了伯恩斯坦"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指出，按照这个公式，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而等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她认为决不能把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割裂开来，日常斗争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的服务的。正是最终目的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只有最终目的才赋于这个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性质。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公式，"如果运动不和 最终 目的联 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之后，卢森堡写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

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批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及其论据，出色地捍卫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卢森堡嘲笑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看作主观臆想的愚蠢做法。她写道：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抽象，“不是臆想，而是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不了解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就必然成为神秘的东西。”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缓和矛盾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的谬论，强调指出，交通工具、信贷、卡特尔组织的发展等等这一切手段不仅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命运，相反，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使它必然灭亡的时刻即将到来。危机不是某种外部的、与资本主义异已的东西，而是它有机的固有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是纯粹辩证的过程”，伯恩斯坦“不愿意矛盾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方，从而通过革命的变革来消灭这些矛盾”，相反，他力图避免矛盾尖锐化，缓和矛盾。伯恩斯坦看到国家通过许多法律和命令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对资产阶级国家抱有满怀希望。卢森堡指出，这种希望是建立在对现实过程不正确观察上的。因为“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如果这一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执行了各种有关公共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一般地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且只能是在这一限度内。”①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的辩论，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式的辩论”。她揭露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到底是伦理思想还是客观历史必然性问题上，伯恩斯坦否认社会主义

①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译本，第53页。

的历史必然性，而把它归结为伦理观念的产物。伯恩斯坦妄图用"伦理"、"道德观念"、"正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代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用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把发展过程仅仅看成是渐进的、完全和平的量变过程。这是"一种市侩的、庸俗的理解方法。"在哲学上反对发展过程的质变、飞跃，是为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变革，反对夺取政权服务的。革命和改良这两个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另一个社会制度必须实行革命变质，"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为新质。"①

卢森堡在德国党内和第二国际的历届大会上都坚决揭露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师承关系，层层剥下了它的画皮。尽管这种批判有不足之处，但其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在当时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

梅林在批判伯恩斯坦哲学修正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针对修正主义者关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没有阶级性的谬论。梅林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性质。梅林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种哲学都是根据某一民族或某一时期的需要而产生，这种需要的深刻根源在于当时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因而哲学具有阶级性，是帮助人们了解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他在1905年出版的《约翰·洛克》一文中写道：哲学是意识形态上伴随着阶级斗争而产生的现象，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些形式里意识到这个斗争和指导这个斗争……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仿佛完全看不清的一团混乱的各种哲学体系，只有从阶级斗争史的观点，才能把这些体系区分开出，归纳出类别来。②

---

①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译本，第54页。

②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1页。

梅林揭露了伯恩斯坦把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辩证法混为一谈、诋毁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伎俩，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学说。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意见》中，详细论证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阐明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客观性质。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以现实的历史过程为依据的。伯恩斯坦捏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狡猾的黑格尔的矛盾逻辑”，落入“概念自我发展的陷井”，断言《资本论》是借助于简单的类推法，引用“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规律来证明历史过程的。这种诬蔑是枉费心机的。梅林指出，“马克思在极仔细地极周密地阐述了历史的相互依赖关系之后，才有引用黑格尔的‘类推法’的地方，他这样做，目的是举例来说明问题，而不是来证明问题。”

梅林强调“历史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指出，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首先承认“历史辩证法”，同时在党的政治实践和科学研究领域中来运用它。否则，放弃辩证法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放弃对社会的革命改造。

梅林认为应当学会辩证思维。辩证思维的方法是辩证的现实和历史的反映。懂得辩证思维规律的人，就可以自觉地研究现实生活中的辩证关系。对于梅林来说，辩证法是以认识历史实际及其类似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是行动的方法。辩证法对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工具，而且也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工具。梅林的结论是，没有辩证法就谈不上任何历史研究，更不用说进行有效的和胜利的革命斗争。“要是没有辩证思维毕竟既不能创造历史，也不能编著历史”。

梅林还批判了新康德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观念，保卫了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斯坦的“伦理社会主义”是从新康德主义者柯亨那里搬来的。柯亨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康德的

伦理学和他的绝对命令。梅林指出，如果把康德的绝对命令当作最后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妄图把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强加给无产阶级。当然梅林对新康德主义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到1904——1905年间，他终于认识到新康德主义和伯恩斯坦“伦理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他指出，新康德主义客观上和本质上都是企图消灭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到康德去”这个口号，“意味着把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从历史发展中一笔勾销”；这个口号是要“窒息社会主义”的反动口号。因此梅林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结合”，反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

此外，梅林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还批判了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立场”。

克拉克·蔡特金（1857——1933）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与卢森堡和梅林一起，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最前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左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反击了修正主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在哲学上没有完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把唯物辩证法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尽管他们不能摆脱当时德国社会思潮的影响，因而不可能彻底战胜修正主义，但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哲学传统，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内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在左派的推动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威望的领袖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态度也逐渐明确，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反击。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内西在1898年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李卜克内西说，“何如伯恩斯坦的论点是对的，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纲领，把我们的全部传统、把整个社会民主党埋葬掉，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无产阶

级政党”。在1899年汉诺威大会上倍倍尔作了题为《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的长篇报告，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公式和反对暴力革命的谬论，详细分析了伯恩斯坦的论点和论据。他指出伯恩斯坦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所谓个体资本减弱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坚持马克思的理论，又用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工人阶级的处境在改善的新事实，论证工人阶级相对的贫困化。他说明阶级斗争的方式变得更文明了，不是缓和而是尖锐了。他的结论是“我们仍然主张剥夺剥夺者”，“没有任何理由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李卜克内西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倍倍尔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他说，倍倍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差不多我都同意。到1903年倍倍尔沉痛地说，“自从在爱尔福特跟福尔马尔展开大辩论以来，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来，我容忍得太多了，总是一次又一次由于轻信而伸出手去在对立面之间架上桥梁，直到最后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坚决地说，掩盖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最危险的！”伯恩斯坦企图把党变成改良党。他表示他“要坚持做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要在这种制度的生活条件里进行破坏它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可能消灭他们的话。”倍倍尔在对待修正主义问题上犯有错误。但是他在认识提高后，用全副精力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应当肯定的。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

卡尔·考茨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对修正主义作了让步，甚至袒护修正主义，但后来在群众压力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写了不少著作，如《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等等，宣传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批驳了修正主义的不少谬论。他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总斗争中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德国党内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日本的片山潜、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都对伯恩斯坦哲学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然而只有列宁才深入地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彻底埋葬了第二国际的哲学修正主义，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第 六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894——1914）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全面反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与此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沙皇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并且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俄国工人运动就日益高涨。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列宁明确指出："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同时也是……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①

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时候，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们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却在恩格斯逝世后相继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者。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鼓吹所谓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之类的谬论。他们歪曲并攻击马克思

---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页

主义哲学，企图以折中主义、庸俗进化论、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资产级阶哲学思想来代替它。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得同修正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资产阶级转向全面反动，他们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也必然地日趋没落和衰退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纷纷向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进攻，竭力推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如奥地利的马赫（1938——1916）、德国的阿芬那留斯（1843——1896）等人，利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新成就，肆意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极力宣传“经验批判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的新变种）、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货色。同这股国际性的反动思潮相呼应，俄国的民粹派、经济派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也纷纷出笼，不遗余力地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

面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为了回答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新问题，回击国内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疯狂进攻，列宁及其战友在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科学地解决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哲学阶段。

在从1894年至1914年期间，列宁相继写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怎么办？》、《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一系列哲学论著，深刻地批判了流行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深入探讨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以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这些光辉哲学著作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重要

标志。

第一节　在同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除普列汉诺夫等人外，是同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其父任国民教育视察员，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哥哥是民意党人，因谋刺沙皇被判处死刑。从学生时代起，列宁就开始接触到工人和农民的苦难生活，产生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情绪。他于1887年中学毕业，1888年，在喀山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从那时起，列宁开始研究《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研究普列汉诺夫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同时，他还深入调查研究了俄国的经济情况。1891年列宁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1893年列宁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领导了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当时，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严重地危害着工人运动，不粉碎它们，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就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等著作，批判了民粹派的世界观。与此同时，列宁还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等著作，清算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动思想。列宁在批判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民粹派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属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民粹派刚产生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具有一定的民主要求和革命性。到了八十年代，民粹派就演变成为代表富农利益的政治派别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米海洛夫斯基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大肆鼓吹主观社会学，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时，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而是从所谓"人类天性"和"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抽象理想出发。他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①他把能否满足人类天性作为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不合理，因而不能满足人类天性；俄国的农村村社倒是公正、合理的，因而是能满足人类天性的。由此，米海洛夫斯基根本不顾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客观事实，也不顾俄国农村已经两极分化，农民正在遭受残酷剥削的客观情况，硬是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并攻击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希望农村破产，让农民到工厂的锅炉中去受煎熬。

列宁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原理和方法，着重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首先，列宁强调指出，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决不能从人的理想、概念或"人类天性"出发，只能从社会生产关系出

---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5页

发，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早由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列宁认为，这一概念首先是指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说明一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发展及性质的客观依据。列宁说，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要把种种社会现象和关系划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大类，把物质关系作为思想关系的基础和根源，而"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①。只能用物质关系来说明思想关系，而不能用思想关系来解释物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列宁还针对民粹派把上述观点诬蔑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告诫人们不要把"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同"社会经济结构"概念等同起来。他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是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现象的，是个特殊的社会有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他指出，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决不等于否认其他社会关系的作用，相反地，他"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他的生活习惯，将他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合盘托出。"②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不仅反映了生产关系，而且还有日常生活习惯、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思想和家庭关系等。所有这一切因素和关系，共同构成了活生生的社会形态的"整体"。

其次，列宁更进一步地具体阐明了马克思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民粹派认为，历史是偶然性和个

---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18、9页

人意志自由作用的王国，人可以随意改变社会关系。与此相反，在列宁看来，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一旦抓住生产关系，分析生产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果不分主次，不抓住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主要东西，即生产关系，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生产关系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它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能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才能发现社会现象的重复性、规律性，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在列宁看来，规定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于社会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在于社会物质关系。列宁并没有把社会发展规律等同于经济规律，并没有否定上层建筑诸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否定个人的活动。列宁说：“‘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斗争的决定着社会的发展。”[②]列宁的这一观点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是由“合力”造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列宁还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辩证法，指出它是科学地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方法。米海洛夫斯基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是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开始的。与这种方法相对立，列宁指出，应摈弃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和一种进步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具体地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揭示了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再是假设而成为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既然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么，“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8、389页。

"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①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坚持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而且其自身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米海洛夫斯基不仅否定前者，而且企图推翻后者。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胡说黑格尔的"三段式"在马克思的方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列宁在批判他的谬论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②列宁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来说明辩证法的话，说明了马克思的方法的基本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点。列宁指出，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其内部矛盾引起的，是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完成的过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的理论并不是以"三段式"为依据的，而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与现实相符合为依据的。辩证法不是证明的工具。

总之，列宁运用"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彻底清算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并从分析生产关系入手，揭示出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客观情况，还据此进一步指出，空谈以农民村社为基础的假社会主义是荒谬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批判民粹派的英雄史观，论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宣扬历史是那些具有"批判头脑的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13、32、23页。

个人”创造的，这是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在实践上，他们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大搞个人恐怖活动。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对立起来，认为承认历史必然性就是“宿命论”。

列宁严厉批判了民粹派的谬论，无情揭露了他们把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绝对对立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他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在这里，列宁深刻论述了历史的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必然性是通过无数个人的行动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个人的行动又是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个人行动符合历史必然性时，就对历史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只承认历史必然性，不承认个人的作用，就会陷入宿命论，从而无法对个人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只承认个人作用，不承认历史必然性，就会陷入意志自由论，同样无法对个人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承认历史必然性，决不意味着否认个人作用，决不是什么宿命论观点，而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论述，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同形而上学宿命论和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的界限。这是对恩格斯逝世前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必然性和个人意志的相互关系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列宁十分强调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个人活动只有和群众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重大的战果”。列宁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辟论述，彻底驳斥了民粹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派的英雄史观，正确解决了俄国革命应当依靠的主要力量问题。根据当时俄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列宁指出，俄国工人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天然代表，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是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唯一出路。

此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还研究并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其他许多问题。这不仅从理论上粉碎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观点，戳穿了他们名为"人民之友"，实为人民之敌的反动面目，从而完成了由普列汉诺夫开始的批判民粹派的任务，而且也为指导俄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列宁还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斗争的"同路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1870——1944）和布尔加柯夫（1871——1944）等。他们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曾经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同民粹派进行过斗争。由于他们常在合法刊物上发表文章，因而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些人从来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观点；他们鼓吹阶级合作，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道路。在哲学上，他们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企图把唯物史观变成"经济唯物主义"，用新康德主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科学知识、真理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主张科学知识与实际利益无关。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从1895年起，列宁

连续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再论实现论问题》、《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等著作，从哲学高度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谬论，特别是集中批判了他们关于理论不依赖于实践的“客观主义”观点，论证了哲学理论的党性原则。

列宁深刻揭露了客观主义的实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决不是唯物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它只抽象地讲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而抹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它貌似客观，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幌子下，拒绝对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必要的阶级分析，反对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主义者企图站在阶级之上评价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辨护。照列宁看来，对社会问题的真正客观的态度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如实地分析客观事实，正确揭示客观事物的矛盾斗争，科学阐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者“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①

在揭露和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同它的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这是恩格斯如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②列宁在批驳“合法马克思主义

①《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者”关于马克思学说带有“论战性”、“倾向性”的说法时指出，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党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进一步认识现实的条件。这是因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同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是一致的，所以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党性（无产阶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立场上，才能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和优点，正是它的强大理论威力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②

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列宁关于世界观的党性的学说，给予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以有力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列宁通过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以及对民粹派的批判，全面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因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

---

①《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实践上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迎接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作了思想准备。

第二节 在同经济派的斗争中，对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原理的具体论证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身。“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成功地领导了1896年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在“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的尝试，实际上并未建成思想上、组织上真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如此，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国际修正主义和国内“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变种）的影响，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状态更加厉害了。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泛滥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出现了马尔丁诺夫（1865——1935）、克里切夫斯基（1866——1919）为首的新的机会主义派别，即经济派。经济主义是1897年间在国外产生，到1898年11月间完全形成的。经济派宣扬经济主义，鼓吹人类社会的历史仅仅是自发的过程，主观因素（政治、理论以及阶级、政党的活动）不能对这一过程的发展发生影响。因而它在实践上极力否认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政党的社会作用，反对无产级阶革命。这种理论实质上都是从伯恩斯坦那里照抄来的。所以列宁说，经济主

义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或者说就是“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

经济主义严重危害俄国工人运动，影响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妨碍俄国真正的无产级阶政党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斯坦主义，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健康发展。于是，1900年至1903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共同创办了《火星报》，以它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讨伐经济主义的阵地。1902年后，列宁写了《怎么办？》等著作，对经济主义进行了清算。在在清算经济主义的过程中，列宁从各个方面深刻论述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

批判只讲经济轻视政治的观点，论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派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崇拜经济斗争，忽视政治斗争，妄图用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他们说什么“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人们因经常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杀了运动的经济基础”，并因此而竭力主张把“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座右铭，胡说“对每一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的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可贵”，“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无产级阶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应当有首要的意义”。经济主义的这些观点对许多民主党人以及工人和青年，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列宁在批判经济派的经济自发论时，具体地说明了经济斗争

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论证了无产级阶的政治斗争比经济斗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即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它可以“成为唤起阶级觉悟、使工会斗争开始进行和社会主义开始传播的起点”，因而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所必要的。但是，经济斗争如果不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不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就会陷入工联主义政治即资产阶级政治的泥坑。列宁认为，政治以经济为基础，为经济所决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政治斗争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起决定作用的乃是政治斗争。列宁明确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①事实证明，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争得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列宁还为无产阶级争得彻底解放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②这就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学说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论证。

列宁阐述的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相互关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05、第262页。

系等光辉思想，对提高无产级阶进行政治斗争的自觉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批判崇拜自发运动轻视革命理论的观点，
阐述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

经济派把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割裂开来，硬说自发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同时，他们把注重革命理论，诬蔑为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列宁严肃地批判了经济派轻视革命理论的错误观点，阐明了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充分肯定了革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巨大能动作用。他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①

在论述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时，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在历史运动中的巨大意义，以及工人运动所有三个方面即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互相配合等等思想。他指出，对于当时的俄国工人阶级来说，更需要进行思想的或理论的斗争。因为俄国党刚刚成立，在思想理论方面还十分不成熟，还没有对种种错误派别进行清算；再说，要吸取外国的革命经验，要抵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蚀，也需要有雄厚的理论力量。总之，要想完成俄国革命的艰巨任务，不注重革命理论是根本不行的。因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②。在这里，列宁把革命理论同俄国革命运动的成败紧密联系起来，把革命理论的作用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针对经济派鼓吹的工人运动自发论的观点，列宁强调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根本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对这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242页。

一过程及其发展的趋势和历史规律性的知识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说："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吸取到这种知识。"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而且也需要能够创造这种学说的人。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严重受到资产阶级的奴役和控制，他们决无时间、精力和能力从事这种大量而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所以社会主义学说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能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就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有渊博知识的革命知识分子。列宁的结论是："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②

列宁强调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强调革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但他并不"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观测成分"，更没有"夸大思想的作用"，他是在坚持实践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承认理论的反作用的，这正好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避免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决定论。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的论断，是吸收了卡尔·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见解，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化。这对提高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理论的自觉性，发挥革命理论的强大威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247页。

批判轻视党的作用的观点，论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

经济派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组织方面也持着狭隘的见解，他们从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出发，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说什么“对工厂主和政府的斗争”，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俄集中统一的政党组织，只要有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自发组织就够了。他们主张按“手工业方式”，即没有组织系统，没有预先想好的长期坚持斗争的计划，在狭隘的工作范围内自发地进行斗争。他们把建立全俄的秘密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诬蔑为“民意主义”，违反民主制，甚至说这是反民主倾向。

列宁在批判经济派这种崇拜手工业方式，轻视政党作用的错误观点时，根据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原理，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况，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党，特别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他强调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①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应当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并且应当由真正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的很好的领袖”②，就无法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有了用革命理论武装的、由革命领袖领导的党组织，就能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把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所以，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在当前，只要“给我们一个革命家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345、332、页

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在这里，列宁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推翻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列宁的这些论述，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政党的自觉性，并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派所鼓吹的自发论的批判，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俄国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搏斗，也是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有力反击。通过这次批判，列宁不仅从政治上战胜了经济主义，而且系统而深入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原理，阐明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在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在党纲和党章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②。此后仅仅两年，就迎来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高潮。围绕革命问题及理论基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批判了孟什维克的社会宿命论，阐明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次革命遭到失败后，俄国就进入了黑暗的斯托雷平时期。在资产阶级政治上镇压和思想上围剿的情况下，党内某些不坚定分子相继背叛革命，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乘机活跃起来。孟什维克“取消派”公然提出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去建立合法的工人党，布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337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

尔什维克内部的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召回派”则极力反对进行合法斗争，竟然提出召回党在国家杜马及其他合法组织中的党员。这两种各持极端的策略都是错误的，若依了他们，就会葬送革命葬送党。取消派和召回派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哲学基础却都是经验批判主义。波格丹诺夫等人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为幌子，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主义；鼓吹哲学“无党性”，说什么他们的“批判经验”哲学是“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第三个”派别。这是地地道道的哲学修正主义，它与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是互相配合的。因此，在这个时期内，列宁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必然发展为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发展为批判反动资产阶级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斗争。在这一批判过程中，列宁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彻底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实质，全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新的观点、理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自然观和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批判马赫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认识

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和德国的阿芬那留斯创立的。他们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复活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主义，疯狂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马赫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国，成为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切尔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波格丹诺夫、巴扎洛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前呼后应，大肆贩卖这种哲学，把它视为珍宝，公然用它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了捍卫和阐明马克

思主义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用大量篇幅揭露和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在感觉、经验、真理等问题上的谬论，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论、实践观和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

第一、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提出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

马赫主义以感觉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世界仅仅是由我们的感觉构成的。这实际上是把感觉看成第一性的东西，把物看成第二性的东西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在批判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时，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感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感觉是和物质的高级形式即和有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从无机物质的类似感觉的特性发展而来的，它决不是先于物质的东西；感觉是物质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而引起的，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而不是隔离意识与物质的高墙。在列宁看来，对感觉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马赫主义正是从对感觉的错误认识而倒向唯心主义的。列宁对感觉的科学分析，是继恩格斯之后，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的进一步论述和发挥。

恩格斯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如何回答世界本原的问题，视为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标准。马赫主义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打着“超唯物主义、超唯心主义”的招牌，抛出“要素”说（即“要素”既不是物质的，又不是纯精神的东西，而是“中性”的，既是心理的东西又是物质的东西）和“原则同格”说（即自我与环境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中，离开自我，客观世界就不存在，客观世界只能与自我同时存在）。列宁揭穿了马赫主义的“超党派”的伪装，揭露了它的唯心主义本质。

正是在批判马赫主义的过程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并提出了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的理论。列宁明确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①列宁还进一步揭露说："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②这是对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路线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第二，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把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把实践排斥于认识论之外，否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是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列宁在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时，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列宁强调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③即是说，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就得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只有坚持实践第一观点，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种种谬论。

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189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列宁不仅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而且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解释了实践标准，认为实践证明或推翻某一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他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6，142页。

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意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与不可识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列宁的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性，才能从根本上同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划清界限，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到底。

第三，批批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马赫主义从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出发，别有用心地混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硬把恩格斯说成是一个不知可论者，硬说恩格斯同他们一样是从感觉、经验出发，承认认识不能超出感觉 、经验。列宁彻底驳斥了马赫主义的这一谬论，坚决捍卫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阐述的思维和存在在实践基础上统一的观点，他指出，人的感觉不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而是意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生活实践标明，人们能够直接通过感觉认识外部世界。在此基础上，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维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只有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的差别。

（三）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的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②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00页。

列宁关于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确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和精髓。它既强调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又坚持了世界的可知性，还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性。在这里，列宁把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从而也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更加完整了。完全可以说，列宁的这三个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

第四，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论，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

波格丹诺夫荒唐地把真理说成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这是他从马赫主义经验论出发必然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真理只是思想形式、经验形式，其中不包含任何客观内容。由于否认感觉、经验有客观源泉和内容，因而就必然否定客观真理，否认任何真理的客观绝对性，从而只承认相对真理。他攻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里既承认绝对真理又承认相对真理是折中主义。在真理问题上波格丹诺夫的错误在于：一是想用主观真理论否认客观真理论，二是想用相对主义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列宁批驳了波格丹诺夫的真理观，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进一步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原理。在这理，他首先明确指出关于真理问题，有两个有争议的基本问题，即：“(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视地、相对地表现它？”①列宁是以此为纲，展开对真理问题阐述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关于真理的客观性，即真理论的唯物论问题，后者是关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即真理论的辩证法问题。辩证唯物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

主义既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又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这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真理论，又同机械唯物论的真理论划清了界限。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精辟概括，是对真理问题的重要发展。

针对波格丹诺夫否认客观真理、宣扬主观真理的谬论，列宁深刻论证了客观真理的原理。他认为，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在人的表象中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必然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①。他还指出，鉴别客观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如果以“集体经验”、“普遍意义”等等为标准，就会把人们普遍承认的宗教教义当作客观真理，相反，也会把一时未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科学真理当成谬误，这就会导致信仰主义。如果把“有用”、“成功”当作真理的前提，认为一切对我“有用”的都是真理，而不管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实际，那就是实用主义。列宁还指出，波格丹诺夫所以否定客观真理，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他不懂得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他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承认其中的一个，必须否定另外一个。“他这样作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无知。”列宁强调说，要坚持客观真理，就“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列宁还指出：“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②在列宁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人类对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万里长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

城。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因为任何真理性认识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任何真理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因而又具有绝对性。他还认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这界限又是确定的，因为在它所适应的范围内，它是绝对的。列宁说："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防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①列宁这些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正是根据这一科学思想，既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又清算了波格丹诺夫企图借口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绝对的客观真理的修正主义错误。列宁指出："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而遵循着其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②

列宁关于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论证，关于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界限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论述，是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阐明的人类思维能力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思维成果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和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的观点，以及狄慈根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见解的继承和发挥。完全可以说，在这里，列宁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143页。

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发展了唯物辩的自然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系列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不仅向传统物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向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马赫主义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动的，因此，列宁为了粉碎马赫主义的进攻，特别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第一，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牛顿的经典力学一直在物理学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那时，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古典物理学的理论是永恒、绝对的，它所揭示的原子是构成物体的最小单位，原子具有不可入性、不可分性和不变质量等等也是永恒的、不可变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初叶，电子的发现推翻了原子是物体的最小单位说，电子的双重质量（电磁质量和机械质量）突破了质量不变论。伦琴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放射性元素镭等的发现，也相继推翻了物体的不可入性和不可分性等等旧观念。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不懂辩证法，却由此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他们叫嚷什么物理学产生“危机”了，“物质消失了”。而某些反动的唯心主义教授抓住“现代物理学危机”不放，利用物理学唯心主义，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清醒地分析了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揭示了这种“危机”的实质。他说：“‘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的符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我们

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①还说：“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②物理学唯心主义并没有提供能够“驳倒”唯物主义，“证明”唯心主义的任何证据，恰恰相反，自然科学新成就倒以大量新发现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概念的正确性。

第二，总结物理学的新发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列宁深入考察了物理学的新发现与自然科学家关于“物质消失了”的真正含义，并从哲学高度对物理学的新发现进行了科学概括，对“物质消失了”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列宁指出，物理学家之所以会得出“物质消失了”的错误结论，其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和物理学上的物质结构学说的界限，把只适用于特殊领域的物质结构学说当作适合于一切领域的物质范畴；其二是因为他们混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的界限，把物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同物质范畴等同起来；其三是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在否定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时竟否定了唯物主义，在否定已知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在否定物理学的某些规律的绝对性时竟否定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在强调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客体等等。列宁在批判上述谬论时，准确地规定了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他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③这个规定表明：第一，列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物质的，他强调物质是意识的根源，这就从根本上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坚持并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第二，列宁是从认识论的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263、264、128页

高度来把握物质的，强调物质是可以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映的，这又从根本上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坚持并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深刻揭示了物质的唯一特性，即它的客观实在性。他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①这又从根本上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划清了界限。

在批判"物质消失了"的同时，列宁明确指出，马赫主义借口物理学新发现得出唯心主义结论，是由于他们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才产生的。因为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列宁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恩格斯关于物质和动动不可分离的有关论述，论证了物质和运动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波格丹诺夫"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思想，来源于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的"唯能论"。奥斯特瓦尔德提出"唯能论"，打算以能代替物质，把运动同物质分割开来，宣扬没有物质的运动。列宁批判了波格丹诺夫之流关于"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观点，指出把物质和运动分开，只承认万物在概念中运动，实际上会把思想变成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作为它的派生物看待，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在论述物质和运动不能分离，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原理时，列宁还明确阐述了不同哲学派别对这一问题的原则分歧。他说："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的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②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76页。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的界限。所有这些论述，标志着人们对物质及其根本属性的哲学认识的深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运动的相互关系学说的重大发展。

第三，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斗争中，论证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马赫主义是同物理学唯心主义相联系的，这不仅因为马赫本人是个物理学家，而且在于整个马赫派都在利用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来论证马赫主义。物理学唯心主义叫嚷"物质消失了"，马赫主义者就欣喜若狂地说，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已经"陈腐"了，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了；物理学唯心主义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马赫主义者就声嘶力竭地宣扬唯心主义的"唯能论"，割裂运动和物质的关系；物理学唯心主义认为科学定理是人们主观创造的"符号"，马赫主义者立即就提出"经验符号论"，大力贩卖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列宁在揭露马赫主义与物理学唯心主义互相联系的同时，还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原理，进一步论证了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是相一致的。唯物主义以承认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自然科学则以承认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唯物主义哲学以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为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家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唯物主义原则从事科学研究。列宁还指出，唯物主义哲学是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而改变自己的形式的。就是从这种意义上，列宁明确指出："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①总之，唯物主义哲学只有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257页。

础上，才是有根底、有生机的；自然科学只有以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抵制唯心主义和不可知主义的侵袭，确保自己健康的发展。

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史观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一派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一伙虽然在一般哲学问题上公然用主观唯心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却极力标榜自己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实际上这只是欺人之谈。列宁层层批驳了波格丹诺夫的谎言，揭露了他反对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同时，深刻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特别是提出和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等光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批判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谬论，进一步阐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社会领域里，如何回答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唯标准。波格丹诺夫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在引证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之后，说什么这个旧公式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必须加以修正或发展。于是，波格丹诺夫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等同的"谬论，说什么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等等，企图以此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批判说："社会存在和社会识意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人们

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等同的。”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虽然有强大的反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因此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这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立场出发，从社会存在、阶级关系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决不能从思想、观念、“人性”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等同”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②

波格丹诺夫的“等同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还表现在他的“社会进步”论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进步首先是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更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人们意识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适应的，是随着经济地位和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波格丹诺夫却说，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概念就应当是指意识生活的日益完满、和谐。这种把社会意识的进步当作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是陈腐不堪的历史唯心主义！

波格丹诺夫还把生物学理论和唯能论搬到社会领域中，鼓吹社会选择论和社会唯能论，并把二者掺合起来，企图以此来修正、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他把社会选择分为“肯定选择”和“否定选择”两种，说什么“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即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就是能量增加了，是肯定选择；发生经济危机，是能量

①《列宁選集》第2卷，第329，331页。

减少，是否定选择。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制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波格丹诺夫把低级运动形式搬到高级运动形式中，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加深，实际上是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是“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①这种理论和方法实际是从新康德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朗格那儿抄来的。如同马克思批判朗格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空话”一样，波格丹诺夫的“社会选择学”和“社会能量论”也是这类“空话”。列宁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上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呆板了。”②

第二、分析了波格丹诺夫贩运历史唯心主义的特点，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观点。

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不是直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企图把马赫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说，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把当时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作了对比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时，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是克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③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注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而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更多的是注意研究认识论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34，336、335页。

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注意较少。在历史唯物主义广泛传播的条件下．他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它在下半截却保护或恢复唯心主义。他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唯物主义，而是企图将马赫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这完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巧妙的歪曲与攻击。列宁尖锐指出："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保持下半截的唯心主义，又怎么能在上半截坚持唯物主义呢？因此，波格丹诺夫的"上半截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①，实质上不过是巧妙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辞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历史唯心主义。

在批判马赫主义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谬论时，列宁还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两个方面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②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大发展，它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第三，批判"无党性"谬论，阐明哲学的党性原则。

马赫主义者极力鼓吹"无党性"谬论，把自己的哲学打扮成"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哲学。列宁在清算这一谬论时，深刻地阐明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他说，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的基本党派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一部哲学发展史归根结底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所谓第三派或中间派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宁还说，哲学上的党性和政治上的

---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第332页。

党性是密切联系的。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上的党性乃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同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归根结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①]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典范，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立起来，以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他们又总是把自己的唯物论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区别开来，以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斥责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称它们为"折中主义的残羹剩汁"。因此，列宁强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自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②]

列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马赫主义所标榜的"无党性"谬论，他尖锐指出，"无党性"哲学是自欺欺人的勾当，实际上并不存在。马赫主义者虽然竭力以"超越"或"第三条道路"来标榜自己，但事实上他们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撕下了自己的伪装。一方面他们总把唯物主义当作自己唯一的敌人，时刻都在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却积极地为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可见，马赫主义哲学也是有鲜明的党性的。

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大发展。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哲学斗争以及现实的哲学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揭露马赫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指明根除信仰主义哲学的道路。

俄国马赫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和彼得楚尔特（1862——1929）等不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中去寻找宗教的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346页。

根源，也不从哲学上堵塞宗教信仰主义的道路，而是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充当"造神派"，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无神的宗教"。列宁深刻揭露说，哲学家在宗教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事实上，马赫主义者的所谓"中立"完全是欺人之谈，它的许多信徒都是公开宣扬信仰主义的。接着，列宁进一步指出，马赫主义者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他针对马赫主义者说："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了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的泥坑，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①

在批判马赫主义的信仰主义时，列宁强调指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是按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才不会给信仰主义以任何立足之地。他说："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末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②这就为根除信仰主义指明了哲学道路。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61，351页。

第 七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914—1917）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战争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当时，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首先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从而正确规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哲学领域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及其运用问题，成了中心课题。没有唯物辩证法，就无法正确地深刻地估量复杂的斗争形势和革命的前途。由于当时广为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等，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极其蔑视辩证法，或者把它庸俗化，或者把它歪曲为相对主义。它们歪曲辩证法，为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由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绝大多数领袖，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投向资产阶级怀抱，跟在资产阶级教授屁股后面蹒跚而行，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是唯物辩证法。他们与那些公开声明反对辩证法的人的手法不同，总是用诡辩术和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阉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因此，列宁在这个时期，特别重视哲学问题首先是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并把它运用于分析帝国主

义与帝国主义战争，分析无产阶级对国家与革命的态度，运用于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本质，阐明了帝国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列宁在这个时期写的《哲学笔记》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大量哲学文献，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全面地、创造性地研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又一个标志。

第一节　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全面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学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于9月5日迁往中立国瑞士。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伯尔尼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深入地进行哲学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唯物辩证法。这是列宁一生中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作之后进行哲学研究的又一高峰。这个高峰开始于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编辑之约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到1916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博览群书，研究了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着重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非常重视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止一次地研读这部著作，《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就是这时所作的读书笔记。此外，他还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小逻辑》等著作。这一时期列宁写下了大量的摘要、札记、评语和短文，这些笔记共有八本之多，后来都收入1933年出版的《哲学

笔记》一书中。《哲学笔记》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辩证法的体系和核心，辩证法、逻辑、认识论的关系问题，哲学史以及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见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我们着重叙述一下列宁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发展。

全面、深入探讨唯物辩证法的要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部唯物辩证法专著，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虽然系统地体现在《资本论》一书中，但毕竟不是直接理论上的叙述。马克思的这一愿望，列宁是清楚的。所以对唯物辩证法内容和科学体系的探讨就成为列宁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1914年7——11月，列宁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已经概括地指出了辩证发展观的几个特点。[①]他多次指出，辩证法是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并且认为辩证法内容的数目、成分在不断增加。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十六要素。这十六要素是列宁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他研究辩证法的一个小结。按内容说，它包括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阐明了辩证法的唯物论基础。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辩证法要求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事物，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或主观臆断。离开了观察的客观性，辩证法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而要做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地看待事物，即从客观存在的全部事实、全部联系的总和出发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本身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指明了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即辩证法的两个总原则：普遍联系的原则和运动发展的原则。第二条“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第八条“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第三条“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①等等，都表明了这一思想。所谓普遍联系原则，说的是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事物，就会看到每一事物本身都是多种多样关系的总和，而每一事物、现象和过程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各种事物、现象和过程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所谓运动发展原则，说的是整个世界以及每一具体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运动、变化、发展的。而运动又是事物本身的运动，事物自身的运动一结束，事物的生命也就停止。

第三，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因、实质和过程。第四条“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第五条“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第六条“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第九条“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第十三条“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第十四条“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第十五条“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第十六条“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②这八条是辩证法要素的中心部分，揭示了辩证法对立统

①②《列宁选集》第38卷，第238——239页。

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诸规律的内容，辩证法诸规律之间以及规律与其他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事物之所以能发展，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倾向的统一、斗争与转化。由矛盾决定的事物的发展，表现为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转化，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形成了事物曲折前进的发展道路。所以，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变化，都是对立统一的实例和展开。辩证法的所有规律和范畴反映了整个世界是一幅完整的发展图画。

第四，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第七条“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第十条“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第十二条“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①这四条说明了人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这是由于客观事物是各种因素组成的统一的有机体。认识它的时候，必须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就是认识中的一对矛盾，分析就是把事物分解为它的要素、部分和方面，综合则是把事物的要素、部分和方面联系起来作一个总体加以把握。只有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无限的，人的认识的发展也必然是无限的。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是首先认识事物之间的并存关系，然后进一步认识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更进一步研究事物之间更深刻、更一般的联系，如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列宁关于辩证法要素的思想，是在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许多论述，批判地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辩证法十六要素不仅揭示了辩法法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表明辩证法是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且是建立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初步纲领。它为我们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结构，进一步发展辩证法指明了重要途径。

创造性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

在全面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

列宁首先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规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把这个规律称作"对立面互相渗透的规律"。列宁没有看到恩格斯这一著作，他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规律作了科学的规定。他说："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这些论述指明对立统一规律包括对立面既斗争、排斥又统一、关联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二者的辩证结合，就是事物的矛盾。如果把这一规律规定为对立面的斗争，只讲斗争，或抽去斗争，只讲同一，都是片面的。

列宁还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列宁认为，对立面的同一指对立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这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显示了事物的可变性、灵活性。对立面相互依赖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就形成事物的发展。“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对立面的斗争就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否定，相互排斥。对立面的排斥、斗争，引起对立面的转化，形成事物的发展。所以，列宁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②列宁进一步研究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③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矛盾的同一和斗争的关系，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著名原理，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上述重要原理是列宁从恩格斯关于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引伸出来。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但他的矛盾学说强调的是 同一而不是斗争 。在他看来统一是 绝对的 ，斗争是相对的。列宁说这是神秘主义和对发展的背叛。恩格斯认为只有运动才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这就打破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对唯物辩证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用这个观点分析同一和斗争的关系，认为有条件的同一性使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无条件的斗争性才使事物处于绝对的运动状态，相对静止是对绝对运动的表现形式，绝对的运动存在于相对的静止之中。因此，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发展。

列宁还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对立统一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人类认识的规律。列宁指出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内在矛盾，如数学中的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社会科学中的阶级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因此，不能否认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①②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而把它当做实例的总和。而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在他看来，研究事物从对立统一开始是不适当的。正由于这样，普列汉诺夫也就不了解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

其次，列宁针对当时庸俗进化论否认事物的质变、飞跃的错误，特别强调质变、飞跃和转化。事物就是在量变质变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的。而质变、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事物的变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①因为没有飞跃就无法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无法解释事物的质的差别及其无限发展。

再次，列宁还揭示了辩证否定的实质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形而上学的否定，是一种片面的、单纯的、怀疑的否定；而辩证的否定则"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②在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是按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事物会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这既揭示了发展的前进性，又揭示了发展的曲折性。

此外，列宁还科学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列宁指出，辩证法的范畴是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是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经过实践千百次的重复并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③哲学范畴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认识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们是人们用来进一步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一些形式。没有这些范畴，人类的认识是不可设想的。就唯物辩证法而言，范畴和基本规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范畴是这些规律的具体化和补

①②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7、244、203页。

充，从而形成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通晓这些范畴，是深刻掌握唯物辩证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列宁对于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等范畴的内容以及它们的联系和相互转化，作了精辟的论述。例如，列宁从"哈巴狗是狗"这一命题论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与一般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①列宁认为，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包括着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因为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因素、概念，有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列宁关于范畴的客观性，关于范畴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关于范畴依次演变等等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

提出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新思想

列宁在深入探讨辩证法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他在列举辩证法十六要素之后写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

①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240页。

辩证法的实质”。①这些论断表明，列宁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科学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内容丰富的辩证法学说可以简要地确定为对立统一的学说，而将对立统一学说加以详细地发挥，就能从根本上把握整个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学习唯物辩证法，首先要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之所以是辩证法学说的实质和核心，在列宁看来，是因为：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正确说明了事物的“自己运动”，正确说明了运动的源泉和动力。辩证法是关于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所以运动的源泉问题是辩证法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就为其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前提。第二，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关键。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例”，只有对立统一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转化”的钥匙；否定之否定反映的是对立统一决定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只有对立统一才提供理解事物螺旋式前进上升运动、理解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辩证法的范畴如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实例。此外，如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等范畴都是成对的，每对范畴的关系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斗争和转化，因此，他们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例和表现。第三、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诡辩论对立的焦点。形而上学公开反对辩证法，诡辩论则打着辩证法的旗号，用夸大、歪曲辩证法的方法反对辩证法，他们在对待对立统一规律的态度上就是这样。形而上学公开地从正面反对对立统一规律，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客观性，而诡辩论则把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夸大为无条件的转化，或者片面地夸大斗争，否认统一。因此辩证法要同形而上学、诡辩论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哲学发展史证明，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诡辩论的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斗争是围绕对立统一规律展开的。

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现，它是列宁在深入研究了辩证法的发展史及其内容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

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内在联系和矛盾发展的思想，他把内在矛盾看作是发展的动力。他在谈到肯定中包含否定并向否定转化时说："这个否定性……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源泉，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列宁把黑格尔这个思想称作"辩证法的精华"。① 但是，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看成更根本的东西，看成构成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的核心。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统一、调和，而不是对立面的斗争。所以说，他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

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称做"矛盾辩证法"，提出"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把矛盾看成更根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以及其它许多著作中把矛盾分析作为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从理论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不是很明确的。

列宁在研究辩证法思想史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其中的合理思想从而得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他曾经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同一和转化的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在谈到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又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③ 又称辩证法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④ 这些论断从不同方面阐

①②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6、111、278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列宁关于辩证法核心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阐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反对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事物的"发展原则"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发展观便采取隐蔽的形式即表面上承认发展，实际上歪曲发展的真实含义的形式而继续存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更是以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为其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径辩护。列宁清醒地看到："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 他尖锐地揭穿了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是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

在列宁看来，两种发展观的对立首先在于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形而上学发展观则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把发展看成简单的量的增减。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旧的矛盾让位于新的矛盾，事物就向前发展了。事物的变化，既有量变，又有质变，既有进化，又有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变必然引起质变，进化必然导致飞跃，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就科学地解答了事物怎样运动的问题，揭示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途径。庸俗进化论则只承认数量的增减，缓慢的进化，点滴的改良，否认质变、飞跃和革命，因而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发展。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在这一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个对立是：辩证法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把发展看成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认为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形而上学则在事物之外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这种外因论最终导致唯心主义。

在这一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三个对立是：辩证法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把发展理解为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即旧东西向新东西的转化、飞跃，这就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上升性质，因而辩证法的观点是生动活泼的、丰富多彩的、朝气蓬勃的；形而上学则把发展理解为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否认了发展，因而形而上学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形而上学发展观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它会自然而然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有一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曾经指出，伯恩斯坦这句话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要点滴的改良，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根本的社会变革，这就是修正主义世界观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

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术，是他们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另一特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由于社会沙文主义者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把辩证法变成最卑鄙下贱的诡辩术，用以欺骗群众，因此捍卫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的代数学”，批判诡辩论，已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突出任

务。所以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在批判吸收黑格尔驳斥诡辩的合理思想基础上，揭露了诡辩论的实质及其表现，划清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

在列宁看来，诡辩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恶劣变种。它的特点在于：首先，离开“观察的客观性”，使辩证法脱离唯物主义的基础，把客观辩证法变成唯心主义的东西。其次，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客观世界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人的认识也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诡辩论者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认为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这就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否定人们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取消辨别是非真假的标准，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作辩护。最后，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地应用二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 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这是概念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概念又必须反映客观事物内部不断变化着的对立统一关系，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内容不大相同，这就是概念的灵活性。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或者把概念所反映的对立统一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他们并列起来，那就会陷入折衷主义和诡辩，从根本上否认客观真理。列宁的这一论断划清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原则界限。

列宁进而具体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第一，否认事物转化的客观条件，主张无条件的转化。如：战争的性质是可以转化的。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民族战争也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转化要有条件，然而社会沙文主义

---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者正是以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为理由，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区别及其相互转化的条件，从而走上相对主义。第二，抓住事物的表面相似之处，抹煞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对1870年战争的态度，为他们鼓吹“保卫祖国”辩护。1870年马克思曾号召法国无产阶级抵抗德国侵略者的进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修正主义者鼓吹的“保卫祖国”则是要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压迫其它国家人民。看来都是“保卫祖国”，但内容完全不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把二者混为一谈。第三，混淆事物联系中的主要和次要、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真实的辩证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考茨基抓住这一点，否认这一次世界大战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塞奥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战争没有任何影响。辩证法要求我们从事物的全局出发，抓住事物的主要之点。但是，考茨基以次要的东西冒充主要的东西，歪曲事物的本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其他诡辩手法，比如抓住个别现象，当做事物的总体；引用一些与当前实际不符的例子作论证；用偶然的东西代替必然的东西；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错误地引证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列宁坚决的抨击。

总上所述，诡辩论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公开打着反辩证法的旗号，而是打着拥护辩证法的旗号，歪曲、玩弄辩证法，破坏和反对辩证法。它是形式上的辩证法，实质上的形而上学，比公开的形而上学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诡辩论的批判，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第二节 阐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怎样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认识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辩证法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以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冒充辩证法，而且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割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混同起来，这也正是他们陷入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为适应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列宁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断，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法学说。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是唯一自觉地把辨证法运用于认识的哲学家。但是，他把世界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把对世界的认识说成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因此，在他那里，辨证法是绝对观念运动的辨证法，认识论是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虽然阐明了辨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但却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和其他旧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以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们把实践和辩证法纳入认识论，科学地论证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1]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在《哲学笔记》中进一步明确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的著名论断，并作了具体的阐述。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呢？从辩证法的对象和内容来看，辩证法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辩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也是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学说。这是因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是辩证发展的，认识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也是辩证发展的。事物的矛盾规律是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也是认识的根本规律。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论述了这个思想，指出是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人的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就必须反映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实际上，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包含着矛盾。列宁说，在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

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无止境的运动过程。这是因为：第一，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无限的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第二，人的认识只能近似地日益深入地把握客观规律。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②人对客体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判断、推理等等思维形式来实现的。这些思维形式把握永恒运动、发展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能是有条件的、近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714页。

似的，只能不断接近它，而不能一下子完全把握全部自然界。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从认识的方法来看，矛盾分析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列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作研究认识的矛盾运动的典范。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其中已经包含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①]然后，马克思就一步步深入地、详尽地揭露、分析这些矛盾以及在这个社会的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一般辩证法的叙述和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个原理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不了解的，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讲辩证法只从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去讲，而不懂得人的认识的辩证发展。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混为一谈。他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作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化罢了”。[②]他甚至用象形文字代替反映论，陷入了不可知论。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陷入机会主义，从认识论上来说，就在于他不懂认识的辩证法。

阐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列宁针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割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

①《列宁全集》第2卷，第713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47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当作教条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仅阐明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原理，而且还具体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进一步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论证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同时揭示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论述了认识是人脑运用范畴、判断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他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史上，这一论断是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第一次科学概括。列宁之所以能作出这种概括说明，是他对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是个过程的思想批判改造的结果，是他站在唯物辩证法立场上，对认识发展过程研究的结果。认识发展是一个辩证过程，这不仅是由于思维的本性所使然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生动的直观和抽象的思维这两个认识阶段都是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科学的抽象形成之后，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达到真理。列宁是十分强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作用的。

列宁在阐明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基础上，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人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限深化过程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他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时认为，黑格尔的"观念是过程"的思想是合理的。列宁提出了"真理是过程"的论点②，指明了真理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甚深刻到比较深刻，由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主体和客体的一致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真理作为人的认识的成果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列宁在评论黑格尔关于观念的全面性时，提出了"真理是全

①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215页。

面的"①思想。真理是全面的，这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本身是由多种多样的关系和属性构成的统一体。真理既然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就要求主观对客观进行全面的反映。但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不可能立即把握住事物的全体，总是由单个事物或现象开始，逐渐达到把握其各个方面。对单个事物或现象的正确认识，虽然也包括一些真理的颗粒，但它仅仅是真理的一个方面，还不能说是全面把握了真理。因为真理所要求的，是真正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即对事物的一切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完全正确的反映。所以列宁说："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②

列宁关于"真理是全面的"思想，也是为着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真正的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而提出来的。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起完全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③列宁强调指出，要掌握客观真理，就必须全面地掌握事实材料，抓住事实的基本联系。否则，不仅达不到真理，而且会离真理更远，从而在思想上陷入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导致机会主义。

列宁在阐明认识的辩证过程和真理的全面性的基础上，进一

---

①《列宁全集》第38卷，21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9——210页。

③《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步从人类认识过程的复杂性上深刻地揭示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以及阶级根源。

列宁指出，人的认识是一条螺旋形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夸大成为独立完整的直线。唯心主义就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度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主观唯心主义就是由于夸大感觉的结果，而客观唯心主义则是由于夸大概念的结果。所以，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①正是因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产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就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生，除了认识论根源之外，还有其阶级根源。在阶级社会里，它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正象列宁指出的，人的认识跌入僧侣主义的泥坑，“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把哲学唯心主义简单地斥之为胡说，斥之为只有瞎子才会虚构出来的怪诞的体系，这并不能制服唯心主义。只有列宁坚持认识的辩证法，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分析，才给予唯心主义以沉重打击。列宁还告诉我们，不能把哲学唯心主义看成一堆纯粹的废物，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②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把唯心主义作为反面教员，吸取其在认识论上失足的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716頁。

经验教训是很有教益的。

列宁关于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唯物论的角度阐明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于颠倒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列宁则从辩证法角度说明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及其阶级根源，从而使我们对唯心主义的认识更深化了。

明确提出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理

1914——1915年，列宁集中精力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唯物地改造黑格尔哲学，并结合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述了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理。他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列宁提出的三者同一原理，是对黑格尔的三者同一思想唯物主义地改造的成果。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把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的哲学家。黑格尔的《逻辑学》著作，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体系，所以是逻辑学；同时它讲的又是有关世界即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规律，所以是世界观；再者，他的《逻辑学》的体系同人类认识发展史是一致的，它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所以又是认识论。在黑格尔那里逻辑规律是囊括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一切、支配一切的。世界观和认识论都被消解在逻辑学之中，成了同一个东西。黑格尔的三者同一思想对人类认识史是一个巨大贡献，但是黑格尔是从唯心主义前提出发的，他颠倒了思维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所以，黑格尔的贡献仅仅在于透过思维的辩证法，猜测到了现实世界 的辩证法，猜 测到了三 者同一。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三者同一的原理，但他批判的吸取了黑格尔三者同一思想的合理因素，把它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创造了《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在《资本论》中，始终贯穿着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辩证法是资本的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客观的辩证规律；认识论是对资本的认识论，反映了人们认识资本的历史；逻辑学是资本的逻辑学，它的体系是资本运动的范畴体系，它揭示了人们研究资本的正确思维规律。

恩格斯也论述了三者同一的思想。他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以往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②这就是说，普遍规律的学说和思维规律的学说是同一的，辩证法和逻辑学即辩证逻辑是同一的。这是因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就是思维的普遍规律。"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③辩证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当我们运用它认识宇宙时，它就是思维的普遍规律，就是认识论和逻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都贯彻了三者同一的思想。

列宁明确地提出三者同一的原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6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重大贡献。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之所以是同一的，这是由于：

第一，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关于认识运动辩证规律的理论。认识的规律与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同一的。列宁指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①又说，"对立面的同一"是"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②至于辩证法其它范畴所构成的规律，同样既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认识的规律。

第二，辩证法就是逻辑学。逻辑学即辩证逻辑就是研究概念的统一、区分、转化，研究概念的矛盾运动的；而概念的矛盾运动就是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的反映。正如列宁所说："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③逻辑学作为世界一般规律的反映，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就是逻辑学。

第三，逻辑学就是认识论。列宁说："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逻辑学就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这就是说，逻辑学中范畴的逻辑联系和范畴的历史发展是一致的，范畴的逻辑联系实际是"思想史的精华"或"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因而也是认识的发展规律，所以说逻辑学也就是认识论。④

①②③④《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407、210、186、194、90页。

总之，辩证法作为关于客观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就是世界观，作为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或作为关于人类认识规律的科学就是认识论，作为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就是逻辑学。实际上，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所以说，辩证法、逻辑、认识论是同一的。它们不是三门彼此独立的科学，而是一门哲学科学的三个不同的方面。

三者同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三者同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科学性、革命性。没有三者同一就没有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正确理解三者同一，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对于指导各门科学研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任何一门科学，都应该是三者同一的表现，一门科学是否达到了三者同一，是这门科学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由于贯彻了三者同一的思想，才以无与伦比的逻辑力量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必然规律。三者同一的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原理来研究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总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全面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三节　科学考察帝国主义的特殊规律和国家与革命问题，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

列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研究，写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论断，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1917年2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提到了首要地位。因此，列宁在1917年8、9月间，在匿居地拉兹里夫，利用在瑞士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研究成果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的根源和本质，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的历史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

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它在经济组织方面以及政治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如何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特殊性或特殊本质？这在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期，就成为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

家，例如考茨基、法希亭、鲍威尔、卢森堡可及俄国的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所关心、研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天才地预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历史趋势，但是要对帝国主义作出经济的社会的科学分析，不能简单地把《资本论》作为依据，而必须对它加以研究。思想家们在对帝国主义这一崭新课题进行大胆地研究时，有的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作出了开拓性的富有成果的分析，有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作出了错误的说明。因此，发生激烈的辨论是不可避免的。列宁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吸取同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辨证法，独立地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并对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并，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及其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可以说这本书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杰出的概括和总结。

列宁继承马克思的事业，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本质。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是：（1）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形成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国际垄断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他强调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他看来，经济垄断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因而导致政治上的反动，产生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现象——垄断资本家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暴力统治，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依据的。他认为帝国主义不只是政治现象，而同时又是经济现象，它的本质是

由经济垄断所规定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观察帝国主义，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只是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特征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①所以，垄断是达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考茨基在观察帝国主义时，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每个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把政治与经济分割开来，只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进行批评，而迴避和掩饰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经济矛盾，不从经济垄断的决定作用出发去认识帝国主义。这种观点和方法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气息。由于考茨基不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从政策着眼，于是他认为可以改变帝主义的政策而出现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可以调和矛盾，达成协议，建立国际联盟，而由国际统一的财政资本集团共同剥削全世界。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些谬论，指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成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为'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②考茨基的"理论"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理论。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83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836页。

同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相联系，列宁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极大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社会条件，曾经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列宁这一论断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根据。

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途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辨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②当然，战争也是一样。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战争的转化，就要走向荒谬。大战一开始，列宁就提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方去“保卫祖国”，而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反对列宁的主张，他们跟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后面，鼓吹“保卫祖国”的正义性。这表明这些修正主义者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③考茨基之流从帝国主义可以自己克服自身矛盾的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崩溃推移到遥远的将来，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结论，尔后又把俄国十月革命说成没有社会根据的唯意志论的产物，充分暴露了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的嘴脸。

---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850、827页。

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紧迫关头，这个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针对考茨基之流鼓吹“议会道路”，列宁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把革命暴力看成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一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产阶级国家实质的科学认识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国家是作为剥削阶级的专政工具而产生的，是借助于官僚政治机构，首先是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监狱等等物质力量来维持剥削阶级利益和现存的社会关系的。现代资产阶级已把国家机器发展到更加完善的地步，常备军和警察是资产阶级政府赖以存在的强大支柱，是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物质力量。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比封建专制制度进步的国家形式，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指出国家既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工具，军队、警察等又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那末，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②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考茨基之流反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理。他们认为议会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成分，是“纯粹民主”的机关，所以在这里“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应当“以取得议会中的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考茨基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例如言论、出版、集会、人身等自由看作超阶级社会的一般民主。针对这种超阶级的、极力夸大资产阶级民主的谬论，列宁强调指出，议会是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的“清谈馆”，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不是在议会而是在后台由资产阶级来决定，由政府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经济压迫剥削的手段，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议会斗争上，仅仅用民主的方法，就永远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者否认暴力革命的同时，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并从理论上阐明无产阶级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权的特点和具体原则，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作出的。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具体化为苏维埃制度，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以后，在阶级社会被铲除之后，国家将很快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消亡。列宁根据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不会在革命胜利后马上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将在整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中存在着，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要镇压旧的剥削者的反抗，同时，由于“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

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① 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阶段“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②

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上不承认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有阶级斗争，以此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③

列宁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任务的新论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相统一的政权。列宁阐明了民主制发展的辩证法。他认为，只要有敌对的阶级存在，就不会有纯粹的民主，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同中世纪封建专制比较起来，无疑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狭隘的、虚伪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是陷井和骗局。民主是历史地发展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

---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200、199页。

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①无产阶级民主是供社会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享受的最广泛的民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愈发展，愈完全，全体社会成员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并清除了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恶习的影响的时候，对任何人的监督和管理都不需要的时候，民主就会成为多余的而开始消亡。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除了说明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坚决的暴力手段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外，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②这是因为要消灭阶级，根本改变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势必会遇到“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的不自觉的反抗。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及其权威，“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前进”，那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空谈一般“民主”，“劳动民主的统一”等等，是无济于事的。③

与此相联系，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担负着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社会规模地组织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在国家消亡后仍然是必要的，但对国家政权而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管

①②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857、858页。

理职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目的在于建成社会主义，造成阶级不再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消灭阶级。组织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所以列宁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

列宁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多样性的原理。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他认为，俄国人民创造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当的形式，但并不要求其他无产阶级国家都采用这一模式，而应按各个国家具体历史条件选择合适的政治形式。

列宁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当进到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上，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恩格斯上述思想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成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自行消亡"。列宁在批判修正主义时着重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它。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②列宁的论述有力地驳斥了机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的谬论。

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自行

---

①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188页。

停止'和'自行消亡'"。因为民主也是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在国家消亡时民主也会消失。至于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时间，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说，那是"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到1918年，列宁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修正了上述说法，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将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存在。列宁是尊重实践的，他只是阐明了国家消亡的原则，至于消亡的具体问题，他留待以后解决。

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学说的新论证

马克思在阐明未来社会的国家问题时，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学说。列宁在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时，进一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

首先，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解释成社会主义时期，并作出结论说："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①而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就消亡了。

其次，阐明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列宁说明，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在分配领域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它在各方面还存在着旧社会的

①《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7页。

痕迹。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平等权利。然而，这种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是一种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此外，在这个阶段人们还没有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劳动还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还存在私有制残余和传统的偏见以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等等弊病。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①

列宁还论述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条件。他指出，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当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反映着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已经消失，当全体社会成员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需要任何法规的强制而自愿尽力为社会劳动，当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自觉遵守公共规章和纪律，国家的强制职能已经丧失，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所以，列宁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②

总之，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新的论断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52、253页。

第　八　章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1917——1924）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俄国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十月革命后，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同德帝国主义订立了和约，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同时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了民主改革，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建立公有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此遭到世界资产阶级疯狂反扑。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了反革命同盟，开始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与他们相勾结搞起武装叛乱。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反革命进攻。接着，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生义过渡的新时期。

为了促进世界革命并使苏联革命和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并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然而，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浪潮被强大的国际反革命势力镇压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何巩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一步推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

等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七年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科学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光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节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经验过的。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七年实践中，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

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条件的改变，要求人们不仅注意一般理论，而且更要重视实践的极大重要性，重视理论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于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列宁在很多文章里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肯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反复引证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之树是常青的”名言，说明只有从生活实践出发，才能使理论保持活力。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笔记》中“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①的论断。

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考察具体事物的特点。因此，列宁进而提出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②的原则，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所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结合起来，把一般与个别、特殊结合起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这是因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矛盾都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中，因而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只有认识它的特殊性才能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一般规律。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列宁说：“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③

列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观点，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也同“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到二十世纪初，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中间仍然流行着这样一个公认的原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要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俄国的苏汉诺夫在1918——1921年写的《革命札记》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宣传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在西方和世界革命到来之前进行社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②③《列宁选集》第4卷，290、243页。

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俄国革命》这篇论文中，对苏汉诺夫的论调作了批驳。列宁说："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①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③

与此同时，列宁还针对"左派共产党人"鼓吹"不作任何妥协"，反对签订布勒斯特和约等错误，强调了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并不绝对地拒绝任何"妥协"与"让步"，问题在于必须分清两种性质不同的妥协：一种是叛卖性的妥协，另一种是为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迫于客观不利条件而向敌人作的暂时的、必要的妥协。列宁认为前一种妥协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后一种妥协是可以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后，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在强敌面前保存自己，以求得革命进一步发展，同德意志帝国签订和约是一种积极的合理的让步和妥协，决不是背叛革命。列宁还反对"左派共产党人"机械照抄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错误，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但是各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十月革命经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把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等等结合起来。他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④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具

①②③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0、691、336页。

体做法也不同，决不能把一国的模式当成一切国家必须死搬硬套的唯一的模式。然而还要承认任何国家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总归要受一般规律的制约。列宁在这里阐明的原理补充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历史曲折发展的辩证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和发挥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运用辩证法。列宁不仅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并且依据实践经验对辩证法作了独特的发挥。

首先，列宁认为，认识事物要坚持观察的全面性。只有如此，才能做到能观察的客观性。他在反对布哈林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时强调指出："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①列宁在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民主与集中等等问题上，都体现了观察的全面性。

其次，列宁把善于抓矛盾发展的环节作为布尔什维党的一项科学的工作方法。他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②看不见事物发展的主要环节就会陷入均衡论的错误；无视主要环节的发展变化也会墨守陈规，这一切都会导致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善于抓住主要环节，才能卓有成效地指导工作。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运用这一方法，依次抓住了"摆脱战争"、建立公有经济、镇压白匪叛乱、实行余粮征集制到新经济政策等等环节。1922年后，列宁又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

①《列宁选集》第4卷，449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7页。

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精力、全部努力、全部关心都用来发展经济，使它不断地前进。"①

第三、要善于把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找到矛盾的结合点。列宁认为，对立面的同一（一致、互相依赖）、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在辩证法中占重要地位，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怎样才形成同一的即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的。他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演说中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②例如，192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面统一起来的、和谐地结合起来的中介、环节。在1922年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列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他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③

第四，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区分矛盾的对抗与非对抗关系。探讨并正确处理了各种非对抗性矛盾。列宁在评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强调指出，布哈林把矛盾和对抗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列宁认为：对抗作为矛盾的类型之一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暂时性的，决不能把矛盾的类型、表现形式同矛盾的普遍性、永恒性混同起来。他说："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④这一论断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正确处理了工农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7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④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第12页。

党内矛盾，等等。

第五，对事物质变形式和途径作了新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量变质变规律作过论述，但对质变飞跃的形式及其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没有具体阐明。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十月革命前，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强调暴力革命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在十月革命后，明确认识到由于矛盾性质和条件不同，质变的形式也不同，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领域质变的渐进性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飞跃不是用爆发、激变的方式而是渐进的形式实现的。例如，合作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附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引不起社会性质的任何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由于数量上的增加，将导致由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质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建立，意味着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逐步推进的办法完成的。列宁明确提出激变式的质变和渐变式的质变两种飞跃形式，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变质变规律的理论。

第六、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发展途径的曲折性，丰富了《哲学笔记》中关于事物是按螺旋式前进的思想。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曲折性的经验时，提出了一个革命者必须善于发现和扶植新生事物的论断。指出：当新生事物的幼芽从旧事物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时，革命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小心照顾这一新事物的幼芽。列宁在批驳考茨基、孟什维克之流污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没有生命的孩子”等谬论时，坚毅地说：“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

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①]列宁歌颂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体现的群众的首创精神，预见到社会主义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我们树立了对待新生事物的光辉榜样。

阐述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对立，提出辩证逻辑的具体要求

1920年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后，苏联共产党为了迅速恢复因长期战争而破坏的国民经济，提出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提出废除工会中的军事工作方法，过渡到广泛的民主制。于是对工会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关于工会是执掌政权的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论断。而主张工会国家化，要求把管理作为工会的职能，要求取消工会维护工人的物质利益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群众的职能。他指责列宁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表白自己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布哈林集团在争论的过程中，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法，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各偏重了一个方面，胡说什么“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具有同等价值。列宁在批驳托落茨基、布哈林时，不仅分析了他们的政治错误，而且揭露了他们世观界、方法论的错误。列宁指出，布哈林的错误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面”，——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①列宁在批判折衷主义时，强调指出，虽然讲“一方面，另一方面”貌似辩证法的全面性，其实辩证法是与折衷主义根本不同的。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具体地分析事物的本质，不容许任意地把现象的一个方面同另一个方面对立起来，，也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机械罗列，辩证法要求全面地考察问题，并从该现象的各种特征、属性的总和中把最重要的东西分辨出来。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观点、阐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要求：

第一，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力求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和联系。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而存在，客观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只有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认识事物，才能防止片面性的错误。

等二，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观察事物，客观事物永远处在运动之中，我们必须把事物当作过程来理解，把握事物前后发展的历史，掌握它的发展规律，才能防止思想僵化。

第三，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必须随着不断发展的实践而反复检验、修正、补充、发展。所以要检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还必须以人的全部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四，真理是具体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存在的，因而真理必然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

列宁关于辩证逻辑要点的精辟概括，不仅是对辩证逻辑基本原则的科学规定，而且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重大发展。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第二节　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后，国内外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干涉和暴乱，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考茨基之流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掀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浪。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顽强的斗志领导苏联人民经过三年内战，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又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深刻地批判了考茨基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实质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强调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论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列宁以崭新的观点、理论丰富发展了历史维物主义。

批判考茨基，提出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论断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考茨基于1918年8月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反动的小册子，攻击十月革命的道路，攻击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政权，胡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并极力歌颂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和平过渡。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谬论，在一系列著作中，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第一，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在1918年12月再版《国家与革命》时，补充写道：只有懂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①。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法获得多数所产生的统治的状态"，这就隐瞒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无产阶级要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不用暴力去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考茨基反对革命暴力，实质上是为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根据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剥削阶级虽然在一个国家被打倒，但是总的说，他们的力量依然比被剥削阶级强大，因为剥削阶级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发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群众是跟着剥削阶级走的。剥削阶级为了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只要国际资本还存在，资产阶级就是一种国际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没有暴力，无产阶级专政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巩固。

第二，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攻击苏维埃国家"毁灭民主"搞"一般专政"、"独裁"等谬论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考茨基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别有用心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全民

①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民主”，把苏维埃制度丑化为排斥民主的“一般专政”、“独裁”、“专横”。列宁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总是和专政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谈不上专政，没有专政也就无所谓民主。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国家对少数剥削阶级实行民主，对广大被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第一次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不加任何掩盖地揭示出来。专政与民主对统治阶级来说并不对立，只有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才是对立的。要实行无产阶级的高度民主，就必须对原来剥削人民的剥削者实行专政，有力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扬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列宁根据俄国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①十月革命后，在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干涉和叛乱之后，列宁立即把经济建设提到了首位。这是因为，其一，发展生产力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建立了先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然而生产力却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如果不集中精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积累强大的物质力量，就随时有被帝国主义围攻和消灭的危险。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其二，发展生产力是改造小生产，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生产是经常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们用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创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恶果。如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不对小生产进行改造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其三，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要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也是不可能的。

怎样才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首先，列宁强调指出，发展经济要靠政治保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根本保证。如果一个阶级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不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不团结自己的同盟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也就谈不上发展生产力。所以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列宁曾多次指出苏维埃当前的政治应该是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制定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并且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正确经济政策。如当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干涉和叛乱被粉碎以后，余粮征集制已完全失去原来的作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列宁即时地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食征集制的新经济政策，以适应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特点，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等手段，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有力地保证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次，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强调指出，群众英勇的“首创精神在这种转变循环中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1]

再次，列宁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十电气化，”的公式。为了实现俄国的电气化，他组织几百名专家，花费十个月时间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把它称为“第二党纲”。他在强调科学

[1]《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技术时，对学有专长的专家、教育工作者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爱护。

列宁的这些理论和实践，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四，列宁驳斥了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农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评论。论证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考茨基把农民看作“反动的一帮”，认为在经济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农民可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就要同工人之间发生敌对冲突。列宁在驳斥这种观点时指出，俄国农民中，剥削者不超过十分之一，其余都是劳动农民，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革命的土地纲领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积极领导农民争取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斗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说明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广大劳动农民不仅可以参加民主革命而且也可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工农联盟的客观基础。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苏维埃国家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这是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并且能够得到巩固的根本条件之一。

最后，列宁还阐明了阶级的实质及其消灭的问题。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列宁这一定义，是对马克思把阶级关系视为一种经济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孟什维克主义和第二国际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机会主义歪曲阶级划分原因，鼓吹历史唯心主义谬论的有力批判。他们有的用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有的从经济现象的某一个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用生产中的组织职能，收入的方式和数量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根据。列宁指出：这些“组织论”、“分配论”是从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不仅为划分阶级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如何消灭阶级提供了理论根据。要消灭阶级，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从经济上剥夺剥削者，改变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就是消灭阶级的前提。同时消灭阶级不仅仅意味着消灭剥削阶级，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这一切都必须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后才有可能。因此消灭阶级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作用

在过渡时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发展科学文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但是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怎样对待历史上的科学文化遗产，却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当时，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指全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左的面貌出现，对人类文化和资产阶级科学技术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无产阶级文化派”成立于1917年9月，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成立初期对推动苏维埃文化的发展起过

一定作用。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文化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宣传马赫的"组织科学"，认为客观真理是没有的，"真理只不过是思维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是纯主观的东西，观念形态就是经验的组织形态。他们鼓吹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同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的阶级经验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必须将人类以往的一切"旧文化"、"旧科学、"旧哲学"统统抛弃，创造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否认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的继承。十月革命后，由于领导成分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公然向苏维埃政权闹"独立性"，反对党对它的领导，声称党应该只领导政治斗争，工会领导经济斗争，而文化斗争则应该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来领导。他们甚至开办以"组织形态学"为主要课程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学"、准备建立"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共产国际分庭抗礼。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受到列宁的严肃批判。可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狂妄攻击列宁不懂"文化革命"，污蔑布尔什维克党附和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敌人，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一个特殊的反马列主义的文化派别，它的理论和宣传使苏维埃文化的发展遇到严重损害。

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波格丹诺夫之流拒不接受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大闹独立性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对波格丹诺夫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1920年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①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否定一切的观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

①《列宁全卷》第31卷，第282页。

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同时，列宁还论证了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特殊规律。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文化革命过程中，会显出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同资产阶级及其它对抗性社会的文化不同，它不可能在旧制度内部形成，在旧制度内部只能产生一些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分，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全面形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创造的成果只让一部分人独享的状况。社会的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保障它再也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

列宁一再强调科学文化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作用，指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②因此，必须批判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文艺，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③

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指出：首先，必须利用和改造旧

①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357页。

③《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培养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因素。

既然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共产主义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十分注意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习俗和传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就提出以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纪律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同自私自利和小私有者心理作斗争。他把这一任务的解决同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为巨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列宁说："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我们要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①1919年5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响应俄共中央提出的"用共产主义精神从事工作"的号召，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高度赞扬这种不领取任何报酬的额外工作，是新生事物，是"伟大创举"，是"共产主义的东西"。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远远超过利己主义的旧道德。这种竞赛形式，在新社会的条件下，具有对劳动群众产生道德影响的强大力量。

列宁同时还论证了道德的阶级性。他说在现代社会里寻找超历史、超阶级的道德标准在理论上是枉然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个人主义的、伪善的，只有共产主义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代表了亿万人民的要求，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它要求人民热

①《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頁。

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忠于工农国家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将以自己的经济成就积极支持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履行其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的途径，列宁也进行了探讨。他说：新社会的建设，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并多少带有旧世界胎记的人，对他们应该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加强同私有制心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官僚主义等旧社会的影响的斗争，才能使每个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知识和力量贡献给共同事业。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在对社会进行实际改造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列宁关于把思想教育工作看作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因素，把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同争取共产主义的实现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又一个重要探索。

针对"左派"幼稚病、阐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辩证关系

如何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出来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主义根本上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自己创立的。必须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和自愿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然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些"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对立起来，竟提出"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问题，反对"领袖的党"，反对"领袖专政，要求实现群众专政。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那些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改变了斗争策略，把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改换成"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不

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等口号，借以煽动群众，制造事端。针对上述错误思潮，列宁创造性地分析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他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常识。”①在这里，列宁一方面指出，不能把党和阶级对立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涉及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组织者，无论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列宁也肯定了阶级、群众是领袖、政党的基础，政党的力量和源泉，如果领袖和政党脱离了群众，不能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必然要犯错误。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才能充当领导者。列宁在这里把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充分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又十分强调革命政党和领袖的重大作用。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

第三节 贯彻战斗唯物主义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

苏联建国初期的哲学战线，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1920年以前，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在于打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反扑，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不可能花费很多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充斥各大学哲学讲坛，哲学阵地依旧被唯心主义者所霸占，他们中有人公然组织"精神文明自由学院"、"自由哲学协会"等组织，公开举办讲座，出版刊物，猖狂地进行宗教唯心主义的宣传，反对在苏联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为了反对唯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列宁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并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这篇著名的哲学论文不仅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纲领，而且论述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继续开展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

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一些人中又产生了和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幻想，"路标转换派"思潮的出现就是资产阶级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表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派别，如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等等，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之后，通过他们的理论家们大肆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妄图在意识形态

领域保留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一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以及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活动十分猖狂。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也同他们沆瀣一气。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致命批判的。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大大小小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派也乘机出现。鉴于这种情况，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斗争。列宁斥责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柔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的东西，“奉献”给无产阶级，他并把这些人称作旧制度的哭丧妇。列宁揭露了“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揭穿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折衷主义、诡辩论和机械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谬论；同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进行了坚决斗争。列宁在谈到青年教育问题时指出，青年们还在用资产阶级的旧货色去学习社会科学，这是我们的耻辱，他号召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不要把精力消费在大家听厌了的旧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要坐下来写几本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书籍，去进行斗争。

在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波格丹诺夫理论活动的重点转到了社会历史方面。波格丹诺夫曾在苏联社会主义科学院工作，同时担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但是，他的哲学立场并未改变，而是改头换面地继续兜售主观唯心主义。从1913——1922年他连篇累牍写出《组织形态学》、《生动经验的哲学》等著作。他宣称，《组织形态学》，清除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缺点和谬误，是全新的东西”，是“集科学之大成”的“绝无仅有的科

学”，是“关于组织自然界的一切要素、实践和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一般学说”。

他还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能论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提出：把社会科学生物学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特别推崇“社会动物学”，认为它不仅研究人的社会生活，而且还要研究蚂蚁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的著作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老货色。列宁密切注视波格丹诺夫的活动，曾打算著文批判，由于其它工作繁忙，只好请当时担任共产主义大学校长的维·依·涅夫斯基写了一篇题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的文章进行批判，并把该文附在1920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版的后面。

涅夫斯基的论文着重揭露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的基本立场，指出他标榜的作为科学上的最新成就的哲学不过是僵死的腐朽的反动的哲学。涅夫斯基指出只要翻阅一下波格丹诺夫近期的新作立即就会看到他仍然是原来那个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信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批评家，①不同的只是波格丹诺夫现在更露骨地攻击马克思。

涅夫斯基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揭露了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他说：“从前，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整个世界应归结为要素——感觉；现在，他还是把那些声名狼籍的要素作为一切基础的基础。”②波格丹诺夫还和过去一样在纯粹唯心主义立场上，固执地认为，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

涅夫斯基揭露了波格丹诺夫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拙劣伎俩。波格丹诺夫胡说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没有达到十分明确和完善的地步”。“在辩证方法的公式中就掺杂着随意的成分”，“连辩证法的意义有时

①②《列宁全集》第14卷，第384页

也被严重地歪曲了”。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不科学的。因此他要来纠正马克思的“过错”和“谬误”，“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用“组织过程”论代替一般发展原则，用机械的“方向相反的力量冲突”论代替对立统一的规律，用“平衡”论代替辩证法。总之，他要用他的“组织形态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十分赞赏涅夫斯基的论文，说它揭露了“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①这这篇论文揭露了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活动的实质，对苏联哲学界反对波格丹诺夫哲学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强调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重要意义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首先就是斗争性、进攻性，就是要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列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各个流派。指责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索罗金发表的反动文章，是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故意歪曲事实真象，是最粗暴、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对各种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哲学加以坚决的揭露和追击，要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反对宗教迷信和蒙昧主义。

列宁认为：在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斗争中，共产党员必须同非党群众结成联盟。如果共产党员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

①《列宁全集》第14卷，第8页

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哲学战线上，共产党员只有团结党外的唯物主义者同非党群众结成联盟，去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派，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取得哲学斗争的胜利。

列宁强调指出，战斗的唯物主义应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由于长期以来农奴制的反动统治，宗教在俄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为了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全国广泛地进行了反宗教宣传。战斗的唯物主义应该把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作为反对哲学反动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要成为宣传无神论的阵地，要用各种文字出版一切有关文献，把一切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用以教育人民群众，反对一切现代的僧侣主义。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应该运用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特别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的战斗无神论的著作。把愚昧无知的千百万人民群众从宗教迷梦中唤醒，使他们振作起来。那些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不容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共产党员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列宁还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科学无神论，强调科学无神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揭露了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蒙昧主义的密切联系。他指出，现代信仰主义的特点在于：穿着袈裟和未穿袈裟的僧侣在口头上都不懂得科学，但却竭力利用科学的困难和成就来为自己的目的辩护。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宗教及其一切形式的哲学论据进行斗争时，还应当把无神论的宣传同争取改善工农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同自然

科学知识的传播联系起来。因为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在反宗教的宣传中，也应当同这个祸根作斗争。

实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列宁在本篇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加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他说："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①这种联盟对双方都是有益，必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依靠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就不能卓有成效地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因此，哲学工作者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对这些新成果作出新的哲学概括，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就根本既没有斗争性，也不是唯物主义。"②同样，自然科学家不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就不能从理论上正确地理解科学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

①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页。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斗争，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这样，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和各个领域正处于深刻的革命变革时期，以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哲学的结论。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工作，特别是对自己的科学成就做结论时，总是受一定的哲学指导的，不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会受别的哲学的指导。历史上有些自然科学家，甚至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在他们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时，尊重客观实际，因而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但在对自己的科学成就进行概括时，却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支配，因而得出错误的哲学结论。列宁认为，在评价这样的科学家的时候，要把他们的自然科学成就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结论区别开来。哲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结成巩固的联盟，既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能繁荣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列宁这一思想指导下，苏联的自然科学家纷纷撰写文章，对在自然科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的指南，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米丘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就是改变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教给我们怎样主动地去影响自然和怎样地改变它”①。十月革命后米丘林的生物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成为苏联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的创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结果，而且也为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

①《米丘林选集》第493——494页。

继承优秀的哲学遗产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条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十分重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收集、保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量著作，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及研究哲学著作的出版计划。与此同时，列宁又提出了研究优秀的哲学遗产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和具有战斗力，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工人运动丰富经验的同时批判地吸收了历代优秀哲学遗产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剥掉了它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取了它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中排除了它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又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推动哲学的发展，列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应该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节录，一方面应该以马克思怎样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为榜样，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怎样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怎样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应该联系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所提供的实例对辩证法加以评注。此外还要把有研究能力的人组成“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以此来推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在这方面，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典范。

他在对赫拉克利特、亚里斯多德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作

了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后，撰写了《哲学笔记》，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了新阶段。在对当时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马赫等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著作作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剖析之后，撰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

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继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哲学著作，它不仅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战斗的纲领，而且对于整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九章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

（1925——1953）

约·维·斯大林（1879—1953）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列宁逝世。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在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期间，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斯大林所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出他的贡献，是同苏联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任务分不开的。列宁逝世后，在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在政治上急需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要求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思想上需要战胜机会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攻击，克服党内在重大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统一全党的认识。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坚持列宁主义路线，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苏联人民和军队，彻底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战后，他领导苏联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在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斯大林建立了伟大的不朽功勋，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斯大林根据他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斗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写下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许多理论著作，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对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捍卫和发展

列宁逝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苏联党内，曾出现一种贬低、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的倾向。因此，坚持列宁的革命路线、捍卫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成为当时政治、理论战线上的一种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驳斥和清算了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了布哈林的“平衡论”和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系统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国际环境，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

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和阐述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思想

托洛茨基主义是用“左”的词句和“革命”姿态伪装起来的反对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其代表人物列·达·托洛茨基（1879—1940），是深受第二国际理论影响的人物。他早在1905年，就提出其“不断革命论”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自称这一理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方面构成的”。第一，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跳过民主革命阶段搞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他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无产阶级夺权

后，将更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无产阶级将与农民私有者发生敌对冲突，只有把革命推进到其他国家，才是出路。第三，所谓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一国维持革命只是暂时状态"，一国孤立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会由于各种内外矛盾的增加而灭亡，只有依靠国际革命的支持，才能胜利。托洛茨基从其"不断革命论"出发，一直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学说。托洛茨基分子把十月革命后的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在1923年秋发表的"四十六人政纲"中断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危机"，攻击党内制度不民主，以扩大民主为借口，要求党承认派别活动的自由。托洛茨基还发表个人公开信，污蔑老布尔什维克已经"蜕化"、"官僚化"，要求"更换党的领导"。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还发表《论列宁》、《十月革命的教训》等文章，胡说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只是农民问题，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的偶然现象。他极力抹杀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对此，斯大林先后写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和《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一系列著作，歌颂列宁的丰功伟绩，揭穿托洛茨基的捏造，维护了列宁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

第一，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内容。他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 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运用和发展，揭示了列宁主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列宁主义不是俄国的特殊现象，而是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5页。

第二，论述和发展了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经验，明确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归纳为：

（一）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二）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①在这里，斯大林突出地阐发了列宁把组织经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任务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斯大林还对专政和建设的关系作了论证。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以支持战争；在和平时期，必须坚持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他把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当作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区别。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却把夺取政权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为了贯彻这一思想，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把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定为“党的基本任务”，认定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党的“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②

第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认识论中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斯大林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列宁主义

---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5页。

②《斯大林全体》第7卷，第294页。

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① 他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尖锐地揭露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使理论“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词句“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② 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错误时，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教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雅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③ 在分析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时，他提出：这是因为列宁处在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时期，正是帝国主义的充分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才使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列宁成为列宁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也才能发展到新的列宁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分析，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观点。

斯大林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提出了下述著名的论断：“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④ 他在分析革命理论是怎样实现其对革命实践的巨大作用时，还说：“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⑤ 这些精辟透彻的分析，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对各国工人阶级研究理论，

①②③《斯大林选集》上卷，194、193、196页。

④⑤《斯大林选体》上卷，第199—200、194页。

学习和掌握革命理论，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和引导作用。

第四，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斯大林领导全党同托洛茨基一伙的斗争，一个中心问题是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改造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与农民的冲突；无产阶级应以武力“推进”世界革命，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任何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是“反动的空想”。因此，苏联应放弃和平的经济建设·与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则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批判了他们的谬论，不仅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而且进一步发展这个学说。斯大林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战胜本国资产阶级。但是，社会主义最终的胜利，则有待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主要国家内取得成功。这里，斯大林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区分开来，使列宁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和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实践证明了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经过八年到十年时间的革命和建设，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体系在一切经济部门中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就在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批判德波林的唯心主义，捍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时期。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界高举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旗帜，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斗争服务。但是，苏联理论界却出现了正如斯大林所批评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理论工作与实际生活相脱节的突出表现，就是对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理论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斯大林强调："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①]斯大林领导苏联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就是捍卫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德波林（1881—1963）在二十年代曾经担任过苏联哲学界的领导工作，并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主编。以德波林为首的德波林学派，是在当时反抗机械论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成员有卡列夫、史登、卢波尔、弗兰克福特、格森、列文等人。德波林及其学派在苏联哲学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的哲学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违背列宁和联共（布）中央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规定的方针，没有批判各种唯心论、"时髦的"资产阶级倾向，没有揭露宗教的欺骗宣传，没有揭露俄国资产阶级的复辟言论，德波林等人无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他们在社会大变革年代里，没有去研究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践所提出的哲学问题，而是忙于对哲学史作经院式的注释。而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德波林也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批判地吸取历史上的哲学遗产，而是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美化黑格尔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就其一般的哲学世界观来说，属于斯宾诺莎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综合。"[②]还说什么，"应当承认黑格尔的体系是正确的。"[③]他主张"矛盾的调和"，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观点打掩护。他吹捧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1页。

②③《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1年，第2期。

他说什么：普列汉诺夫首先是一位理论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领袖”。“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是偶然现象，并且没有独立的意义。”如此等等。

斯大林对德波林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在同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成员的谈话中，把德波林学派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提到唯心主义的高度进行批判。他说：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其特点是，理论脱离实践。他们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不想研究这些问题，即使研究也曲解这些问题，他们拒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哲学战线的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根据并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研究理论问题。斯大林还指出，德波林学派总是在引用马克思的词句的掩饰下，宣传唯心主义；用歪曲了的黑格尔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还说：抬高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是错误的。列宁在一切领域中都提供了新东西，在一切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不想承认这一点，否认这一点。斯大林的谈话，揭穿了德波林学派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捍卫了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为哲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斯大林的号召下，联共（布）中央以及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作出决议，掀起了批判德波林学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高潮，并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

经过批判德波林学派，苏联哲学战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端正了哲学理论工作的方向。哲学为实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得到了贯彻，从而充分发地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1931年4月召开的全苏哲学战线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哲学家应面向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等具体知识，所有哲学研究机关、哲学协会、哲学刊物都应把重心转向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在实际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加强了对列宁哲学遗产的研究。1931年以后，苏联

哲学界把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放到首位，出现了大量论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的著作，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列宁的哲学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有力地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作用。经过对德波林的批判，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得到了贯彻。苏联哲学界增强了自己的战斗性，加强了对各种修正主义理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斯大林十分关注哲学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对列宁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内在联系，使列宁提出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又进一步具体化了。他坚持不懈地维护哲学的党性原则，耐心地纠正一切企图离开这个原则的倾向。1944年，在斯大林领导下，苏共中央作出正确解释德国古典哲学的决议，批判了《哲学史》第三卷抹杀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对黑格尔反动的种族主义观点保持缄默的客观主义。1947年，在斯大林领导下，苏共中央又批评了哲学研究中否认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客观主义倾向，以后，斯大林坚持哲学党性原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任务，并为阐发辩证法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和特点，作出了贡献。

批判布哈林的“平衡论”，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法

布哈林（1888—1938）于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从党的“六大”起任党的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他

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1918年他曾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开始持“缓冲”立场，后又参加托洛茨基集团。1921年，他支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为新经济政策辩护的理论，并在列宁之后进一步发挥了这些理论。他从当时俄国国情出发，主张通过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合理结合，社会主义形式与非社会主义形式的结合，有计划地保持工农业均衡发展，他把联合农民的问题当作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主张各阶级合作等等。后来，他反对苏联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的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新方针。斯大林认为布哈林集团（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人团”）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把布哈林称为“右倾反对派的理论家”。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和《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等演说中，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的“平衡论”，指出他是一个“不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1929年布哈林被开除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主席团，1937年被开除党籍，1938年被处决。

布哈林长期从事理论工作，著作很多。其中《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共产主义ABC》（1921）、《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等等，颇有影响，有的还得到列宁的称赞。尽管列宁对布哈林理论的缺点和错误，曾多次给予严肃的批评，但是，仍然对他在这方面工作作了很多好评。他说：“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称布哈林是“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②

布哈林提出的“平衡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

①《列宁全集》第32卷，第79页。

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并且到二十年代后半期，一直用平衡发展的思想解释一切现象，主要是社会现象。在布哈林看来，任何事物或现象（“体系”）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它与其它事物或现象（“环境”）处于互相联系之中，处于“平衡”的状态。关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他认为：“第一，平衡状态；第二，平衡的破坏；第三，平衡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如此周而复始，以至无穷。在运动的内因与外因关系上，他虽然承认运动的“基础就是内在矛盾的发展”。①但是他强调“体系内部构造（内部平衡）的变化，应取决于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因素。”②布哈林的“平衡论”是一种把烦琐哲学与内在矛盾的辩证法调和起来的观点。当他把这种观点应用于历史和社会问题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列宁曾对布哈林的平衡论做过批评，说“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③并指出只有“相对的平衡，才是正确的。④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政治和经济的平衡主张，就是以“平衡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正是这些主张因与当时联共（布）中央在斯大林领导下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而被斥为右倾路线。

斯大林对“平衡”论的批判，是从政治经济方面着眼的，他在批判“平衡论”时指出：在这种“平衡论”看来，在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和资本主义成份，好象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到它们相交时，就有了社会主义。他说：“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

---

①②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6—77页、第81—82页。

③《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④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43—44页。

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①斯大林认为，“平衡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斯大林在批判“平衡论”时指责它是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并对此进行了批判。斯大林说：虽然右倾分子，承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分子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资本主义分子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他还说：右倾分子虽然不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同时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手段和“大道”。他们不愿意承认，不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就不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村。他们认为农村能够悄悄地、自流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只有通过供销合作社就行了，因为他们相信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目前主要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解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解除羁绊”。

斯大林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罪过在于它脱离列宁的阶级斗争观念而滚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去了。”②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界也对布哈林的“平衡论”进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2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页。

行了批判。对布哈林等人的批判，为全党统一思想，为顺利地推行斯大林所阐述的联共（布）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布哈林的“平衡论”，布哈林提出的路线、主张是否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二节　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新概括

苏联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37年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摆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在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条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斯大林十分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总结十月革命以后历史发展的新鲜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用这一规律性的知识武装全党，武装群众，向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宣传教育。在这一方面，斯大林1938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他晚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1938年，联共中央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亲自为《教程》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后来，此节单独成书，大量发行，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本书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密切结合党的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系统地概括和通俗地阐明了辩证唯物生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幅不大，条理分明，逻辑严谨，容易为读者所理解。这种论述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部著作，既综合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又结合总结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在理论上有它自己的特点。

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系统论述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过许多阐述。斯大林根据这些论述，对它的基本特征作了新的概括，共分为四点：一是把自然界看作是“有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三是发展过程是“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地量变积累而成的”；四是自然界的对象或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①

斯大林这样的论证和分析有着独到之处。第一，他是把这四个特征作为辩证法的整体进行表述的，从分析自然界的外部现象开始，依次进入事物的本质，从而揭示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质。前三个特征：普遍联系、运动发展、量变质变是事物和现象存在的状态和形式，后一个特征——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实在内容，是普遍联系、运动发展和量变质变所以可能的原因和动力。这种表述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也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可以使读者较为容易

---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5——429页。

地从辩证法的原理和规律的内在联系上，从总体上把握辩证法。第二，斯大林在叙述这些特征时，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行对照，把两者从各方面对立起来，突出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辩证法革命的批判的本质，使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否认质变、调和矛盾的错误观点，鲜明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能够使读者从两种宇宙观的鲜明对立中学习和掌握辩证法。第三，把辩证法和党的实际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巨大意义。斯大林在这里批判了资产阶级所谓“永恒正义”、“永恒原则”、“永恒观念”的谬论，提出了“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著名原则。这一原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制订政策和进行活动的一条准则。

对唯物主义思想特征的新表述

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还概括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把这些特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质物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①第二，“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想和物质分开。”②第三，“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验检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

①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2页。

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①

斯大林概括的这三个特征，简明地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这方面的叙述方法，有着鲜明的特色。第一，他着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联系上，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体系，指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说明世界自身的面貌，指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而物质世界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有规律地运动和发展着。第二个特征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强调思维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第三个特征说明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认识的真理应由经验和实践检验。全部论述逻辑严谨，言简意赅，步步深入，使人易于领会。第二，在论述每一特征时，分别把它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可知论、现代信仰主义对立起来，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第三，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证，一方面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发挥和深化了列宁思想。斯大林指出：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他强调：无产阶级党在实际活动中，应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以从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他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②

①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4、第436页。

在指出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之后，斯大林论述了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他认为有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他们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旧的思想和理论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起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而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起促进社会发、促进社会前进的作用。这种作用分别为“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把马克思、列宁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大大地加深了一步。

深入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概述。

第一，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研究解决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

第二，斯大林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的内容的特征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肯定地指出，社会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等因素应当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这两者都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经常条件，起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但是，两者又都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决定的原因。他强调：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斯大林认为，生产方式包括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生产关系。用于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它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构

成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第三，斯大林指出了生产发展的三个特点，并作了具体的分析。通过分析，深刻地阐述了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为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科学地研究历史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斯大林指出："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①因此，斯大林认为：研究历史要以生产的发展过程，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以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为基本出发点，从中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他说：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②

斯大林认为，"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③斯大林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特别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强调生产关系迟早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斯大林依据生产工具与技术条件的变更，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各种基本类型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的出现都是必然的，而且后一种类型总是要比前一种类型进步，这样就从根本

①②③《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3、444、444页。

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斯大林指出："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①斯大林分析了这种自发的过程和通过革命的过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变化的这种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过程，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的革命的暴力行动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正是通过这种作用使自发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既是我们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锐利思想武器，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这不是说这本书没有缺点。它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致性没有足够的阐述，在叙述形式上，把辩证法放在唯物论之前，把辩证法仅仅当作方法，以至给人以理论和方法被割裂的印象，对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规律也阐述的不全面，如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没有提到，而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也未予突出，并且在阐述这个规律的内容时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50页。

又过分强调了斗争性的作用，对统一性根本不予重视，只讲量到质的转化，不讲质转变为量的增长。在讲唯物主义时，没讲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区别。在讲历史唯物主义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的实例，表现出把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等同看待的倾向。所有这些严重缺点，致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贫乏化、公式化，对后人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因此，重视对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从理论上清除其缺点和错误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1950年在苏联《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时，为回答一部分青年同志提出的问题而写的。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批判了苏联语言学家马尔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周期性爆发的形式而发展等错误观点，系统论述了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也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某些新的观点。

第一，斯大林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强调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对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斯大林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相互作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页。

用，斯大林也作了简洁的分析。他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当的设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如果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如果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这里，斯大林明确告诉我们，阶级性是上层建筑的"本质"，这种本质作用体现在它为基础服务，积极帮助基础形式和巩固，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这就把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后期所强调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具体化，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相关，斯大林还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历史性。他说：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它的生命不是长久的，它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应当指出，斯大林这一表述，尽管有其正确性，但它忽视了旧意识形态并不随着旧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很快消灭，还会长期存在的现实，是不准确和片面的。

在说到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的关系时，斯大林说："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①这一点比经典作家以前的有关论述更为明确了。

第二，明确地概述了辩证法关于事物质变的两种基本形式的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5卷。

原理。斯大林分析了语言发展的规律，批判了语言经过爆发而发展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①]他进而告诫"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础之类的其它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②]他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根据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关于社会领域这种"非爆发式飞跃"的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已经在实际上有所涉及，但是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地提出来。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的这一概括是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完全证实了斯大林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三，批判了把思维同语言割裂开来的唯心主义观点，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态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认为思维可以不借助语言就可以产生，宣称要把思维从语言的"自然物质"下"解放"出来。斯大林指出，这是唯心主义。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说，不论人的头脑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

①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9页。

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说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得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斯大林批评了教条主义的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认为，引证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一成不变。斯大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两个实例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些国家同时胜利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的问题；一个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的实践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脱离历史条件作形式上的引证，就会说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然而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斯大林把这种人称为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这种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公式看做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认为，这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只要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加以引证，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斯大林说：“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

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①

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②他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不滞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③

教条主义是在认识实现第二个飞跃的过程中产生的，如何克服教条主义既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也是认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斯大林所分析的教条主义现象，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革命实际问题时经常出现的现象，苏联党内曾经出现过，中国党内也出现过，而且一个时期克服了，在另一个时期又可能重犯。因此，斯大林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的揭示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时期。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被迫中断。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将近四年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彻底打败了法

①②③《斯大林选集》下卷，538页。

西斯德国的进攻。战后，苏联人民又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

经过1924——1936年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苏联在各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在工业方面：完成了技术改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已成为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富农，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体系，农业的机械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此，斯大林在1936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①

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在宣布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以后，又提出一定时期内，剥削阶级的残余仍然存在，仍须保持警惕和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作斗争。1937年他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方法》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说到"被击溃的了剥削阶级残余"仍然存在。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4页。

斯大林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符合苏联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特别是他明确地把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残余相区别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自己在1937年以后所犯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也从反面说明如果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会给党和人民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指出：随着剥削阶级的被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开始转移。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①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在此以前，斯大林自己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时也提到这一点，而现在则可以不失时机把重点转到这个方面来。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时，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对此斯大林作了一定的探索。他说："现时苏维埃社会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苏维埃社会里已没有什么彼此对抗敌视的阶级了，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而构成苏维埃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着。"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苏维埃社会，没有阶级冲突，而表现为一幅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画。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的动力扩展了起来。"②斯大林把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苏联社会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合作，各族人民的友谊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看作是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斯大林

① 《斯大林集选》下卷，第470页。

② 《列宁主义问题》第750页。

并不否认矛盾和差别。因此，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克服旧的东西，发展新的东西，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进展的重要任务。在他主持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标志。”但是应当指出，斯大林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更由于斯大林简单地把阶级斗争，只看成是国际因素造成的，看作是敌我斗争，因此，在实践上，造成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损害了苏联内部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的情况。这是一个教训。

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分析

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问世，这是他去逝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虽然也存在着个别错误看法，但确是一部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批判了这些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探索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特性。

斯大林概括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指出：“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它有自己的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工人阶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6页。

级切身利益的要求，使它能够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斯大林认为：所谓“完全适合”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不能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所以，他认为：应该把“完全适合”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力量，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这是斯大林在其一生中，第一次在理论上公开承认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这里，既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一般性质，又说明了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的这一矛盾在解决方法上的不同，因而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二，社会主义政权在组织经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问题上，斯大林批判了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作“残余”归入生产力的错误观点，指出这在实际上取消了生产关系，从而也取消了经济基础，而没有经济基础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斯大林分析了作为苏联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他说：“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

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①]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完成这个困难而复杂的任务，是由于它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然而决不能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这一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斯大林针对当时一些同志的错误观点，重新加以强调，这对于工人阶级正确发挥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斯大林指出任何科学规律都是客观的。他说：科学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并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学规律也是客观的，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斯大林强调，这个原理是不能否认的，否认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斯大林分析了政治经济学规律的特殊性。指出它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斯大林一方面批判了认为客观规律可以"改造"的唯心主义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543页。

观点。他说：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因此，应当抛弃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把规律偶象化”，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说：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

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表述。斯大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经济规律作了深入的分析之后，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科学的对比，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一条基本经济规律。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这一记述表明：第一，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统一起来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是统一的。第二，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②只要抓住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这两条基本经济规律，就能够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把它们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并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两个社会的其他一切现象。

①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568页。

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和途径的探索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历史环境中建成的。因此，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就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苏联的本身实际重新进行探索，斯大林作了这种尝试。他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这就是：

第一，必须切实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因为只有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才能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扩大再生产。

第二，必须运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逐渐用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第三，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斯大林还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实现普遍义务综合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工资，降低物价等措施。

斯大林强调："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①，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1页。

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斯大林告诫一些同志说，这种过渡，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是一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决不能想象得那样简单。

在探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种种问题时，斯大林特别注重这种过渡的渐进性，即在过渡的性质上是一种根本的质变，而在过渡的步骤上又必须是逐渐进行的。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时，他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②当然，斯大林在这里谈的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相통的，是他在语言学问题论证中提出的，使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逐渐消亡，实现事物的质变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所以斯大林在这里的论述是极其重要的，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应当如此，在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也将沿着这一途径逐渐地向前发展。

斯大林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虽然在一些理论问题、政治问题上，部分地但是严重地

①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1，579页。

背离了马列主义，但就其一生来说，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捍卫和阐发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他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新的经验、观点补充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需要的条件和可能的途径等等。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 十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传播和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1917—1921）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传播，是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无产阶级，是经过俄国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具有如下特点：一，它是作为观察中国命运、指导革命的工具被介绍过来，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首先得到广泛传播；二，这种传播又是在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一次又一次斗争中实现的。三，它是日益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产生并锻炼了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就是一个代表。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他的世界观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是有一个过程的。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人民伟大革命实践，为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提

供了理论前提；毛泽东的主观努力，刻苦地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广泛接触社会，总结实践经验，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则是其世界观的转变的基本保证。

1917年至1921年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和传播，都是由一定阶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有其社会阶级条件和思想前提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解放的根本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适应着新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我国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

19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成

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相互关联的两大基本任务。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间，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了大大小小百余次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每次斗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使帝国主义无法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得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就在这同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却在欧洲产生了，发展了，并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直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曾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其报刊上加以介绍，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可能被资产阶级接受和运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接受它、运用它。当时中国虽然在最早的官僚资本企业中有无产阶级，但还不够强大。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才开始成长起来。特别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狗咬狗的战争，无暇东顾，借此机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产业工人增长到250万至300万人左右，形成了一支崭新的社会力量。随着这支新的社会力量的壮大，其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次数也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罢工斗争达130余次，比辛亥革命前七年间罢工数增加一倍多，超过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罢工总数。工人的实践斗争，促使其阶级觉悟的逐

渐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即将走上政治舞台，摆脱了作为资产阶级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革命阶级，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要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承担起自觉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必须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先进思想，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俄国的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大规模的开展。

从鸦片战争失败到十月革命以前的长时期内，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救国救民，争取独立解放，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等思想和政治方案。为了实现这些理论进行了多次奋斗，但结果都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处于黑暗、苦闷、求索之中。伟大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曙光和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革命的巨大指导作用。李大钊率先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918年7月至12月，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经济上解释社会矛盾和世界大战的起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用阶级观点看待社会矛盾现象和阶级状况，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那一国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

工的人占最多数，凡不能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①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运动，“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资本家，必将通通被扫除干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总的看来是宣扬十月革命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当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他于1918年5月带领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失败后，认识到“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③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歌颂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认识，都是同重新考虑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变化了。”④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再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传入，势必引起中国形势的巨大变化。1919年5月，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诸种矛盾交织和激化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五四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个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李大钊、陈独秀等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北京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它的发展又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运

①②《李大钊选集》第110—111、117页。

③李达《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作指导分不开的。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到六月五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以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爱国革命运动就由以学生为先锋发展到到以工人阶级为骨干的运动。五四运动从革命的范畴、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领导力量诸方面都成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使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这是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到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决心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五四运动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沟通了起来。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出现了广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思想运动，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形势。在解放思想、破旧立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先驱者。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五四运动时期，他连续发表了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0页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和互助》、《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概括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学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分理论"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他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的变化，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②因此，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是有不可抗性的"客观规律的。他还正确解释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尖锐地批判了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地赶快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③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家阶级。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述唯物史观时，有些观点具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倾向，不完全正确，但它是在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在唤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觉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可贵的是，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把它同研究

---

①②③《李大钊选集》第177、185—186、340页。

中国国情、改造社会联系起来，把它当成观察中国命运，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这一时期，他还发表许多文章，阐明中国人民必须反帝反封建，才能改造社会。而要改造社会，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他建立并领导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多方面的活动，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他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因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开始为《青年》）而闻名。《新青年》曾明确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抨击封建论理道德，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次，陈独秀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响往法国式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经过五四革命群众运动的战斗洗礼，他逐步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所主办的《新青年》就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从1918年10月起先后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并陆续发表马克思主义译著；《新青年》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专号。《新青年》就成为经常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刊物。以后他又同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也发表了一批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第三，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翻译班子，领导翻译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此外，陈独秀还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大量文章和信件，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他在《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信中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

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经济制度变化而变化的。”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旨有二：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化。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立这基础上面”，“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化。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崩溃，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②他还根据唯物史观，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这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序不可。”③这个开明专制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应当指出，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常常暴露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目前工业不发达，工人觉悟不高”，政治改革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只能由“有知识有职业”的资产阶级领导，有时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杜威实用主义相提并论。这说明他那时在世界观上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后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①《陈独秀文存》第3卷，第300页。

②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期。

③《陈独秀文存》第3卷，第200页。

和背叛革命，都不是偶然的。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1913年赴日留学期间，就阅读了大量介绍马思克主义的书籍。1918年带领留日学生代表团回国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学生运动。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潜心攻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他还翻译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寄国内出版。

李达1920年回国后，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并担任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他参加党的"一大"并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创办并主持了党的地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十余种。李达还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全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唯物史观，明确肯定了中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揭露无政府主义论点的荒谬，指出它的世界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的三次大论战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服务，

指明这一阶级的任务，证明当前的制度必然要为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觉悟，威胁着剥削阶级统治的秩序，因而必然引起剥削阶级的反对和压制。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逮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严防“过激主义之鼓吹”；另一方面又颐指一批反动文人，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猖狂的进攻，这样，就先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的三次大论战。论战的结果，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被打败了，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于1919年7月便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从哲学上来说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革命发展观的斗争，从政治上说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斗争。

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忠实门徒。他为了对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了“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崭新的基础”，在五四运动前夜，不仅从美国搬来了实用主义者杜威到各地“讲学”，散布实用主义的反动哲学；而且自己还撰写了《实验主义》和连续讨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等等，从各方面鼓吹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性；鼓吹社会改良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鼓吹英雄豪杰决定历史，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等等。他对各种主义和理论的产生作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认为"一切主义都有某时某地的有心人"用自己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所"设想"出来的"一种救时的具体的主张。"①他还将主义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认为主义不过是"抽象的名词"，而"世界没有一个抽象的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因此他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他以反对"空谈外来的进口的'主义'"②为托词，攻击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十篇剩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③。在这里，胡适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胡适攻击的重点。他说这一理论养成一种阶级仇恨心。他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在"多研究些问题"的幌子下，鼓吹孤立地研究什么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等等，主张对旧社会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改良，企图以此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当胡适等人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时，立即遭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坚决回击。李大钊于1919年8月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驳斥了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开来，用研究枝节问题来代替解决根本问题的谬论，指出：问题与主义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互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空谈主义是不好的，应当与实际相结合；根本不谈主义更是错误

①、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每周评论》第31号。

③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期，第1号，1918年12月。

的，只会就事论事，舍本求末，达不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的目的。李大钊所说的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①

李大钊还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腐朽的旧制度，只是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是没有希望的。他认为，经济构造是整个社会法律、政治、伦理等构造的基础，只有“经济制度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制度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要改造社会制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则，社会的改造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当时李大钊在论述阶级斗争的问题的时候，尽管还有某些偏颇之处，如认为“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③“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④等等。这些观点还带有唯心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肯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其主导的方面，李大钊为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通过阶级斗争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张东荪、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分子于1920年，接过社会主义旗号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挑起了关于

①②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日。

③④《李大钊选集》第222、194页。

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

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攻击，便首先指向唯物史观。这些假社会主义者攻击唯物史观过分强调了物质的作用而忽视了精神，他们极力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张社会的进化是人的思想智力推动的，鼓吹改造世界首先是精神改造的谬论。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所维持的"，因此，"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张东荪在《我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精神方面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组织是不能改造的。他并连篇累牍地提出要用怀疑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张君劢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中，把十月革命歪曲成列宁个人的天才和胆略所造成的。他们还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宣扬中国不存在阶级分化，否定中国劳动阶级的存在，断言中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运动。他们还承袭胡适的手法，从英国请来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实在论者罗素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学"，散布主观唯心论、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思想，攻击十月革命，发表反苏言论，鼓吹"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是中国的自由之路。"他们与罗素相结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张东荪叫嚷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未觉悟，不能形成任何势力。"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在回击这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的斗争中，戳穿了他们从历史唯心论出发，用人的思想、精神或用伟人的意志、天才与胆略解释革命的谎言。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针对"许多走狗学者"所散布的谬论，尖锐地指出："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

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谈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只眼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①]他不仅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事实，而且说明了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主义的敌人散布的谬论。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的信中，驳斥了罗素等人主张用教育的方法，反对俄国式的革命，反对劳农专政的方法，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谬论。他说：“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他还从历史上，心理上等方面作了分析，而赞同蔡和森同志关于“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②]

1921年5月至8月，李大钊、蔡和森、陈独秀等人也分别写文章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如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说：“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世界经济条件之外。”他指出，中国的一般平民所受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为痛苦。在世界已出现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下，在中国的劳工运动已经日盛一日的风潮中，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那是“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的”。[③]

陈独秀在1921年7月1日所作的《社会主义批评》的长篇讲演

①《李达选集》第1卷，第4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7页。

③《李大钊选集》第356页。

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详尽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他说：“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至最后一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其必要的讲义”，“只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应走俄国共产党的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二十世初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曾在冲击封建专制统治方面起过某些进步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本质就日益暴露出来。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敌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政治思潮。在当时，它表现的基本特征是：极端夸大个人自由，反对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组织纪律，一切集中领导。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公开承认：“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主义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改造社会经济关系，反对私有财产，反对特权阶级，这些是与社会主义相似的。但它主张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立即消灭一切国家，一切权力，反对无产阶级政府，这又是与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相反的。可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虽然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但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然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就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为“专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工农武装就是“压制个人自由”；无产阶级国家法律是“抹杀个人”、“独裁专制”，等

等。这样，不粉碎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不划清它与社会主义的界限，要顺利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实现的。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1920年起到建党前后，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陈独秀、李达先后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谬论。陈独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不能把强权和罪恶划等号。"强权之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与无道，压迫弱者与正义。"假若反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这样，"就不应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世界各国最不平最痛苦的事，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法律等机关，压迫劳动阶级。要消除这种不平等，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已造成新的强力，并运用它完全征服资产阶级，然后才可望废除私有财产，改变过去那种不平等的经济状况。否则，即使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实现，那班资产阶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①毛泽东也参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说："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他进而指出，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②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认清了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好朋

①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7—8页。

友，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他们还觉悟到，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中国劳动人民进行新的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战胜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日益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是许多革命者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青年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根本转变世界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由他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教育等客观条件，以及他本人的主观努力所决定的。

毛泽东生活在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强大敌人反复较量、激烈搏斗的年代。他虽曾受到封建思想文化和宗教迷信的影响，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教育，但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立志救国，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批判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并自觉地投身到社会革命实践之中，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逐渐实现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毛泽东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没有越出民主主义的范畴，世界观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当时，他是中国青年中出类拔萃的先进分子之一。他向往革命，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凡是当时能够找到的进步读物，都如获至宝地去学

习。在学习中经过独立思考，吸取其精华，增长自己的见识，因而思想上不断迸发出符合于当时革命实践要求的新的世界观的萌芽，为以后世界观的彻底转变逐渐创造着条件。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中。他在十六岁以前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经书”，也读过《水浒传》、《隋唐演义》等造反的书。这个时期，还读到了一位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盛世危言》，他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①在他读到的一本名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之后说：“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②1909年，毛泽东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在这里他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拥护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他说：“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③

1910年，湖南发生了震动全省的抢米风潮，对反动统治者剥削和压迫忍无可忍的饥民们行动起来了。他们在长沙攻打湖南巡抚岑春蓂的衙门。十七岁的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对他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回忆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些是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④这件事对于毛泽东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1年，发生了震撼全国的辛亥革命。当时，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的湘乡中学刚刚读了半年书。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他投入了革命洪流，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新军，当了一名列兵。不久辛亥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官僚所篡夺。在湖南，地主官僚代表人物谭延闿用阴谋手段篡夺了“都督”的位置。时局的发展，使毛泽东感到在新军中继续干已没有什么意

①②③④《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9、13、15、11—12页。

思，当了半年兵之后就退伍了。

毛泽东退伍以后，于1912年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因对这个刻板守旧的中学不满，仅读了半年就退学了。退学后他住在长沙的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刻苦读书。半年多的自修，读了很多新的书籍，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等。毛泽东从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获取了不少的教益，为他以后确立新的世界观提供了批判继承的思想材料。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在这五年半的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而在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①这时他的政治思想是民主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

在一师求学期间，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位教师就是杨昌济先生。杨昌济自幼喜欢读程朱之学，青年时期具有爱国思想，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十年，专心研究教育、伦理学和哲学。对于王夫之、谭嗣同、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有深刻的研究。他在哲学观点上虽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学识渊博精深，思想进步，人格高尚，特别是有着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这对于受他教育的青年人来说，起到了很好的影响。毛泽东考入第一师范不久，就积极参加了杨昌济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活动；在杨昌济的指导下读了大量中外哲学文史方面的书籍，受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薰陶。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在他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得到明确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5页。

的表现。他把“宇宙之真理”视为“大本大源”，他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这封信虽然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哲学论理观念指导人们实践活动，改变社会国家面貌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但是片面夸大精神、主观因素的作用，这就导致唯心主义了。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指导下，认真钻研了由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十九世纪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ulsen）著的《伦理学原理》，根据阅读这本书的体会，他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论文。毛泽东回忆这件事情时说：“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①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还写了一万一千多字的批语，这个批语被毛泽东的一位同学保存了下来，它已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

从批语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例如他在解决知、信、行的关系问题上说：“夫知者，信之先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样的步骤排列，显然是把知看成是第一位的东西。他又说：“世界故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这里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就表现得更明显了。他还说：“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也表露了意识决定论的唯心倾向。对于世界本原问题，批语中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又说：“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我即实在，实在即我”，“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生即死，死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即生”等等。这些说法，明显地表明他思想上的心物二元论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从批语中，我们也看到许多蕴含着新的世界观萌芽的东西，看到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思想。如说：“人类者自然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没有不必然者”。他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虽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也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顿失其完全。”毛泽东当时虽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这里所谈的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互相制约的道理的。在认识论方面，批语也表现毛泽东尊重客观事实的求实精神。例如他讲到判断人的善、恶标准时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又说：“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尊重客观现实的求实精神是很可贵的。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政治思想上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他原来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很赞赏的，而在这个时期已大大突破了崇拜康、梁的精神境界。1915年9月，由陈独秀编的宣传“民主”和“科学”的著名革命刊物《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了。经杨昌济老师推荐，毛泽东成了这个刊物的最热心的读者。刊物上发表的许多革命文章启发了毛泽东，使他政治思想上得到很大的长进。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①

---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0—31页。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发起的湖南第一个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正式成立。该会会员最初有十几人，到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发展到八十多人。新民学会开始时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7月以后，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组织对当时湖南人民的思想生活和革命活动作出了贡献，有许多会员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骨干。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论文。这是毛泽东在早期发表的有着更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著作。论文对于德、智、体的关系作出了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科学解释。他说：“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又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文章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对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总之，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在不断取得社会活动经验的同时，其思想也不断地成长着、进步着，也不断产生新世界观萌芽的东西。但是，这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体系上还是混乱的。正如他自己所讲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帮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

---

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版，第125页。

社会实践的锻练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促进了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进程

1918年夏至1920年夏，是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时期，也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他两次到过北京，两次到过上海，接触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著名革命先进人物；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等重大革命活动，并且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思想上有了明显提高，并日趋成熟。但是，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转变。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湖南的青年赴法留学，毛泽东和罗学瓒等人一起到了北京。在赴京的路上至河南省郾城县，大水冲断铁路。他们在郾城停留期间，作了社会调查。到北京以后，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把毛泽东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李大钊领导下，当了图书馆的助理员。在这个期间，他参加了北大师生组织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的活动，在新闻学会里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毛泽东说："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①这次毛泽东在北京共有五个月。他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②

1919年初，毛泽东由北京赴上海，在上海送走了第一批

---

①②《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4页。

赴法留学的朋友之后，就回到了湖南。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湖南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刊在长沙出版。他在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宣言中，赞颂了“世界革命”、“人类解放”，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确实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高明见解。但是，该宣言又主张：“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还提出对各种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高呼，将它打倒”。在方法上，还提出搞“持续的‘忠告运动’”，不主张“有血革命”，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章中突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这个思想很宝贵的，它在战略指导上对于宣传革命变革，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文章提出的一些革命主张和方法来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1919年7月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连续三期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论述了民众大联合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大联合的形式和方法，提出大联合要以小联合为基础，建立各种“协会”、“同盟”等团体，由此组成大联合。他说：“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些豪迈的断语已经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但是，在谈到联合起来的行动时，毛泽东列举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马克思的“激烈派”办法，另一种是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办法。对这两种办法，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拥护哪一种，反对哪一种，而对于后一种办法，却说其“意思更广、更深远。”可见，毛泽东在这时还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该文对他过去曾崇拜过的谭嗣同、梁启超等名流的变法思想，进行了有独到见解的评价和批评。他指出："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的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为了组织驱张（湖南的反动统治者、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到了北京。这次在北京四个月时间内，他有机会阅读了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①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使毛泽东加速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的进程。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由北京写信给周世钊时指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②

1920年4月14日，毛泽东由北京第二次去上海。在上海又见到了陈独秀，同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这次谈话，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

---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看来，这次谈话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20年7月至10月，毛泽志在湖南积极领导了当时掀起的自治运动。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全自治”与“半自治》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方针上指导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反对当时的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来说，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当时毛泽东对湖南自治的指导思想来说，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和革命的正确道路。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①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

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是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湖南广泛深入地进行革命活动，同一些新民学会会友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起旅俄勤工俭学；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引导进步青年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加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革命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同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等作了两次长篇通信。在通信中，他们系统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对当时颇为盛行的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思想，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表示坚决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和革命路线，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致胜的方法”，……“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信中还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8页。

他赞成马克思的方法，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回信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的意见。他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他们在通信中研究了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蔡和森的第二次来信和毛泽东对第二次来信的复信，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和专门的研究。蔡和森认为在中国建立的共产党不能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式的，也不能是德国修正主义社会党式的。他说："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蔡和森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蔡和森要毛泽东在国内作好建党的准备，他说，作好了一切准备以后，"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且特别强调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②。

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在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次通信的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以前的工作和思想也作了总结清理，从此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个时期他在《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后面加的按语，给向警予的信，以及引导湖南劳工会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中，都明显地表现出已经同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彻底划清了界线，完成了从旧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这时候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宗旨，也从以

①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8、15页。

前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提高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使这个团体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毛泽东、蔡和森的领导下，批判克服了学会成员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明确了指导方针、活动方法和政治方向，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党作出了必要的准备。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就同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了于七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是经历了由量的逐渐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的。在1918年以前主要是量变的积累过程。这个时期，他的哲学观点，虽然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在思想上已有了唯物主义的萌芽。1918年以后，毛泽东参加的革命实践活动愈来愈广泛和频繁，得到的实践经验也愈来愈多，并且开始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速了世界观转变的进程。但是从整个思想状况来看，在1920年夏季以前，还没有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只有到了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他的世界观转变才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同蔡和森的两次通信，正是这种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在通信中，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首次提出了把唯物史观作为我们党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同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有相似之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中，逐步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毛泽东也是在亲自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中，逐步在哲学上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从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在革命方针和革命方法上从赞成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转变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这三个方面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完成转变的时间上也大

体上是一致的。这三个方面转变的一致性，是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特点。这种一致性也正说明了这不是个别思想上的简单转变，而是世界观思想体系上的根本转变。

促成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因素，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思想基础。他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前，虽然抱着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从当时认为是最好的读物中汲取了一些进步的思想，经过独立思考，也能产生某些新世界观的萌芽。但是，正如同他接触的这些读物的作者在世界观上受到的历史局限性一样，仅凭这样的思想武器是冲不破旧世界观藩篱的。只有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掌握了它的精神实质之后，才促进了他在世界观转变上的飞跃。

第二，直接参加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途径。如果只是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却使理论同实践相脱离，就不会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自己在世界观上升华到更高境界的。

第三，善于发挥集体的作用和集中群众的智慧，是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① 这句话实实在在地讲出了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集中群众的集体智慧，发挥革命者的集体作用，是促成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条件。

第四，使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是毛泽东世界观变的内在动力。“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是毛泽东于1917 年8月

①转引自刘斐：《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

23日，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讲到的一句话，这是他自我鞭策的重要格言。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经常使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用今日之正确思想，批判和代替自己昨日之错误思想。例如他曾尊崇过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当他认识到康梁的阶级局限性之后，就丢掉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也尊崇过胡适，而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清了胡适思想的根本缺陷之后，就对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清除了自己所受到的错误影响，等等。由此看到，使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正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思想上的自我改造精神。

最后，具体、鲜明、热烈的奋发精神，在促成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觉的能动性作用。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从他提的这三条及其所作的解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个人素质上所特具的性格，以这样的性格同其他方面、因素结合，使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上，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第 十 一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和发展（上）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1921—1937）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展开的新阶段，并且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新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在批判继承中国哲学优秀传统基础上创立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而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反对党内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产生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一步得到系统化。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社会实践观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组成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集中地体现于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军事等科学著作中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如下几个特点：以更完整的形式重点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传播是在批判形形 色色地主 资产阶级 反动世界观的斗争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的社会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深入传播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共产党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直接论证和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都作出了贡献。

党的一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确定由中央或地方

出版杂志、日报、百科全书、小册子和临时传单，并且强调“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或地方，皆应由我党同志直接管理和编辑”。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除继续编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刊物外，还由第一任中央宣传部主任李达主编我党第一个秘密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1921年9月，他主持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大量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在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一年内就出版了包括《马克思全书》（三种）、《列宁全书》（六种）在内的十八种书籍。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又决定出版由蔡和森主编的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三大以后，党中央于1923年6月又出版了由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编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此外，党中央还创办了上海书店，出版了《前锋》杂志、《中国青年》周刊等。并且办了自己的学校，如上海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共产党人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肖楚女等都在上海大学任课。中共北京地委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筹办了北京党校（1925年秋）。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秋），聘请李达讲授马克思学说，并主编该校校刊《新时代》月刊。在1923年4月出版的创刊号上，全文刊登了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了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革命形势推动下，全国各地的进步的报刊、书局也出版刊登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个时期，传播唯物史观比建党以前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其代表作有：1921年出版的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1924年出版的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1925年出版的肖楚女的《社会科学概论》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等。李大钊在1922年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更加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26年6月出版的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不仅全面介

绍了唯物史观，而且还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同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分真正的敌我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在一起，被直接用来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意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考察之中，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李大钊、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十分注意在实践中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会夜校等。他们还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如李大钊亲自领导了1922年10月爆发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也在湖南、江西等地组织和领导了罢工斗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是在斗争中进行的

唯物史观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挑起的斗争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民生哲学”和同国家主义的论战中，充分显示了巨大威力。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梁漱溟于1922年1月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宣扬以“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为“根底”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对抗唯物史观。他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宣扬历史倒退论。他说西洋文化着眼于研究外界物质，用的是理智；中国文化着眼于研究内界生命，用的是直觉；印度文化着眼于研究无生本体，用的是宗教现量；人类历史是从科学理智走向“玄学”直觉、再走到宗教现量。①他还主张个别天才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②。

1923年至1924年，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分别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反动文化哲学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并不否认精神生活，而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梁漱溟要把东方文化当作国粹保存起来，实际上是“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琨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③瞿秋白批判了梁漱溟离开物质生产关系抽象地考察文化，并用东西文化的区别来否认社会历史发展有共同规律的谬论。他说：离开经济的发展来研究文化，必定头足倒置，弄得头晕眼暗。诚然，“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④文化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东方文化现在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东方民族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残物。”⑤只有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的文化的发展，才能

①，②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1月，商务出版社版。

③陈独秀：《寸铁·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④⑤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产生无产阶级的以至全人类的文化。这就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本质，而且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观点。邓中夏深刻揭露了梁漱溟思想的来源，说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玩艺，只不过是印度佛教、中国孔孟儒学和法国柏格森生活哲学观点的大杂烩而已。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文化和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半封建文化之争，是一场唯心主义内部的狗咬狗之争，但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方面是一致的。这场斗争，是当时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张君劢的人生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说什么在你看来是物质的东西。在我看来不是物质的东西。在他看来物质实际上是精神。他主张，人们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各各不同，原无是非标准，没有因果规律可循，科学也无法解决。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宣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少数政治家自由意志的产物，"出人意料之外。"①在他看来，忽而君主，忽而民主，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是逻辑学三大定律所不能证明的。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虽然打着维护科学的旗号，反对张君劢否认科学的人生观，但他却说，"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②这些观点同马赫主义所说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如出一辙。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知识也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主张用多元历史观代替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此外，国民党老右派吴稚晖宣传"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胡适提出"自然主义

①张君劢：《科学之评价》、《科与人学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②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

人生观”，企图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用“同类的同情心”、“互助的重要”等说教来掩盖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面对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挑战，陈独秀用唯物史观驳斥了张君劢、丁文江之流的唯心主义，指出他们论战双方是一丘之貉。是唯心主义阵营的不同流派之争。他说，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科学家说明得对不对，它都照样存在。陈独秀深刻批判了张君劢的人生观，提出："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① 在驳斥张君劢"思想者事实之母"的唯心主义观点时，陈独秀指出，这思想不是事实的母亲而是事实的儿孙。因为先有了物质世界，才能产生能思想的人；有了思想的对象，然后才能有思想。对于丁文江等"科学派"的谬论，陈独秀也作了批判，指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在驳斥胡适的唯心史观时，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但这决不是说唯物史观"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它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② 瞿秋白也提出，人类社会历史里虽有一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进程之共同因果律"。"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③ 在他看来，不受规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是错误的。他还指明了唯物史观原理不同层次间的联系，"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因此，

①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陈序。

②陈独秀：《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

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知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知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可是新科学知识得之于经济基础里的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里的社会经验·所以个性的先觉仅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①这就澄清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所造成的混乱。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共产党组织和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秀才”戴季陶，于1925年秋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宣扬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造舆论。他的“民生哲学”，一是鼓吹“求生的冲动”引导着人发出一种“生存的欲望”，“生存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此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原理。二是鼓吹“仁爱是人类的共性”，必须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以此来否定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原理。三是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诬蔑群众是“阿斗”。“昏百姓”，而中华民国的唯一救主了就是他们那些“有完美知识”的国民党右派。②

戴季陶主义一出现，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毛泽东在他所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刊物《政治周报》中就指出，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③瞿

①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②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1945年1版。

③《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秋白也深刻地指出，阶级斗争是必然存在的。“戴季陶虽然在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一点也不‘仁慈’。①戴季陶把唯心论的道统说作为他所谓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完全是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来替农工民众革命”，“是要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施和指使”。②

这个时期，还有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人兜售国家主义，鼓吹二元论唯心史观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曾琦等人认为，社会由两大要素即物质要素和心理要素构成的，“这两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上是同时并在，斤量相称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关系而生出互助，利他种种行为以为社会的枢纽。”人的先天的“感情”或“求生的冲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们还鼓吹“全民国家”和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肖楚女针对国家主义派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鼓吹的“全民政治”、“全民国家”的谬论，指出国家是从人类经济中产生出来的，是一胜利阶级用以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的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③肖楚女还批判了他们不看事实，纯凭

---

①、②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和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11日。

③肖楚女：《显微境下之醒狮派》，（1925年10月10），.

自己的幻觉瞎说一气，诬蔑阶级斗争是共产党“鼓吹”起来的谬论。他指出，如果共产党人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这帮唯心主义先生们太“从心所欲”了，可怜他们是被一往的生产关系所支配的定律推着走，而“我们是本于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自然的客观规律，促进阶级斗争。”①

恽代英针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唯心史观，写了《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阐明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他说，唯物史观不承认历史上的一切变迁演化是出于什么神意或个别英雄的创造，而是对客观事实进行综合研究并发现一定物质上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马克思用这种历史研究法从以往的历史中发现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乃是由于人类生活上物质的经济条件之无机而有序的偶然变化之推移。由此证实了近代资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完全以垄断生产机关（即私有财产制），行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即自由竞争），以掠夺他人底劳动所得（即剩余价值）为基础”。他还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经济进化中必然应当的命定事实。”这是不依人们的愿望提倡与否而转移的。以往的社会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目前的客观现实，也正是不由人类分说地从阶级斗争中展开着未来的局势。”要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如何以农工阶级之利益为主要利益的国民革命，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况且从事实上，经验上，又有哪个能够承认不要阶级斗争而可以使得农工阶级起来作自动的革命？”②毛泽东在1926年3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针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指出它

①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1925年10月。）

②恽代英：《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中国青年》第95期，1923年5月14日。

们是中国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①肖楚女、恽代英、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在思想上批驳了否认阶级斗争的历史唯心主义，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且为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考察中国革命的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把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把唯物史观和列宁的民族革命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分析，并获得具体的正确的认识，这是不容易的，是经过曲折的过程，在反复的实践斗争中实现的。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制定了中国革命的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初步分析，指出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工人阶级“将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帝国的革命领袖军”，提出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大会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的思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了起来。

但是由于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革命而不是帮助“民主派”领导革命的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这之后，在关于民主革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页。

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问题上，逐渐出现了党内的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从两个极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实质上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错误地提出，当时中国革命应该是中国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说什么革命成功以后，“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张国焘则只要工人运动，不要农民运动，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毛泽东、瞿秋白反对他们的错误观点。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①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更明确地提出了“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进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领导权。”同时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却。”②很显然，这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前者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后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针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明确解决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6年初，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先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发表文章，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作了初步探索，批评了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观点。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当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而作出科学结论的一篇代表作。

---

①瞿秋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年5月。

②瞿秋白：《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1923年9月。

在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先后在湖南、江西胜利地组织和领导了包括安源大罢工在内的十几次罢工斗争。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到韶山研究农村情况，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后他又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负责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正是在投身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在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的斗争中，在吸收党内正确思想以及共产国际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写出这篇重要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人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人们的政治思想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并由此分清了真正的敌友。他深刻地指出，分清革命的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在分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时，指出它们是国际资产阶级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②他们是极端反革命派，是革命对象。在分析无产阶级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其所以如此，一是集中，二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③这就批驳了陈独秀所谓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很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8页。

少，在质量上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领导民主革命的谬论。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时把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认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城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当它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当着革命猛烈发展时，它又害怕和怀疑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联合它，引导它参加民主革命，又要同它的妥协性作斗争。他特别指出，在世界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其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以其本阶级“独立”革命的思想，是“完全行不通的”。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国家的企图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右倾论调的有力批判。

在对贫农、中农作具体分析时，毛泽东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①还指出，雇农、贫农、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有变革现状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最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在具体地分析了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作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②毛泽东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9页。

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科学分析，不仅表明他已初步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也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这篇文章和次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1925年12月，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就作了系统考察，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力量，“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①然而后来党内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从不同极端地抛弃了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站在农民运动的第一线指导革命的毛泽东、彭湃等同志坚持党内正确意见，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乃至全国各地农会运动很快发展了起来。农民运动的高涨，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因而遭到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的恶毒攻击，它被诬蔑为“痞子运动”。陈独秀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也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糟得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给农民运动泼冷水。为反击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用32天的时间到湖南湘潭等五县农村实地考察，写成了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文献，于7月正式发表。这个文献有力地回击了阶级敌人的攻击，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言论。

毛泽东以农民运动的生动事实，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孙中山致力革命几十年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发动几亿农民起来革命。他指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

---

①《李大钊选集》第535页。

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动几亿农民，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几亿农民起来革命，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是“好得很”，而完全不是“糟得很”。“糟得很”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反革命理论。①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阐明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说，农村革命是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而地主的政权，则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既倒，则封建的族权、神权、夫权则跟着动摇起来。如果不从政治上打翻地主阶级，则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和其他生产手段的斗争，决无胜利的可能。因此，党在领导农民斗争中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推翻地主政权，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而为了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②，使农民武装梭标队普及于湖南各县的农民之中。

在《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农民阶级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他强调指出，富农对于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没有贫农决不能完成民主革命，贫农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农民革命当中尽管会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农会领袖中也会出现“少数不良分子”，但这只能教育，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③《报告》中还列举了农村大革命中出现的十四件大事，热

①②③参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16，21页。

情地歌颂了农民的伟大创举。在毛泽东看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如何，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是站在群众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群众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对他们中少数人的不良习惯和缺点，应当加强思想工作，热情地教育和帮助他们纠正。

总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科学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问题。整篇《报告》洋溢着唯物史观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它是一部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深入传播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哲学思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尖锐斗争的时期，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更广泛深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工农武装反抗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起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哲学上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造，使毛泽东哲学思想逐渐系统化，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辩证唯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泛、深入的传播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重点在于唯物史观。在当时，这是很必要的。然而，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缺乏研究，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宣传就难免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的缺点，常常过分地强调了经济方面的作用，忽略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如1921年6月出版的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存在着这样的缺陷。1928年11月出修订版时，该书才增加了一段话作了纠正，强调了"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①。又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于唯物史观与达尔文主义、实验主义的根本区别也弄不清楚。瞿秋白在1926年写了《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一文，指出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没有充分注意唯物辩证法的宣传这一严重弱点，他说，为了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即辩证唯物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革命者需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这引起了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视。同时，由于苏联二十年代对布哈林的机械论和均衡论的批判、三十年代对德波林哲学思想的批判而兴起的研究唯物辩证法新高潮对中国的影响；还由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发起的向唯物辩证法的进攻必须给以有力的还击，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249页。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了一个侧重研究、宣传唯物辩证法的新时期。用艾思奇的说法就是："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一九二七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又才显露头角。"①

在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恶劣环境里，革命者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地宣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运动。在1928年至1930年短短三年中，翻译和出版了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占的数量最多。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包括附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近四十种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此外，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唯物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专集等。1930年以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逐渐恢复，特别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时期，还陆续出版了不少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如西洛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等苏联哲学著作，都被译成中文本出版了。这些著作对中国哲学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写了一些论著，突出的有瞿秋白的《唯物的宇宙观概说》（1927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4—1935年）和《哲学与生活》（1937年），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1929年）和《社会学大纲》（1935年）。胡绳、邓拓、吴黎平也有不少论著。所有这些著作，都使人们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有了较为完整的

---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4—65页。

认识，毛泽东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称赞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是一部“更为深刻的书”。三十年代中期，艾思奇等人还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上海哲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些大学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课程。中国思想界展开的以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声势，连张东荪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可以说是个事实。”①毛泽东对于这一运动的意义和趋势，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1927年革命失败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还处在青年阶段上，然而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勇往前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他还指出，要使唯物辩证法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斗争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能不遇到公开的敌人和隐蔽的敌人即所谓“拥护者”的攻击。这样，就出现了所谓“唯物

①：张东荪《唯物辨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辨证法论战》，第135页，民友书局，1934年10月版。

辩证法的论战"。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传播中，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斗争的一次重要战役。配合国民党政府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张东荪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以《大公报》和《再生》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兜售新康德主义。1934年，张东荪写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以及他编辑的《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一书，就是他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托派叶青冒充马克思主义者，打着批判张东荪哲学的旗号，在《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还抛出《哲学向何处去？》一书（1934年），并编辑《哲学论战》集、《新哲学论战》集（1936年），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艾思奇、邓云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肃清张东荪、叶青等人的反动哲学思想的影响，坚持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它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理论武器，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

张东荪、叶青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抹煞新旧哲学的本质区别。张东荪胡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错误到不可救药，其原因一半在黑格尔本身。黑格尔本身就有错误之处，马克思不过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他还说什么黑格尔与马克思总是把对待与负面混而为一，使其最后都转移于矛盾，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①针对这些谬论，艾思奇指出：新唯物论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它从黑格尔取得了很重要的遗产，加以批判、改作，才成功为一种划时代的新哲学。他举例说："一个胚胎，虽然包含着新生命发展的一切主要的可能性，但它本身并不就是新生命，它仍然是旧卵里的一个构成部分，

①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43、143、155、168页。

这是没有人能反对的。黑格尔的哲学里包含着唯物论的种子，却并不就包含着唯物论。由黑格尔到新唯物论，是不但要破壳，连内容也得经过一番成熟的改造才行。单单弃了壳，没有内容的改造，那卵还是卵，决不会有新生命。”①

对于张东荪、叶青等人把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看成是机械地等同地交互作用，把运动与静止折中结合起来，把运动归结为静止，以及用矛盾的同一性代替斗争性，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等谬论，艾思奇也给以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张东荪、叶青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辩证法坚持以内因为基础的内外因统一论，在内外因的交互作用里，强调内因的第一义的决定作用。“辩证法是把内因看做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辩证法对于外因虽然并不忽视，但认为内因是基础，是本质，是发展的必然性的决定的原因。” 关于运动与静止，他指出：“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静止的东西，本质上仍是运动的。”②他还说，任何事物内部都统一着各种矛盾，它的内部就不断地有冲击。因此，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矛盾才是永久存在的、绝对的东西。因为有矛盾，才使事物内部自己发生冲突，使它本身不能固定，一切事物变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矛盾就是事物运动的原动力。”③

为坚持唯物史观，艾思奇集中批判了叶青在《历史哲学概论》中鼓吹的技术决定论。艾思奇指出：“生产力有三种要素，即劳动力、生产技术和劳动对象”。④叶青“把生产技术一部分当做了生产力的全部，是错误了。技术是被动的，它必须要和人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生出生产的力量。“单单的技术也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111页。

②③④《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25、307、209页。

决不会有生产力。”①

艾思奇以浅显的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在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的《读书生活》杂志第一、二卷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全面系统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936年《哲学讲话》出单行本，同年6月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到1938年2月，该书已出了十版。这本著作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的反动哲学思想，而且强烈地影响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促进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这部著作，对于哲学的解放，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及其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为毛泽东哲学想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毛泽东于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不仅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而且也是彻底批驳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产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中形成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反对王明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斗争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对武装斗争

①艾思奇：《各科问题八则》，《读书生活》，第2卷，第4期，1935年6月25日。

和农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发展了革命形势，创造了数十万人的工农红军和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在实践中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找到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1931年红军攻下漳州时，他在县城找到了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爱不失手，反复阅读，圈圈点点，旁加批注。中央苏区的报刊也常译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27年夏，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陈独秀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终于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党中央政治局改组，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就统一战线、农民运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等几个根本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整个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从"八七"会议前后到1928年底，党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百余次武装起义。斗争实践使党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过什么道路才能夺取政权呢？有"左"倾思想的人留恋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不承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屡遭强敌围攻，革命军遭到某些失败之际，红军和根据地内少数有右倾思想的人如林彪，认为革命形势"未

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科学地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农村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革命首先在农村胜利的可能性。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条件有：第一，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形成了政治上封建割据和冲突，造成了由不同的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连年军阀混战，从而削弱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在四面白色包围中能够发生和坚持下来。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地区是受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比较高，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群众基础良好的地区。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不仅小块红色政权存在是无疑的，而且要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革命武装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这些论述，既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群众诸方面，又充分地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是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题的典范。

毛泽东在纠正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错误倾向时，一贯注意从世界观的高度寻找错误的根源，他指出，“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在于从主观主义出发看问题。有“左”倾错误的人，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大了，而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小了，产生盲动主义；而有

右倾错误的人，则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而把反革命的力量看大了，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一定要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毛泽东进而指出，一些人之所以犯右倾悲观或"左"倾冒险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义主国家互相争夺的殖民地这件事弄清楚。

毛泽东从上述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地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全国政权道路的道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根据地为战略阵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一般原理，准确地把握着中国的特殊国情，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革命论的独特贡献。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形成的。

井冈山道路伟大实践的哲学概括

——《反对本本主义》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页。

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中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它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30年5月，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关于调查工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反对本本主义》是对井冈山道路伟大革命实践所作的哲学概括，它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是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全靠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要在实际的群众中才能完成。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了解情况、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

毛泽东作出这样具有远见灼知的重要论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入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发现。在建党以前，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等，为了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建党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毛泽东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光辉篇章。他在1931年4月所写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了“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理论上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作了深刻的阐明。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

般原理，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以为上了书的都是对的，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研究，而一味盲目执行。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了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不切实际地主张中心城市起义，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等等。这些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乱发议论，瞎指挥。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就是针对这些错误提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①“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②因此，是否坚持调查研究，在政治上是关系犯不犯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错误的问题，在哲学上是搞唯心主义，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问题。

进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③

哲学路线这一概念，是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在反对马赫主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

②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第8页。

义的斗争中明确提出来的。这里的哲学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同党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创造。他提出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

毛泽东强调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决不是不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的学习和宣传，而只是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②毛泽东提倡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深入群众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决不是狭隘经验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深刻思想，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所理解和接受，反而把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讥之为“狭隘经验论”，以至出现了为时四年、为害更烈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所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掌握，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之后才逐步实现的。

①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

第三节　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逐步形成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粉碎了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占据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生搬硬套苏联的军事经验，完全否定毛泽东所制定的中国红军的正确作战原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否定了王明的“左”倾路线，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和原则的指引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为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总结党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的经验教训，于1935年12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两次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党内在军事问题上发生的两条路线论争的实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杰出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许多精湛思想，就是在这里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的形式被初步提出的。因此，它可以被看成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重要哲学著作的先导，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用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考察战争问题的起源、性质及其消灭的途径

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战争这一社会现象，对战争的起源、本质、类型，革命战争的作用以及消灭战争的途径等基本问题都作了正确的回答。他指出，战争这种东西，是阶级间、民族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一般政治经济手段不能解决，而最后需要诉诸于武力，用暴力手段才能解决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敌对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就是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 。而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 ，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毛泽东在对战争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时，还把历史上的战争区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大类。他强调指出 ，一切革命的 、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一切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前者顺乎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的前进；后者则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前进。这样，“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①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8页。

既然战争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它也必然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到了人类社会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的时候，一切战争，包括正义的与非正义的、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战争将会没有了，这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要消灭战争，就必须进行革命的正义战争，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我们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就是从消灭一切战争的目的出发的。

用客观的发展的观点研究了战争指导规律，要指导战争首先要认识战争

如何研究战争，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臆想出发；是从战争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研究战争，还是仅从战争中的表面现象孤立地研究战争？这里存在着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分歧。毛泽东在研究战争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彻底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观点。

首先，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战争及其规律是客观的，因此，我们研究战争规律，就要正确解决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

体。”①研究战争的客观实际，就是要研究敌我两个方面。我们要做到比较地会办事，比较地多打胜仗，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②“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③主观客观相符合相一致，才能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得取胜利，反之，如果主观脱离客观，就叫犯错误，就会把事情办坏，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在强调认识战争及其规律要从实际出发，要符合客观实际时，又充分估计到战争主观指导的作用，说明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④这样就既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次，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各种不同的战争之间，有共同的一般规律；然而每一战争又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因此，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⑤“着眼其特点”，就是要全力捉住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着眼其发展”，就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他要求研究战争及一切事物的特殊规律时，不仅要从矛盾的比较中来认识，还要从其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区别中去把握。“着眼其特点和着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5—166、163、162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157页。

眼其发展”这一科学方法，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思想的重要发挥。它要求人们要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通过事物的诸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要暴露事物的特殊规律，就必须具体地全面地分析事物的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正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作了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揭示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半殖民地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是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特点。由于第一点和第四点，就造成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规定中国工农红军可能发展，中国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又由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规定了红军的作战不同于一般的战争，也不同于苏联的内战和我们的北伐战争，也规定了战争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胜利。而必须是持久作战。“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①毛泽东所阐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有重大意义。它使人们从方法论上认识到研究特殊规律的重要性。

第三，要紧紧抓住一般与特殊的相互联结和变化发展，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写道，要打胜仗，不仅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尤其要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般战争的规律反映着战争的共同本质，表明了千差万别的具体战争的共同点，指明战争发展的基本趋势，给人们从事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5页。

战争的实践活动以指导作用和预见性。但是，对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革命战争，中国的革命战争，都有不同于一般战争和其他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对一般的战争规律、苏联的战争规律如果我们照抄照搬，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的流血经验。”①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有许多特殊情况。因此，对于苏联战争、北伐战争的经验，我们只应该采用“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②否则，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

第四，从全局和局部的关联上研究战争，揭示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③因此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有全局性的和局部性的，即有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之分。他指出，指挥员要有明确的战略指导和必须懂得战略学和战役学、战术学的关系，“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④所谓战略指导，就是根据战争全局性的客观规律而提出的战争指导路线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强调从全局和局部的关联上研究战争的观点，揭示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

在全局和局部关系上，全局统帅和支配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因此，指挥员要有战略眼光，要全局在胸，“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的战争的全局上面。”⑤左倾教条主义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6，157，159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合定本，第159、160页。

者鼓吹的“战略的胜利取决于战役的胜利”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没有看到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或不好，如果全局和阶段的关照有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那末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①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应着重于全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它要用心思想一想才能懂得。“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②脱离了一切局部就没有全局。而且某些局部就带有全局的意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指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有决定意义的一二个战役失败或胜利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而这里所说的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去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而且全局和局部的区分是相对的，认识上不能绝对化、凝固化。

第五，毛泽东强调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阐明了对战争的认识离不开战争的实践，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挥。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实践是对战争认识的基础，是人们在战争规律问题上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桥梁。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③这个生动精辟的论述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165页，

表明，认识离不开实践，对战争知识的学习离不开战争的实践，干和学，即实践和认识是辩证的统一。

毛泽东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认识战争规律，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这就是由认识情况制定计划，再到实行和检验计划的过程。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①首先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必要的侦察手段，获得敌方的情况，然后对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再把自己方面的情况加进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关系，从 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②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他们或者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不符合实际的空想；或者在实行的过程中不检验和修改原来的计划，不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不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一味蛮干，结果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强调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决不是意味着不重视对于军事理论的学习，决不是不重视总结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他认为必须从自己的经验中考验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否则就不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

---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164页。

第四节　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哲学概括
——《实践论》、《矛盾论》

为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延安刻苦攻读哲学，深入开展哲学研究和宣传活动。他不仅亲自组织和领导延安哲学研究小组，而且撰写《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在抗日军政大学系统地讲授。后来公开发表的哲学专著《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提纲中的两部分。这两篇论著，从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刻透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阐明了以对立统一学说为实质和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两部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清算了党内"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为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各种的矛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以社会实践观为基础，系统地论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列宁为着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着重从认识论基本问题上，划分出两条基本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思想和感觉到物——这是唯心主义

的认识路线。与此不同，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者不是直接主张唯心主义，而是由形而上学，机械论陷入唯心主义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认识的能动作用。因此，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时，就必然强调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极端重要性，着重从实践观点来阐述能动的反映论，说明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所以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叫做一般的反映论，而是叫做实践论。并且在《实践论》开头就指出，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观察问题，因而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这就击中了旧唯物主义（包括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轻视实践的要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对它作了科学的说明，指出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他们把这种实践观纳入了认识论，在实践观的基础上把认识论和历史观统一起来，从而引起了整个哲学的革命变革。毛泽东坚持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了重要的发展。他反复强调，实践是“社会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还把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科学地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并且指出，生产斗争是决定其他两者的最根本的实践。毛泽东进一步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辩证性和历史性，既指出了各种社会实践形式之间的区别，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论证了社会实践是一个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列宁也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紧紧抓住实践这根红线，发挥和发展了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把实践性规定为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来为实践服务，并用实践观点系统地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科学地解决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讲清了马克思、列宁提出但还没有系统论述的问题，从而以新的内容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曾说过："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毛泽东发挥了列宁这一思想，进一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把认识过程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而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过程。并把认识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即是人们在实践中对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即是在感性材料基础上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二者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②"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③他还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要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有丰富的真实的感性材料，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经过头脑的思索分析，对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毛泽东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298页。

的这些论述，是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深入开拓。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的这种历史性和辩证性，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此不能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科学的知识。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对唯理论和经验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还阐明了理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解决了理论和实践怎样结合、如何统一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他之所以强调理性认识必须回到实践，是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和发展理论，而且，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这对于一个认识过程来说是完成了。但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并没有完成。客观过程和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向前推移和发展的。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将已获得的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并以新的经验去修正、补充原来的理性认识，才能使原来的认识日臻完善，使自己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实践不断推移和发展。否则，思想就会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变化，产生右的错误，或者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产生的"左"的错误。这些论述，既结合实际阐明了列宁提出的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又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了几千年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既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9页。

义和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识论根源的深刻揭露。

毛泽东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变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对于脱离实际的空谈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把科学理论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些论断，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现意义。

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都作了论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针对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懂得实践和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割裂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错误，对这一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这是对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这一原理的重要发挥。毛泽东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统一，这就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

---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273页。

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这一论述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指明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这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发展史上伟大成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贡献。

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系统地
论证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

列宁曾把对立统一学说规定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紧紧抓住列宁的这一思想，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系统地、多方面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矛盾论》阐发对立统一规律，是从剖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入手的，它指出这两种宇宙观是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不同见解。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否认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它的基本特征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形而上学者看不见事物内部双方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看不见由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事物的运动发展，把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3页。

所表现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性质的变化。它把变化的原因归之于外力的推动，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与此相反，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和他事物的联系中研究事物的发展，这样就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都和周围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作用着。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是新陈代谢。这样，辩证法必然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世界。毛泽东清楚地揭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矛盾和坚持矛盾的观点，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指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

《矛盾论》在全面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时，着重论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普遍性、共性、绝对性。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法认识事物发展的普遍原因和普遍根据。他还指出，每一事物中又包含着特殊的矛盾，构成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因为矛盾各各特殊，所以矛盾有着个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它是相对的。人们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的特殊原因，就无从辩别事物，也就不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毛泽东强调，不仅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7页。

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针对教条主义者只是夸夸其谈，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具体事物的坏风气，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运用大量的事例，从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不同过程、不同阶段以及过程和阶段中矛盾的诸方面，对矛盾特殊性作了层层深入的分析。他强调只有了解矛盾的各方面，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才能从总体上、从互相联结上概括出事物的特殊本质 。他 强 调要牢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 思主义的 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教导，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情况，反对并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强调要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国革命错综复杂情况和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对立统一学说的杰出贡献。

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许多哲学家因为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都专门论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吸取前人的成果，总结新的革命经验，把这个问题充分展开了。他特别强调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联结上把握事物，特别强调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之下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抓住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对唯物辩证法作了新的说明和发挥。他深刻地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①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普遍性和特殊性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页

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他特别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这是因为，第一，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二者是相互联结的，脱离特殊性的普遍性和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都是不存在的。这种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贯串于一切矛盾问题之中。第二，它是人类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依据。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既然客观事物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观察问题也必须坚持两者的统一，既要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指导之下研究特殊性。人类的认识运动的秩序是从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又以对一般事物的共同认识作指导，进一步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如此循环往复，使认识不断深化。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运动的这种特殊与一般的相互联结，不懂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也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第三，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它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各国的特点和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发挥它的重大指导作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发展。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两个极端割裂这两者的关系，不可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体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发挥和突出贡献，对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在分析复杂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于矛盾及矛盾诸方面不平衡性的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295页。

明。关于抓主要矛盾和确定主要矛盾方面问题，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说过要抓主要环节。毛泽东对于列宁这个必须抓住主要环节的思想，作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一个重要方法作了深刻的发挥。他指出，由于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形成了诸矛盾和诸矛盾方面皆有主有从，表现了矛盾的差别性，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就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的正确方法，主要矛盾就是许多矛盾中居支配地位的、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次要矛盾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如果抓不住主要矛盾，就找不到中心，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他还指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次要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非主要的矛盾。

毛泽东进而指出：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地位也是不平衡的，有主有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矛盾双方中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同时指出，矛盾的主次方面不是凝固不变的，双方的地位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斗争力量增减程度不同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因此，毛泽东告诫人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要把诸矛盾和矛盾诸方面平均对待，要着力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对均衡论。

毛泽东在研究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诸种关系之后，进而深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页。

入地研究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即事物内部的两种基本属性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是怎么同一的思想，明确地把同一性概括为两种情况：即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矛盾的双方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贯串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不论矛盾双方共居，事物发展处于量变阶段，还是互相转化，事物发展处于质变阶段，斗争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①斗争性和同一性也是相互联结的，既没有离开同一性的斗争性，也没有离开斗争性的同一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这就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此外，毛泽东还揭示了矛盾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即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与转化问题，等等。

毛泽东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矛盾，是自我发展的光辉思想，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新贡献。

总之，《矛盾论》以一个科学的理论形态，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说明和发挥，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都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8、307页。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下）

—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展开

（1937—1949）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最重要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进行深刻斗争的时期。在这十几年间，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思想，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从中概括出了新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斗争中广泛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和空前觉醒。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为驱逐日寇，建立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 国家 进行了英 勇的斗争。政治、军事等斗争的发展，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的新热潮。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里，无论在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党所领导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都在积极进行。这种学习和宣传，是以指导斗争实践的目的的，是在斗争中进行的。

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他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并应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党中央建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学习，并在延安相继建立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开展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习运动。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学习的需要，在延安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工作，为公开出版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及一般社会科学读物和报刊杂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1937 年4月24 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创刊，1938 年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马克思与中国》；同年又发表了艾思奇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信》，解放社在1938至1942年，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马恩重要著作；1942年还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校订本。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马恩列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本在我国发行。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对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 新华书店和冀鲁豫书店发行

《整风文献》，编辑出版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年到抗战结束，解放社出版博古重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和苏联书籍。为了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由晋察冀日报社于1944年5月印行出版了包括29篇论著的《毛泽东选集》。这对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热潮中，延安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读书组、研究会。毛泽东曾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会，经常约请何思敬、艾思奇等人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央青年运动委员会工作人员还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学习《反杜林论》，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等地公开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设八路军通讯处，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传播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抗战初期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印刷厂，不仅印刷出版报纸和《群众周刊》杂志，而且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和六卷本的《列宁选集》。我党在武汉筹办的中国出版社（实际是新知书店），1938年以后翻印了延安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共产党宣言及其党章》等。生活书店编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抗日救亡读物。如邹韬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读书偶译》，张仲实译的《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雇佣劳动和资本》等等。

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关心国家命运、立志改造世界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放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反掀起了自觉学习的高潮。他们英勇机智地坚持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和抗日救国著作。1938年，郭沫若在上海用言行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

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和第一章的内容）。1940年，还重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亚东图书馆1938年出版了《论犹太人问题》等。读书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三卷本的《资本论》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蒋介石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斗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既惧怕抗战言论的发表，又仇恨马列主义的传播。一方面，他们极力压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颁布反动法令，取缔进步书刊，指使国民党特务分子任意宣布某书为禁卖书籍，抢劫、捣毁以至封闭进步书店，非法逮捕进步文化人士。另方面，蒋介石、陈立夫亲自出马，并纠集雇佣一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炮制和兜售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想。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以后，他们用极大的力量宣传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对抗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不能不遭到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思想家的坚决抵制和批判。

蒋介石、陈立夫鼓吹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类为生存而活着的历史，唯有物质与精神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他们宣扬"唯生论"，认为万物都有生命，宇宙的本体不是物质而是"生元"。这种"生元"是无形无体的精神性的东西，并公开承认这就是西洋人所谓的"上帝"。他们还把这个精神性的东西解释为"诚"，提出"诚"的哲学，说什么"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为宇宙之根本原动力"。

针对这种反动哲学，艾思奇批判说，唯生论从中国的封建哲学中借来了一种精神的原理"诚"，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本质上

完全是唯心论的，“世界的最后的创造者既是精神的原理，所以是精神决定物质，是精神产生物质了。”① 蒋介石、陈立夫打着“诚”的招牌，实际上鼓吹崇拜迷信，贬低科学。“唯心论和宗教是相通的。‘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蒋介石也有一块‘诚则灵’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样，不过是勒索贡品的幌子罢了。”②

胡绳批判了蒋介石把“诚”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谬论，指出这种解释，“其意义也只不过是把物质世界化为有目的的精神，而完成其唯心论体系。”③ 他们把精神性的诚当成宇宙的本原，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在于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革命的必然性。

蒋介石、陈立夫还从“诚”导出智仁勇，把“诚”当作知识的本原，而“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不必外求”。他们还鼓吹反动的“力行哲学”。蒋介石说什么古今来宇宙之间，“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他所谓的“行”，也就是“实行良知”，是与生俱来的神秘的东西；“行”是“诚”的表现，“诚是行的原动力”，“充其行之极致，就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胡绳指出，“尽性致诚”论的作用，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实践，是欺骗与麻醉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艾思奇说，蒋介石所说的“真知”，实际上等于“无知”。它的反动实质在于要求人民群众“只是糊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的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国境内蒋介石辈一切反动唯心论宣传，其真正目的全在于此。”④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67页。

②④《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83、687—688页。

③胡绳：《论“诚”》《理性与自由》华夏书店1946年版，第139页。

蒋介石之流从诚出发，还鼓吹抽象的人性论，蒋介石说所谓“仁”就是“博爱”，实行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陈立夫叫嚷“人性本有好善恶恶之趋向”，“若人在内部行阶级斗争，则爱之根苗先断”，爱就不能“成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原动力”。还说什么阶级斗争的产生，是由人之不能行共生共存之道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上的堕落。艾思奇等人都指出了这种谬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反对人民革命的实质。①

蒋介石所宣扬的“唯生哲学”和“力行哲学”，是一种反动的主观唯心论，是国民党反动派封建买办性法西斯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其目的在于妄图蒙骗和愚弄群众，绞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捍卫和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促使革命运动得到顺利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和新心学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批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冯友兰的新理学与贺麟的新心学进行了有力的深刻的批判。

新理学是冯友兰创立的、反映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是地主资产阶级对蒋介石政权抱有很大幻想的理论表现。冯友兰认为，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来源于“人之理”，“人之理”又是“天之理”。“天理”就是在时空之外存在的“理世界”，即所谓“‘在上’之理”，“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底世界”。②他正是从超越时空的“理世界”演绎出一切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78—698页。

①冯友兰，《新理学》，第115页，1939年5月版。

实际事物的。

新理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极力宣扬抽象道德论、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历史倒退论，说什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忠恕等道德，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人都是需要和适用的不变的道德。新理学还宣称："天才往往是遗传底。""因血缘关系，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于一民族"；一个民族内天才比较多，此民族即是"优秀民族"，否则"是劣等民族"。冯友兰还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说：如一个社会尚未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则在这个社会里谈共产主义，却真正是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他还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① 他的这种谬论同胡适在五四动运时期叫嚷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如出一辙。

"新理学"出笼后，当即遭到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的批判。针对"新理学"认为理在物之外之前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陈家康指出，"我们认为物不依照任何物外之理以成其为物。若谓物外之理，则天下并无此理。"把"理"归结为离开物、超时空的绝对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空间不能先于物之存在，亦不能后于物之存在，时间不能先于物之动变，亦不能后于物之动变"。"离开物之存在而言空间，离开物之动变而言时间"，都是不对的。②杜国庠揭露了"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作用。他指出："这种宇宙人生观，教人安分守己，忽以贫贱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做到圣人，便是在精神上麻痹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的阻障

①冯友兰：《新事论》，第220、167、184页，1940年5月版。

②陈家康：《物与气》，《群众》第8卷，第5期，1943年。

了社会的革新。在这一点，正与‘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的说法，一抑一扬，赴弦应拍。在统治者固然会觉其悦耳动听，但试问一般正在争民主谋翻身的老百姓，到今天，还需要这种帮闲哲学吗！？”①

胡绳在批判新理学时指出，冯友兰“把道德规律看做是不变的定在物，而认为‘生活方法’‘必须是不违反道德规律的’，这是错误的。因为许多道德观念，在前一时代，可以说是合于理性的，但在这一时代却已因其不能适合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了。我们只能根据现实社会生活来判断某种道德规律之是否合于理性。”②在批判新理学只要改变“生产方法”，不要反对旧思想旧意识和旧道德的谬论时，胡绳阐明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及其与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他说：生产技术改进的作用不能否定，但这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促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影响生产关系的变动。他着重提出：“政治上的民主化正是具有着使生产力在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意义，所以不能以为政治改革是因生产技术改革而自然而然地引起的，相反的，政治改革倒是生产技术的充分发展的必要前提。要改进技术，而对政治改革表示不关心，或认为不必要，那是不对的。”同样，思想意识的发展不是那么完全被动地、受物质生活的发展支配的，思想意识的斗争必然要配合着物质生活的改造，新的思想意识促进旧的物质生活和旧的思想意识生活的崩溃。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出现了，旧的思想意识依然顽固地残存着，阻碍着新的物质生活和新的精神生活的发展。如果放弃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实际上就无异于维护旧思想道德存在的”③。

①《杜国庠文集》，第434—435页。

②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55—146页，华夏书店，1946年版。

③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86页。

与冯友兰的"新理学"所宣扬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贺麟则创立了"新心学"，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哲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是"心"。"所谓物质一定是经过思考的物质。所以不可离心而言物"，"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①"新心学"极力宣扬新黑格尔主义，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认为：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本身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很高。马克思只是应用现成的方法，没有创新发明，所以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便远逊于黑格尔了。他胡说"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诬蔑主张唯物辩证法的人是"再食两三条机械定律"的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新心学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外观法"。它所谓的"外观法"，是研究一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外表现象，如地方背景、时代背景。它认为"内观法"比"外观法"好，因为"内观"注重本质，"内观法"便是从思想本身去看思想。②很明显，这种"内观法"是唯心主义的。"新心学"反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还说，真正的道德行为乃为自由的意志和思想的考虑所决定，而非物质条件所决定。在它看来，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显然这是对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根本颠倒。它还攻击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观点，鼓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说"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这种观点的政治意思无非是，蒋介石这个暴君可以不仁，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不可以不忠。"新心学"不仅在理论上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错误的。

---

①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73—74页。

②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77页。

在对“新心学”进行批判时，胡绳揭露了它的直觉论的神秘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的感觉论，指出，理性认识要以感性经验为基础；批判了“新心学”只依主观的公式来安排历史材料，指出，不从现实的发展趋势来推究以后“将”是怎样，而只是从理论上推断其“应该”是怎样，“对于主张这种理论的人，我们只好说：你愿意白昼做梦，你就去白昼做梦吧。”胡绳还说，“新心学”宣扬“三纲”，“对名分，对理念尽忠”等等说教，“无非是向一切奴隶说，你不必苦恼，要知道你并非服从你的主人，你不过是服从那个在主奴之间的天理罢了。”①

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理学”“新心学”的批判，大大消除了它们唯心主义的影响，捍卫、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开展了对战国策派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资产阶级中间路线派的唯心史观的批判。

毛泽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许多著作，同上述地主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更自觉更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在这时的具体运用，首先是科学地分

①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3页。

析和解决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夺得了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朱德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便是这种实际运用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其次，是将辩证唯物论应用于指导党的建设，加强党员的修养方面，如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章，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的态度》等著作，就是这种运用的重要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实际运用方面，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洋溢着唯物辩证法，提出并阐发了不少新的哲学观点。

科学地考察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抗日战争的头十个月里，日本侵略军仗其优势兵力，得以长驱直入，占领华北各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那时，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议论纷纷，抗战以来就流行的亡国论又嚣张起来。国民党中亲日派汪精卫集团鼓吹唯武器论，叫嚷中国的武器不如日本，"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由幻想速胜转而陷入亡国论。少数共产党人对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而忧心忡忡。为了向全国人民指明抗日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胜利前途，鼓舞和坚定全国上下一致抗战的信心，毛泽东于1938年5月接连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从哲学的高度彻底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及其胜利的必然性，指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及中日战争的本质，强调了战争中充分发挥符合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重要性，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制定了为夺取最后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战术。

如何观察中日战争及其前途？什么唯武器论，什么亡国论，什么速胜论，什么妥协论，其哲学基础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①唯物辩证法则主张从客观现实出发分析研究问题。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各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从总体上概括出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正是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中日战争的。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毛泽东依据其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体分析了这一“全部问题的根据”，从而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人心向背等方面，具体地考察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日方的特点：它是帝国主义强国，有强大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它发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其性质是退步的、野蛮的；日本是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它在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的特点则与之相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不如敌人；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唤起国内人民的团结奋斗和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能得到广大的国际援助。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09、415页。

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①毛泽东在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各自特点（进步与退步；大与小；多助与寡助；弱与强）之后，又从总体上考察了这些特点的互相联结和发展变化，找出了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根据（我们抗战的进步性，是可能胜利的主要根据）和条件（有利的条件是大国和多助；困难的条件是弱国），并从这些根据和条件确定了抗战的长期性，找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而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它将经过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发展变化，是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结果，也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②经过这种具体地科学地分析，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③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表明，要把握抗日战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仅要客观地、全面地分析贯穿于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全部的基本的特点，而且必须从总体上、从其相互联结和变化发展上来认识这些特点，认识它们的相互联结、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否则，那就必然要弄错。“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④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符合中日双方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8、436—437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1—482、414—415页。

实际和特点的，都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抗日战争，所以必然得出错误结论。“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毛泽东的上述正确分析和科学预见，是在战争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范例，鼓舞着全国人民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去夺取抗日持久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和论断。

深刻阐明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原理

要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解决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反对唯意志论，但从来不忽视意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他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就在反对唯心主义无限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同时，反对旧唯物主义忽视意识的能动作用。列宁在新的条件下，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的论断，进一步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则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对主观能动性范畴，特别是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以及怎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

首先，毛泽东以明确清晰的语言阐明了主观能动性范畴的科学含义，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5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人们的主观思想意识反映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和能力。人类有了这种能动作用，才能跟动物区别开来。

其次，论述了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作用的原理。自觉能动作用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强烈。战争是最激烈、最残酷的生死搏斗，双方都千方百计利用已有条件争取主动，夺取胜利。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但是，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毛泽东还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③ 在一定条件下主观因素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第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发挥正确的能动性。战争双方都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夺取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发挥的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达到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从理论上明确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454—455、446页。

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第四，特别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是统一的。所谓发挥自觉能动作用，不单单是对领导者、指挥者而言的，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作用。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②

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矛盾论》，再到《论持久战》等，所阐明的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原理，是对马思克主义哲学的特殊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充分肯定。这个原理至今对于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仍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要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必须使大家明白战争的性质。怎样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呢？毛泽东引述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认为这是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列宁说过：“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该战争是由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谈论都是纯粹的空谈，都是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①毛泽东从列宁上述见解出发，进而分析了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别，认为战争的性质是由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战争分为两类，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与非正义的、阻碍进步的战争。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我们的抗日战争则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他又从战争和政治的区别出发，认为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②基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军队及其附随的东西），一套特殊方法（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一个特殊过程（敌对军队双方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

毛泽东在论述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时，重点反对了把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当时国民党当局轻视政治，不讲政治，认为战争仅仅是军队的事，害怕群众起来抗战，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说：抗日的战争动员就是“关系绝大”、“头等重要”的大事，“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③那末，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必须把抗日战争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个政治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71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7、448页。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

毛泽东之所以把抗日的政治动员看成“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同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分不开的，也是他关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思想出发，强调指出，要战胜强敌，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伟大的人民战争。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②动员了民众，我们的兵源、财源就无困难。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

揭示了人民战争中战略和战术的辩证法

毛泽东不仅确定了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且进一步具体地研究并制定了进行持久战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论述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中战略和战役、战斗中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多次分析了战争中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辩证法，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保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8、478—479页。

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① 在战争的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中有时以进攻为主，有时以防御为主，矛盾的主次方面相互转化，但通观战争全局，进攻仍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战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抗日战争，在军事上就是实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把部分地消灭敌人逐渐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毛泽东娴熟地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抗日战争中“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兵力不足，我则地大、人多、兵多。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在其无法占领的广大地区，就给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地盘和进行持久战的总后方和根据地。敌以少兵临多兵，则处于我多兵的包围之中，对于敌之外线进攻，我可利用地广兵多之长，以几倍于敌之兵力，从战场外线突然包围、攻击敌分攻之一路，打它个措手不及，迅速消灭它的全部、大部或一部。这样，我之战略上的防御、持久、内线，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为进攻、速决、外线。在战役战斗上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与在战略上采取“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这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因而又是相成的。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符合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实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76页。

际，才能促使矛盾双方的力量向有利抗战胜利的方向转化，达到最后的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之目的。

为了正确执行上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还按照战争及其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灵活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的不同作战形式，论述了战争指导上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等等。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生动运用。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获得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①这十大军事原则，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如在攻城问题上，根据敌人守备强弱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针；如抓住主要矛盾，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歼灭敌人；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求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同时又注意利用战斗间隙休息和训练部队，等等。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②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也是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够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把辩证法唯物论运用于党的建设，创造了整党整风的

①②参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1144页。

方法，用以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解决党内矛盾，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的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运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十分强调用革命的理论教育党员，并坚持同搞机会主义、搞分裂的派别进行尖锐的斗争。列宁、斯大林也十分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并同党内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苏联党曾于1921年、1933年至1936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清党"活动，主要是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三十年代初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造成了严重恶果。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内矛盾的状况和性质，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整风这种形式解决党内问题，并于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什么是整风？所谓整风，就是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就是改造思想，解决党内矛盾，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工作作风。整风的方法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在整风中"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①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5页。

如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概括起来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同他对我们党内矛盾的状况、性质及对思想性质的问题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他反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党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共产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大多数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历史证明，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是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但是这些党员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入党内，有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没有改变原来的世界观。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的矛盾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般地说是思想认识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认为，对共产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说服人，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克服错误思想。如果采取不适当的过火的斗争，或者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就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可见，整风的方法是符合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共产党内的矛盾特点，符合思想教育发展规律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主要表现，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则是小资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意识在组织上、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及文风上的表现。为何要整风？毛泽东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

为着彻底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党八股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思想得到解放，毛泽东十分注意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教育全党同志，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早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在这之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延安建立了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党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延安整风的过程是广大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的过程；是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过程；是正确处理党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2、498、500页。

内外的关系，加强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过程；是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列主义文风反对党八股的过程。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宣传和运用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宣传和运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

毛泽东创造的延安整风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引导人们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入手，具体地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更加完整地论述了党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更加完整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实事求是”，并把它作为党性的重要内容，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予以系统的和完整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看问题都是主观的、片面的、表面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把唯心主义哲学叫做主观主义，毛泽东把反对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与反对实际中主观主义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无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指导实际工作，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毛泽东还从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从党性的高度对此作了

论述，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①

毛泽东又指出，和主观主义相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具备的态度。"②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是对列宁观点的天才发挥。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③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党性，就是观察问题时，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论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毛泽东却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命题，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主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759页。
③《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

观和客观、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又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延安整风及以后，毛泽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统一，这就把他在三十年代初提出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表述得更加完整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和普及作出了新贡献。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或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党的“十二大”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而科学的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这条思想路线，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具体地阐明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延安文艺界整风，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文艺创作上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为中心，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时，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路线，既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艺问题上的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对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的极大推动。

---

①参看《邓小平文选》第121页。

毛泽东的《讲话》，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和回答了文艺界的重要问题，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根据当时存在的事实，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而我们很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并没有明确解决。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分析各种文艺之后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②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在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炼中和群众打成一片，使思想感情来一个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明确地彻底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③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原理研究文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10、820、814页。

艺创作及其社会作用，一方面肯定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另方面又充分注意文学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及文艺的社会作用，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所以，"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光辉，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和发挥。

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以抽象的人性论指导文艺创作，观察社会历史问题，这是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尖锐指出，现在有些同志，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观点，把问题弄颠倒了，把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作为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这表明这些同志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为了教育这些同志，克服这些错误观点，毛泽东深刻阐明了在"人性"、"爱"等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人性论"有没有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17—818、823页。

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却把它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用这种主张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客观上社会区分为阶级，因此，“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① 毛泽东这些论述，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的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指明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心，考察和解决了文艺其他重要问题。诸如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问题，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关于文艺批评标准中政治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等问题，具体地阐明了文艺思想工作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他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文艺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创造性地制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一贯强调辩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7—828页。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曾把方法看作是马克思和他的新世界观的灵魂。①列宁则把这一世界观看作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身处革命斗争实践前列，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为突出的问题提出来了。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理，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阐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②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在延安大学（抗大的前身）讲授哲学时，曾经论述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创造性地制定了群众路线等唯物辩证法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紧密结合，创造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

---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页。

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又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从群众中集中起来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的过程，大体上相当于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也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大体上相当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过程，也就是把从调查研究中形成的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群众懂得，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

毛泽东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个别和一般相联结的原理，灵活地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中，制定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又是密切关联的。“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领导从对群众的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或一般号召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动员组织群众把一般号召付诸实施，到群众实践中作具体指导的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2、854、855页。

过程。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在同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为清除其影响，毛泽东一贯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提倡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就列举了许多同志中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表现，并指出，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这样，毛泽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后来，又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②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正确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7、995页。

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三十年代我国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延续七、八年的争论表明，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单靠套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则和公式，是决然达不到目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具体地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本身辩证的发展过程。后来，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才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等问题，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提供了思想保证。

揭示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革命发展的规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达到了高潮，除在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反共以外，在思想上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次革命论。当时，全国人民对于怎样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的问题困惑不解。共产党内有少数同志，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发生动摇。为了批驳反动派的反共谬论，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和革命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科学的分析。他强调

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中国的国情如何？毛泽东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历史到现状，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封建社会。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是毛泽东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他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时说：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然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但政权却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少见的。③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这些矛盾表现在人与人关系的上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589页。

③参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3—594页。

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毛泽东在阐明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指出了由中国社会性质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主要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所谓革命的动力，就是指在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哪些阶级阶层可以充当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作了分析之后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农民主要指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在革命中的作用，进一步作了分析，发挥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明确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②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4、635页。

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还从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的观点，论述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变化。中国革命是和世界革命紧密联系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仅是由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的，而且受世界革命的全局所制约。他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按其性质和对象来说应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它已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所容许所援助。因此，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已不是由资产阶级所领导，不是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其前途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不仅是对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深刻发挥，也是对他所提出的关于全局和局部辩证关系原理的有力论证。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所鼓吹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的“一次革命论”的谬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企图走中间路线，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中国革命象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在两个阶段之间

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革命必然半途而废。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就绝不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国际上说，帝国主义不允许，社会主义也不允许；从国内说，国民党反共的结果，建立的只能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当时，那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鼓吹"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消灭任何革命。毛泽东关于革命既是不间断的，又是分阶段的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为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阐明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纲领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内部诸因素之间关系的原理。他依据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科学地论证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辩证法："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所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实质讲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及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①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 而一定文化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伟大的影响和作用。毛泽东这一论述，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原理的科学阐述，也是对中国国情即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进一步的分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即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毛泽东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只能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③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④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把国家的阶级实质和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混同起来的错误，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⑤它表现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镇压哪个阶级。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识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住不同国家的真正性质。"政体"则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⑥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对列宁关于国家形式与实质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依据上述理论观点，毛泽东具体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质和形式。他说："国体——各革命阶级

---

①②③④⑤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655、637，635，637——638页。

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指出，其基本点就是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认为，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必须运用国家权力没收官僚买办阶级的经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于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则容许其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民族尊严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④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着重阐明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⑤由此出发，他进而

①②③④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8、667，668、666，624—625页。

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他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见，这一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

提出并阐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我们党在敌我力量悬殊、矛盾错综复杂的艰苦困难的环境中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的著名论断，为我们党制订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中国就明显地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战争指导路线：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这是一条失败的路线；共产党采取的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积极打击侵略者的路线，这是一条胜利的路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有几万人。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远远不如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却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8，932页。

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①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需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等等。在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是，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②

要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必须使人民获得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权利。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原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说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③解放生产力，是革命的目的，也是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

毛泽东反复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中国大地主、大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0、942、980页。

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和言行是同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之失败是必然的。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必然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两条路线之争，从世界观说，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争。

第五节　历史唯物主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著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当革命战争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的重要报告，和他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不仅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党的工作以及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革命转变理论和国家学说作出了新贡献。

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纲领

在《报告》中，毛泽东阐明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外的

基本矛盾的变化以及由此规定的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解决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突出起来，由原来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的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不仅提出革命转变的任务，而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实现转变必需的条件和主要途径：在政治上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必须对内限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必须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合作社改造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以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果断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战略决策。他指出，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主要矛盾的转变，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转移到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因此，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城市

一切工作的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去战胜敌人和进行生产建设事业。

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帝国主义和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对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必然要用各种方式作拚死的斗争。毛泽东警告全党，必须加倍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种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进而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为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努力。

阐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成熟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它的性质是什么？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怎样？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如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1329页。

何？这就成了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问题。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回击敌人的攻击，批判和澄清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并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他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区别，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独掌政权，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列宁曾经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革命传统而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只有工

①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9、1361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别的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工人与农民的联盟，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靠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也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极大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国家要联合、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可以让它参加政权，但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并在联合中消灭资产阶级。这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

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和对敌对阶级的专政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人民有权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而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给以制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逐步解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必须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实现农业社会化；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实际上是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

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国家消亡的问题。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考察了国家的命运，指出，阶级、国家、政党都是要消灭的，问题是要有时间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

条件。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亡，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但是，现在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现在强化人民的国家是为将来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理论的新贡献。

在批判唯心史观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新阐发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同时发表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为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信。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上，恶毒诬蔑中国人民革命，煽动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起来反对、颠覆人民政权。白皮书客观上就成了美帝侵华罪行的自供状，成了教育中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对美帝存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毛泽东在1949年8、9两个月中，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露了美帝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美帝的不切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5页。

实际的幻想，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科学的说明。毛泽东这些评论是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

首先，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美国侵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与人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毛泽东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①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作斗争。毛泽东总结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长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概括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③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和人民的这两种相反的逻辑的著名论断，既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泥足巨人"，人民群众是创造新社会基础因素的光辉思想的发挥，也是对他自己1946年8月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的发展。毛泽东这一思想，有力地武装了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加强了他们在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中必胜的信心，对争取革命的胜利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战而胜之，就必须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和教育中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把他们争取到人民大众方面来，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

---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5—1376页。

技了。为此，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希望劝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其次，阐明了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指出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只有用这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历史，观察社会，才会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中国许多自由主义分子，即艾奇逊之流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为什么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阶级斗争观点。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 他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令人信服地证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他们转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抛弃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艾奇逊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人口过剩和所谓“西方的影响”。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驳斥了艾奇逊的谬论。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就是帝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1401页。

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①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在中国、在东方替自己造成掘墓人，它的失败和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毛泽东进而阐明思想理论特别是革命的思想理论指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指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夜近七十多年间，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的。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以及被迫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②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就改换了方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产生这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2、1403—1404页。

样巨大的威力，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关系，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①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4页。

第 十 三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发展
（1949—198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实践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等发展阶段。经历了从巨大胜利、到曲折的发展、严重的失误、再到伟大胜利的过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的反映。同历史实际的发展一样，三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如：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现阶段社会实际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所规定的其他矛盾，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借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大力提倡哲学普及，使哲学从书本上和课堂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注意在思想战线和实际工作中开展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斗争；注意总结新的社会实践经验，概括出新的哲学理论观点，

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等。这是一方面。另方面，毛泽东又在较长的时间里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样那样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在反对“左”右错误倾向斗争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国情，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集中地体现在已发表的毛泽东的一系列哲学和其他著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小邓平、陈云等同志的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文献中。

第一节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胜利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是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这一革命转变的胜利，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胜利。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曾明确规定了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的任务、途径、基本方针和政策。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一方面，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方面，接受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资产阶级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打击不法分子，节制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并且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使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胜利地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完成了遭到多年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结束以后，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研究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①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逐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一主要矛盾。

恢复国民经济，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都是在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分析了建国初期的时局，一方面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另方面又指出，要在全国广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大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会遇到够大够多的敌人的反对。此外，革命胜利引起社会经济改组，以及过去战争带来的某些破坏，会有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我们不要四面出击”①的策略。他指出，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即帝、官、封的势力，就要使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以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孤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这一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导下，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了各项改革工作，解决了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注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教育。在建国初期，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1952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1953年3月，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和第三卷。其中毛泽东于1937年写成的《实践论》，在选集出版之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的发表，在国内外发生了很大影响。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对它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深刻地说明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本原理，关于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

为了广泛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毛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页。

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①批评了当时思想文化界以及一些共产党员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结果，是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才能对历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革命转变，提供了思想保证。

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通过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措施、步骤实现的。

关于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曾指出：必须根据私有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原则上采取剥夺的方法，把它收归国有；也可以采取赎买（有偿）的办法把它变为全民财产。对农业、手工业个体私有制，则不能剥夺，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途径，把它改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问题，已在苏联有了实际经验教训。他们的农业集体化是自上而下靠行政命令完成的，没有充分发动和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因而付出了很大代价，农业集体化中农业减了产。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是靠剥夺资本家的办法实现的。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在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采取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页。

道路和方法。

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政治经济表现，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他还指出，当时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私有经济的复杂经济结构。一方面，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又有由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是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条件；另方面，土改后我国农村落后的、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象汪洋大海一样，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不加改造，就会危害先进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而刚刚从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为了避免重新遭受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而带来的痛苦，有一种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因此，党必须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但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就越尖锐。在过渡时期，不可能长期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生产力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其次，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采取了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改后紧接着组织个体生产者建立互助组。这种互助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步，在互助运动的基础上，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建立完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土改后出现中农化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阶级路线，解决了依靠农民大多数和建立农村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优势的问题。对于富农不采用驱逐和没收的做法，而是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这样就减少了富农对合作化的破坏和反抗活动，同时也有利于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由于党和国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任务。事实证明，在土改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顿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农业合作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体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期内农作物的减产，也有利于合作社管理人员的训练和提高。

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采取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一般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给原料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资本主义商业采取让他们代销经销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内给资本家一定的年息。除了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外，同时还对资本家进行了改造，使他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

的方法是以企业为基地，让他们利用其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耐心地进行思想改造的教育工作。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样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既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因此，中国通过和平赎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重要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

应当承认，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差。这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对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工作过粗，经营管理混乱等等缺点。这些缺点被发现后，还未来得及完全纠正，又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反而使有些缺点扩大了，以至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对手工业、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也程度不同地有这类缺点。尽管如此，但总起来看，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成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取逐步改造的政策，是完全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在中国条件下的历史特点的。三大改造的胜利 雄辩地说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且完成了极为复杂的经济改造任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哲学斗争

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反映到世界观上来，引起哲学上的斗争。

首先，贯彻执行总路线遇到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反抗。其突出的代表就是梁漱溟、胡适等人所宣传的唯心史观。梁漱溟在全国解放前就一直宣扬封建复古主义，搞什么

“乡村建设理论”，为当时的反动政府帮忙。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他又极力反对这个总路线所施行的一切方针、政策。他从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宣扬孔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提出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说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等等，从其过去代表地主的反共反人民立场，转到装扮成“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叫解放”，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阻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照他的路线，中国不但建设不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①]胡适（1891—1962）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例如，胡适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硬说《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作品的主题是“爱情至上”，女儿情肠。建国后，有些称为“红学家”的胡适门徒，继续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宣扬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用烦琐的考证，歪曲和否定《红楼梦》作品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历史观对抗唯物史观。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展批判。接着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从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点等九个方面进行全面批判。从此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斗争。

1955年3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8—115页。

的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经历了一年之久的大规模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从而推动了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其次，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遇到了党内"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这种干扰也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左"倾思想期望在一个早上就完成过渡，否定了"逐步过渡"；有右倾思想的人，"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不懂得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用唯物辩证法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防止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正确地论述了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把工业化当作农业合作化前提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不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就不能很好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和商品粮食，就不能很好的解决，同时，工业供农业使用的大机械等等产品也就没有广大市场。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在我国的条件下（资本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新观点。在毛泽东看来，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

生产关系，而是在革命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才能大大发展。这样，毛泽东就从生产力内部，工业与农业之间，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上，讲清了农业合作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讲清了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件事“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①中国农业在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很快完成了合作化的事实，对毛泽东以上论述的正确性，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毛泽东还就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论述了事物都是按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他说：“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②我们决不能直线式地看问题，发展，整顿，巩固，再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途径。毛泽东所阐明的农业合作化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为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第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和施行，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例如，我国过渡时期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哲学界广泛而热烈地讨论。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就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五种经济成分，还是只有其中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2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2页。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并展开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我国过渡时期中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法律制度才是这一时期中唯一的社会上层建筑。与此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构成为它们的一部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能为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不能同时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单一论”。杨献珍同志于1955年6月23 日写出了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讲稿，①阐述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过渡时期中的五种经济成分或四种所有制形式是构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同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度共同构成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因为，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指现存的不同性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言的；过渡时期既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就必然有其特定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五种经济成分的有机结合，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它将逐步由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基础过渡到单一成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过渡时期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上层建筑必然既包括社会主义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统一体，否则就不能理解它们是怎样作用和服务于它的基础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综合论。”同年8月，艾思奇同志写出了题为《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所包含着的五种成分或四种所有制决不能拼为一个综合的基础。四种所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是日益发展的新生的东西，而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和资本家私有制是日益走向消灭的东西。过渡时期的经济之所以是过渡的，就是因为它还没有一种已经完

①见《杨献珍文集》1集。参看1982年《哲学年鉴》，第300页。

成了的经济基础，过渡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它们不是和谐地共同综合成为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而是相互处在尖锐矛盾和生死斗争过程中，就在这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归于消灭。他认为，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是违反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还说，杨献珍同志关于“上层建筑不是为某一单一经济基础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看法，是等于抹杀了我们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实质。我们的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采取“一视同仁”的立场，而是采取“有所不同”的立场，它是由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私有制度。艾思奇还认为，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和与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但是，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存在着，但它决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任何构成部分。艾思奇这篇文章，由于杨献珍同志的文章没公开发表，所以当时也没有发表，到了196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才以《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为题公开发表，同时也以《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为题发表了杨献珍的文章。艾思奇在说明中认为，“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①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从1955年到1958年前后进行了近四年。这次讨论，对于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着重要意义。到了1964年以后，这场讨论已经偏离了学术讨论的正确方针，而演变成对杨献珍同志

①《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291页。

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了。

《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胜利地提前完成。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已经来临的时候，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了建国七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并且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更后的新形势，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第一，明确指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第二，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指出：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被消灭以后，剩下的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农民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第三，适时地作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新结论。这就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指出：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决议对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在论述上还不尽完善，但是总的说来，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

党的八大决议的基本思想，是同当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这个讲话是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而提出来的。

毛泽东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心思想就是在借鉴苏联经验，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他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1960年6月18日写的《十年总结》中，反复谈到，“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是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重要文献，它具体而生动地阐明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

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矛盾分析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矛盾，是这篇文章的首要特点。《论十大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正确地阐述了十大矛盾，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这些矛盾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和各种经济关系，而且也包括国内外的政治关系。

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

盾。”①又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只有全面认识我国社会整体的矛盾才能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矛盾呢？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定要坚持两点论、重点论，反对一点论、片面观点。他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③

看人看事总是有主要次要，优点缺点，好中之坏和坏中之好等等。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始终坚持了这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点论原则，他着重指出在解决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片面的方法，即只要重点，不要非重点。只顾重点不顾非重点，这种方法不懂得通过抓非重点来促进重点的道理；另一种是全面的方法，即重点和非重点兼顾，为了促进重点，必须抓好非重点。例如，在解决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你真想发展重工业，那就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以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再例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不能只要中央一个积极性，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些指导思想，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实是具有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

《论十大关系》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新的发展，而且对某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作了一定的发挥，例如关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26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问题，关于人的因素作用问题，关于政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问题等等，都作了科学的论述。在考察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时，毛泽东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国内来说，可分为三种：一是工人和农民，这是基本力量；二是中间势力，这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三是对反动势力这种消极因素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国际来说也分为可以团结的基本力量，可以中立的力量和可以分化和利用的力量。我们只要解决好了这“十大关系”，就可以把国内国际的一切积极力量调动起来。在谈到人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①对待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②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曲折发展

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概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280页。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是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开始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唯物辩证法，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中国呼唤出来的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在这几年，毛泽东一方面特别注意发挥群众自觉的能动性，注意工作方法，注意用辩证法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另方面又由于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1959年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观察到的错误。但是，在这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于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造成了严重影响；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论点。这种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实践上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时期的错误虽然是比较严重的，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而且也不断地有所觉察、有所纠正，只是未能从根本上彻底纠正，以致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回顾到这段历史情况时指出：“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由于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对于“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未能在实

践中坚持下去。实践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始终不渝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千万不可因胜而骄，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搞国民经济建设，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速度。否则就会背离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招致严重的危害。

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曲折前进，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入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历史经验教训作出哲学概括，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论著，以及同科学家们的哲学谈话，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作了更深刻的阐述。他更加注意哲学的普及宣传，把它变成群众手里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注意对对立统一学说作出了深刻而通俗的解释和发挥，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之在指导社会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以及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是通过对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问题的讨论分不开的。而对全国影响较大、讨论时间较长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时间是在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起于1961年，止于“文化大革命”前。杨献珍同志和艾思奇同志，在这两场讨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两次讨论对于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是由于在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争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的意思，就是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用它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说，尽管唯心主义者在历史上曾使用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术语，但并不妨害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使用它。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等于直接肯定了唯心主义原则。因为唯心主义之为唯心主义，就在于它断定思维是第一性的东西，存在是第二性的东西。难道说只要一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思维的第一性和存在的第二性吗？显然这是两件事情。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争论双方对于“同一性”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持第一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这个同一性是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它同“矛盾的同一性”在含义上完全不同。持第二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适用于一切矛盾，当然也适用于思维和存在这一对矛盾。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反映论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持第一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唯心主义者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解决；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者都是用并且只是用反映论去解决。持第二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不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反映论对立起来。唯心主义者可以有他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有他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共同的，论证是不同的。反映论是以唯物主义的

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论证为基础的。因而也只是和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论证相对立。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直到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发表，阐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道理以后，就基本上结束了。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涉及到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如何理解，如何表述。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分为二”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科学的、简明的、准确的表述。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援引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说法以及大量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就把辨证法概括为一分为二。六十年代他对这个提法再次作了解释。他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谈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第二种观点认为，“合二而一”正确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他们说，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认识它的时候要“合二而一”。要“求同存异”或者找出矛盾双方的“共同点”。他们还说，“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都是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个东西，只是提法有所不同而已。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只有同一事物的“一分”、“二合”才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全部内容。单独用“一分为二”或者“合二而一”都不能对对立统一规律作出科学的、确切的表述。

本来，究竟如何用中国的语言通俗地简明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单独用“一分为二”或者“合二而一”表述是否准确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1964年以后，在愈来愈严重的“左”

的错误影响下，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把学术上的讨论和批评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论战，许多坚持“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被扣上“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政治帽子和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四人”被粉碎之后，给这些同志在帮政治上彻底平了反，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对对立统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和发展

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并且对它作了解释和发挥。他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①毛泽东主张要联系新的实际，对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作出进一步地解释和发展，他说：“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是怎样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论述和发挥唯物辩证法的呢？

首先，提出哲学有两个对子的观点，阐明了哲学的基本矛盾。他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62、345页。

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①

其次，充分论述矛盾普遍性原理时，用“两点论”、“一分为二”、“两重性”等提法通俗地、简明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两点论”是个普遍的现象，坚持两点论，就是坚持辩证法，单搞“一点论”就是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原则，就是割裂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形而上学观点。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否认矛盾普遍性的错误观点时强调说，建议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两点论”的辩证法问题。他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这些论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三，在批判了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的原理。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这一理论表示不满，尤其是在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上攻击毛泽东提出的矛盾同一性原理，指责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等都是矛盾统一的说法是“胡说”。毛泽东指出，他们这种指责，正说明了他们搞的是形而上学，他们有许多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在过去就有所表现。例如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讲辨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虽然也讲联系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但是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这种观点在五十年代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中就表现得更明显了。毛泽东说：“辞典里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498页。

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①事实上不承认这些矛盾现象的同一性，就没有办法回答它们对立的双方为什么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把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无产阶级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他们在地位上的这种转化，也是其矛盾同一性的表现。毛泽东说："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②

其四，毛泽东善于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把它变成人民群众手里的武器。虽然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已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系统的论述，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五十年代初，他对李达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本书的第一本出版以后，他赞扬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还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③后来，他又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养成"学哲学的习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

①《毛东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

③毛泽东同志给李达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9页。

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另一方面，他强调哲学工作者要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哲学家从自己书斋和课堂中走出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要在实践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两个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会使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真正成为实际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成为掌握在群众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他还把唯物辩证法化为自己的行动，在实践上提供了极为丰富多采的范例。例如，他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于正确总结工作，正确判断工作中的得失，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等等方面。此外，他还十分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坚持哲学党性原则，这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最后，毛泽东坚持辩证法和认识论一致性的原则，在一系列著作中，对于真理的发展规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述。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②毛泽东这一观点是对《实践论》关于真理性的认识是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过程中获得的论点的重要补充。这一论断阐明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是推动真理性认识发展的动力。这是对认识的辩证法和真理发展规律的深刻发挥。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

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理论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还面临着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还存在不存在矛盾？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没有得到具体解决。马克思1859年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般地讲过人类社会矛盾发展。列宁曾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虽然有长期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实践经验，但是，由于他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束缚，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不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矛盾，他到晚年虽然吞吞吐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但是仍然没有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苏联理论界也如此。只承认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对上述问题不可能作出正确回答。

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起就开始总结国内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注意探讨社 会 主义 社会的矛盾问题。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全面地总结了国内和国际无产级阶专政的历史经验，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敌我矛盾 和人民 内部矛 盾的理论，解决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当时，我国思想理论界形而上学观点也相当盛行。许多人口

头上承认对立统一规律，但在实践上却不敢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敢公开承认我国社会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此，毛泽东说，这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认识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 和分析社 会主义社 会的各种矛盾时，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伟大发现。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还灵不灵？如果灵，它的表现和性质又是怎样呢？对此，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的情况。"①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 会 主 义 革 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适应的情况是基本的，不适应是局部的；这种在基本利益相一致的情况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374页、372—373页。

下存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觉地改革、调整加以解决。上述理论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指南。

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要的不是阶级对抗，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 怎样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要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必须做到正确区分，而正确区分实际上就是要划清人民和敌人二者的界限。毛泽东提出了区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敌我界限的大杠杠，这就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② 毛泽东除了指出敌我之间矛盾的性质属于对抗性的矛盾外，还具体地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和性质。他说，人民这个概念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还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强调指出：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但是具体地说，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在人民内部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强调说，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敌人，主要方法是实行专政，而专政制度不适于人民内部。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只能运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还从各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在政治上主要是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

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 根据这一辩证法观点，他分析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互相转化的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他还根据事实说明，人民中间的一些人蜕变为人民的敌人，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

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反复思索社会领域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的斗争和向自然开战的关系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他一方面指出，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另方面又非常注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确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认为解决这个主题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关键的一环。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2]这种必要性已经完全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否则，就受挫折、就停滞，甚至还会逆转或倒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以及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理论本身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飞跃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内部矛盾规律的认识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常常居于从属地位并往往被敌我矛盾掩盖着，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然从不同角度谈论并处理过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概括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375页。

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毛泽东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研究客观社会生活的新事实，总结新经验时，才能提出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制定了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向重视的问题。列宁、斯大林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工作方法都作过重要阐述。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概括说明了列宁主义工作方法的大体特征，强调指出，“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辨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①

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根据唯物辨证法原则，提出了工作方法的两条要求，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②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又对工作方法作了概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在党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又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工作方法，例如《工作方法六十条》等，从而逐渐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体系。

---

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8、199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6页。

总的来说，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体系，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原理、范畴、规律的具体运用。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一、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阶级分析，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①至于怎样做到正确的调查，毛泽东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采取观客的态度，进行调查。如果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带着预先想好的"框框"，在生活中寻找"证据"的做法，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调查"。他强调要用"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社会作调查，这种调查不是零碎的、片面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既要详细占有材料，又要抓主要点，作典型调查；既要"走马观花"，又要"下马观花"，"蹲点"、"解剖麻雀"，通过个别了解一般。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②开调查会，要有调查提纲，要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要采取讨论的方法。

二、"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指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③

---

①《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组信件和批语》，引自《红旗》杂志，1982年第24期。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7页。

③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扬自满》（1963年12月13日），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2页。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就要自觉地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看到矛盾两个方面的同一、斗争及其转化，反对“一点论”和“均衡论”。要暴露矛盾，设置对立面（不是主观的，而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矛盾，有计划有目的设置）。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和改造事物。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平衡的，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把这一原理运用于工作，就形成“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说，“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比较”是对立的统一，先进和落后，一般地说，是就某方面比较而言的，并不是就一切方面说的。因此，把先进单位和个人看成一切方面都先进，把落后的单位和个人看成一切都落后，是片面的、绝对化观念。看不到先进和落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也是不对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发扬先进单位和个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落后单位吸取经验教训，奋发努力，以其落后的事实教育中间，不仅会使落后变先进，而且还会带动中间。

事物都具有统一性和差别性、共性与个性。因此，在工作中一方面要有统一性，强调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纪律；另方面，又要发挥每个单位或个人的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自主权。统得不能过死，要允许差别性，贯彻执行政策，不可“一刀切”。承认差别，区别对待，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策略，分类指导，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

此外，毛泽东关于“抓典型”、“蹲点”、“解剖麻雀”“一般号召，具体指导”，“两条腿走路”等等工作方法，也都是对立统一、共性与个性辩证原理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运用。

三、抓中心工作，抓重点和弹钢琴，是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辩证关系原理而形成的一个重要工作

方法。他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然而同时，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学会“弹钢琴”。“单打一”，只抓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工作不行；不分轻重缓急，平均用力，盲目乱抓也不行。“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但不能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抓工作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方法。

毛泽东关于“全国一盘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关于主流和支流，关于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胸中有数，波浪式前进，关于要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所有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补充和发挥。

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正确认识世界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保证的新思想

为了通过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按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党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向大会作了“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还很不够，另方面是由于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32页。

制原则。随后，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从民主集中制问题入手，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阐明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和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关系问题。他把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坚持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使人耳目一新。

首先，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他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①建国后的前八年，由于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工作就比较做得好。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由中国人自己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认识路线上才不会走弯路。

但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走了一个曲折过程。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革命历史实践，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②他说：我讲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

①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15—16页。

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① 接着，他根据切身的实践经验，讲了必然和自由的辩证规律。他说，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之前，我们的行动就带着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了许多蠢事，就是这种盲目性的表现。“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②在没有认清必然性、规律性以前，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到许多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这些论述讲清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认识的曲折过程，认识规律的艰难性，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挥。这对于纠正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阐明了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途径。毛泽东强调说，要认识客观规律，必须坚持两个方法，这就是“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③这两个方法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不是随意的道听途说，而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也不是脱离群众的调查研究，而首先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从前做的

①②③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话》单行本第22、29、26页。

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就逐步觉察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认识有问题，强调提出要作好调查研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①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调查研究问题。他强调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说：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那么对。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他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他说，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1年以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许多文件，强调全党要重新认识和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及工作方法，这对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纠正错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讲话》着重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起来，深刻地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保障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极端重要性，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

---

①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下册，第143页。

线对于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①毛泽东在这里阐明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正确的集中制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正确的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民主集中制，就没有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也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他把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有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又说：“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②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算数的道理呢？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毛泽东把他

①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8页。

的观点和方法概括为：“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种把民主集中制同正确的认识路线一致起来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重要发展。

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继1962年所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于1963年5月2日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这篇短文中，他阐明的“两变”（即“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理，把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概括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过程。他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

义更加伟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关于在实践基础上“两变”的观点，是对《实践论》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他把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概括为“两变”，这就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同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关于基于实践的“两变”的观点，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角度，阐明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对立统一过程。既坚持了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是可以认识的，又坚持了精神的东西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精神（包括思想、认识、观念、理论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的内容是由物质变来的；既坚持物质和意识的区别，又坚持了二者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统一性、同一性。这种统一性、同一性不但表现于物质变精神，而且更重要的表现是精神变物质。毛泽东在阐述物质变精神的过程时，说明了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在阐述精神变物质时，强调指出它的曲折性、复杂性。他说在社会斗争中，在有阶级存在的情况下，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①毛泽东这一论断，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革命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两变”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思想的发挥。马克思曾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列宁曾说：“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③，“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了。

1963年毛泽东所阐述的“两变”的论点，对于澄清当时哲学思想上的错误观念，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1958年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哲学界曾经进行了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这一讨论很关心。1960年，在一次谈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问题时，他指出，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还指出，思维和存在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而是说思维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物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而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为事物。由此可见，1963年毛泽东阐述的“两变”的思想，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哲学界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两变”的论点，也是针对当时干部的思想状况，为着进行认识论的教育，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提出来的。多年来，一些同志之所以犯错误，从认识论上说，就在于对于“两变”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不理解。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来的；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意见等等，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更不知道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的重要道理。所以，毛泽东指出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只有搞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才能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难，少犯错误，完成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任务。

第三节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重大挫折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常的学习和研究被迫停止。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致使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重大挫折。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走上了正规，才逐步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指导思想的地位，进一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更加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和其他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对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些“左”倾错误的政治观点和实践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曾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大致是：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认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等等。这些论点，集中地反映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等文件中。毛泽东这些论点，是以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斗争状况的主观主义估计为基础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上述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实际上许多都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批判是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原则是非的混淆，是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加上的种种罪名，也被确凿的

事实证明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对大量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也是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是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当然，也不是一场反革命，因为它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毛泽东重用的林彪、江青一伙人，运用两面派策略搞阴谋诡计，组成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炮制了一整套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理论。他们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例如，鼓吹唯意志论，反对唯物论，把“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个唯物主义观点，当作“反动的形而上学”；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曲解为“斗争哲学”，叫嚷“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他们大肆宣传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疯狂鼓吹个人崇拜；他们宣扬“顶峰论”，编造“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胡话，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他们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他们是在“革命”辩证法的幌子下，兜售这套反动谬论的，因而使许多人一时分不清是非，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动哲学思想，毛泽东曾经有所察觉并作过一定的批判。例如，当林彪、陈伯达一伙宣扬“称天才”观点，阴谋篡党夺权时，毛泽东立即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批判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物史观。他指出：人的认识主要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实践。他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

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他并提醒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它说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当“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之时，毛泽东严厉批判了他们的反动的世界观。揭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野心。毛泽东的文章和指示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驳斥了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天才是他们头脑里固有的谬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为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由于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当作马列主义的东西，因而，他不可能从林彪、江青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中，得出应有的教训。去认识自己哲学思想上的错误。其实，毛泽东所犯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严重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陷入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对于迅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阴暗面，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教条化，或作了误解，并以之作为“理论根据”。他片面夸大主观因素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上，过分地强调政治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错误地采用自下而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的

问题，等等。从总体上看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但是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决不能对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哲学思想展发史上的重大教训

要从哲学上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划清两个根本界限：其一，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政治观点，同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完全区别开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包括非科学的错误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所犯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在哲学思想上所犯的主观主义、片面性错误，是严重的，是同他所一贯坚持的正确的东西相矛盾的，是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相矛盾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混同起来，决不能因为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抛弃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也不能因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否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其二，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行为完全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期的“左”的严重错误，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人，但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然而毛泽东所犯的这一个错误，在性质上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的错

①《邓小平文选》，第262页。

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尽管他在全局上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坚持了正确的原则，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例如，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持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鼓吹的反动的“天才论”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注意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使它没有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摧毁。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发展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原则，等等。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弄清了以上两个根本区别以后，我们也就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光辉，决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有所减色。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观点的错误，也为我们坚持和继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指出如下几点：

首先，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极为重要的。在认识世界和和改造界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不坚持民主集中制或者坚持得不好，即使象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免要犯错误。

其次，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正确地、具体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正确处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中之所以长期存在“左”倾错误，就是由于没有采取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认识中国国情，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同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阶级斗争问题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相联系的。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错误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作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当适时地转移到发展生产力方面。但是党的八大决议在这方面提出的正确方针不但没有能够坚持和发展下去，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离开了唯物论，辩证法就成了唯心主义的；离开了辩证法，唯物论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只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哲学在实践中正确地发挥正确的作用。而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多方面地听取干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就必须把一般原理和实际结合起来，克服教

条主义，公式主义“一刀切”和经验主义的毛病；就必须正确解决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必须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割裂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必然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确认识和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发挥人的主观因素作用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贯主张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因素作用（个人的和阶级的、政党的、群众的积极活动），但是必须以一定的客观条件为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来，只讲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讲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那也会堕入机械唯物论。

总之，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经验和毛泽东所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教训，只要能够正确地总结和汲取，都是宝贵的。它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够恢复正确的思想路线，并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条件。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停止“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短短的四年中，进行了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的反动哲学思想，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繁重任务，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一贯

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克服了十年动乱带来的严重困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百业俱兴，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总结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新观点，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党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邓小平文选》以及陈云等同志的文章中。

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工作中。但是，十年动乱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还有待于彻底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和个人崇拜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如果不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于1977年至1978年展开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

“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所提出和推行的违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错误观点。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造成冤假错案。因此，“两个凡是”提出后，立即遭到邓小平同志的反对。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5月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涉及到哲学上一个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真理的标准？是坚持一切从本本出发，搞“唯书”、“唯上”呢，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就不可能使一些人的思想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无法认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因此，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对林彪、“四人帮”狂热鼓吹个人崇拜和“字字句句”照办的教条主义谬论的批判，也是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它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权威，使人们冲破了“左”的倾向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为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开拓了道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申明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

①《邓小平文选》第36页。

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和以前的“左”倾错误，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同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第六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对建国年三十二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对它的基本含义、基本内容、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都作了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概括和说明。

《决议》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述占了重要的地位。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决议》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科学著作所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决议》指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概括地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后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又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科学的概括，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为了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决议》首先着重阐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毛泽东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7页。

决。《决议》还指出，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重要特点。《决议》说："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①把唯物辩证法原理作为方法，使哲学实际化，把它变成群众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特点。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基本含义"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富有特色的创造，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决议》写道：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一方面把群众路线当作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另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创举。《决议》强调，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决议》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

①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页。

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独立自主，自力更力，最根本的是说，任何国家的党都要独立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独立地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的事业固然是国际的事业，应该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但是任何革命总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明确地解决了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问题。《决议》根据毛泽东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①《决议》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论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精神，对于以后党的工作会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在科学分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9页。

析中国国情，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及规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研究一般规律，还要着重认识和把握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表现。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获得的正确认识。如前所述，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曾经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滋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统一的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这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比较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以及体现这一规律的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和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我们党在新的时期对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作出重大发展的重要文献。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

“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点和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经济方面有以下六点：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劳动者个体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这是由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状况所决定的。“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第二，在经营形式上（包括分配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个体经营为补充，多种经营形式并存。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要真正按照有利于生产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促进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第三，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第四，在流通体制上，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集体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多渠道、多环节的商业流通体制。第五，在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上，实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去安排基本建设，正确解决建设和生活的关系，生产和建设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第六，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通向世界市场，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所有这些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方针和实践，都是对以往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的重大突破。它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发挥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在政治方面，“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体地说，就是规定了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

和领导体制，以便保证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扩大人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力，克服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而产生的种种弊病。还规定了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展各个企业、事业方面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同时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还必须把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义务、民主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十二大”报告强调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力，是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一个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坚决抛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仍有些同志未能彻底摆脱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越超于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也有些同志则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发展到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党中央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反复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内容、特点和处理方法。“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的斗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这就是党中央关于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些论

述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克服和防止在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倾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和战略方针，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报告指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报告还从社会实践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①这就把文明和实践联系起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就是文明的发展史，使文明范畴具有了历史观方法论的意义。报告还阐明了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两种文明的建设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虽然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还落后，但是，我们也能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要解决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尤其对思想建设，必须予以特别重视，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

"十二大"报告强调提出，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8—29页。

明的核心，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有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报告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①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是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有力的回击。报告还强调指出，绝对不能忽视共产主义精神对两大文明建设的重大指导作用，"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关于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极大作用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早在1981年12月，党中央曾经在一个文件中就明确指出：精神和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中，批判"精神万能"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精神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大体相同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们精神面貌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党的"十二大"文献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页，第31页。

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立统一，以及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的科学说明，正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党的“十二大”文献，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其新见解、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